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英文版前言.....	5
英译者小记.....	6
作者生平简记.....	7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7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	15
英文版编者绪言(肯尼思·塔巴克).....	22

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

罗莎·卢森堡著

争论的问题.....	55
批评家们.....	72
鲍威尔的一般评论.....	100
奥托·鲍威尔的“新”人口理论.....	113
鲍威尔的“实际”结论.....	149
帝国主义.....	153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尼古拉·布哈林著

绪言.....	167
第一章 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扩大再生产.....	168

第二章	货币和扩大再生产	198
第三章	市场的一般理论和危机	220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254
第五章	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	275
结论	287
附文一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289
附文二	评论斯威齐对布哈林的批判	294
附文三	卢森堡的理论运用到预言中	298

编 者 的 话

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已经几百年了。“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揭开这个时代的秘密，认识这个怪物的本质，阐明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是由马克思实现的。

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这部科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停滞的，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也不能不向前发展。

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后三十多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很好地说明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917年，列宁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源，从而揭穿了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修正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国际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和必胜的条件，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

阶级胜利地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这本书问世到现在已经六十四年了，帝国主义尤其在近二十年内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有人称这个阶段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有人则称它为晚期资本主义。面对这个新发展，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探索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规律性和它的基本特征，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估计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革命的意义，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我们出版《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就是为我国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历史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一点历史资料。

这本书的英文本是由英国肯尼思·塔巴克编选出版的。书中收集了罗莎·卢森堡 1915 年写的《反批判》和布哈林 1924 年写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两篇作品，编者还为这两篇作品写了一个介绍性的绪言。

罗莎·卢森堡是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战士。她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她 1913 年写的《资本积累论》是她的主要理论著作。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转向修正主义第一次投票赞成战争贷款的时候，具有敏锐理论洞察力的罗莎，立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指出了《资本论》的不足之处。她认为，《资本论》第二卷中仅仅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而没有解答这些问题。为解答这些问题，她写出了有独到见解的《资本积累论》，提出了第三市场的理论。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社会总产品流通时，马克思为研究方便，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法，假定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而把其它阶级一概排除在外。因此，他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不变资本（原料、

机器、厂房等)、可变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利润)三个部分,得出了下列公式: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 C + V + S \\ \text{第二部类 } C + V + S \end{array} = \text{社会总产品}$$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公式理论上说得通的,但把这个理论公式应用于实际情况,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二部类就会出现一种生产剩余,而工人却无力吸收。资本家为了实现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继续,就必须在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以外寻求市场。只有这第三市场即小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生产等,才能吸收剩余产品,实现资本的积累。没有这第三市场,资本主义便不能生存下去,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争夺新市场和出口,就成了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实际上是试图说明帝国主义战争贷款的反人民性,指明投票赞成战争贷款是向帝国资产阶级投降。卢森堡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于是她写了《反批判》,回答各方面的批评,捍卫了并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三市场理论。

在批评卢森堡的人们当中,布哈林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当时他是苏联的头号理论家。目前他是国际上有争议的人物。究竟对他应当怎样评价,对于我们探讨这个理论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本书只是把布哈林作为二十年代由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引起的理论争论中一种不同意见的代表,只是把他对卢森堡的批评意见作为一件历史资料介绍给读者。

在布哈林看来,卢森堡关于第三市场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改变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把人们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抗上引导到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结论上去。因为按照卢森堡的意见,资本主义一旦离开

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便不能生存，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不是来自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是来自对它外部的第三市场的剥削；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同资本家阶级一起成了剥削者，至少是分享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腐化，不再是革命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通过第三世界的袭击才能实现。布哈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卢森堡只看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使他们无力吸收剩余产品，因而使剩余价值无法实现这一点，但却忽略了帝国主义创造的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借着这架机器可以吸收超额利润，从而以一种即使不快但总是有规律的比率进行资本积累。布哈林不仅维护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而且相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

卢森堡和布哈林之间的这场争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帝国主义，仍然很有意义。他们争论的问题仍然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编者肯尼思·塔巴克的绪言，除介绍卢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歧之外，还围绕这个争论简要介绍了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曼德尔、莫里斯·多布、汤姆·肯普、托尼·克利夫等人评卢森堡第三市场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而且把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说明同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宁的分析一一进行了比较，这对我们研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都是有益的。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因此，对比、分析、研究本书提供的各种不同观点，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九八一年四月

英文版前言

本书向英语公众提供两篇以前看不到的著作。无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或者从其内容来看，这两篇著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位具有卓越的活力和才智的人站在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争辩。两位作者就这个题目都写过一些篇幅更长的论述，这是英国读者都可以看到的。而本书编入的是后来更为简明的阐述，这是研究这两位作者以及他们论述的题目的一部分。

对于书中的正文，我曾试图尽可能少加触动，只是在我认为需要说明具体情况的地方加上一些字句。我加的所有字句都用方括号显著地标明。我为英国读者参考而加的一切脚注都加上了方括号。布哈林的原文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著作分了章节。在卢森堡的原文中，问题多一些，因为她写这篇著作时就象一篇长文一样，只用数码分成几部分。我给卢森堡的著作加上了章节标题，我这样做，希望无损于其著作的精神实质。

正文中注明的所有参考书都是最新的，以便读者查阅现在最新的英译本。书中的引语也尽可能采用了最新版本译文。

我加脚注提供了一些人的情况，其中有些人是一些读者所熟知的，另外一些人也许完全不熟悉。我希望我在提供情况方面没有差错，这些情况对见闻广的读者来说也可能象一般常识；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向非专家提供有助于理解原著的参考材料。

我愿在此向 A·P·罗伯茨博士和丁·马洛斯博士表示感谢，他们在我写绪言和附文时向我提出了有帮助的意见和批评。但是，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肯尼思·丁·塔巴克

英译者小记

两篇原文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布哈林著作的译文是经他认可并且实际上是在他的合作下译出的。困难在于，两位作者在使用语言上有时相当粗枝大叶，使用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或者模棱两可的字眼。事实上，布哈林对卢森堡某些句子的构成（当然，德文不是她的本国语言）进行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运用到他自己身上。

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这里重印的两篇著作都是忠实于原作的。

我愿向玛丽·杰克逊、杰里·D·乌曼斯科，特别是彼得·罗贝尔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最后的结果就会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鲁道夫·威奇曼

作者生平简记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罗莎·卢森堡出生在波兰的小市镇扎莫希奇(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她的父母亲是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并不富有。她的家庭似乎继承了西欧文化的某些传统。从广义上说，这个家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自由倾向。

罗莎看起来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尽管她的臀部畸形，并且最初被误诊为骨结核。这使她卧床一年，并在以后的大半生中行走蹒跚。她两岁半时，全家迁往华沙。这样做似乎主要是可以使孩子们在这个首都城市中得到更好的求学机会。在华沙，罗莎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罗莎既是犹太人又是波兰人，她在求学过程中遭遇了双重的逆境。她求学时期，正是试图对波兰人全面展开俄罗斯化的时候。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俄语，甚至学生之间用波兰语说话也遭到禁止。与此同时，对犹太人进行名目繁多的横征暴敛。罗莎明显地是个叛逆的学生，因为她被拒绝授予金质奖章。而按常理来说，她在学业上的造诣本来可以使她在毕业时得到这种奖章的。

罗莎上高中学习时，就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同最早试图在波兰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党的幸存人员进行接触。她的活动终于引起警察的注意，十九岁时就不得不流亡国外。

罗莎选定了瑞士的苏黎世。她要去那里的大学学习，并参加俄国和波兰流亡者在那里建立的聚居地的活动。在流亡者中，有堪称“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选定苏黎世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可能是，那里的大学是当时欧洲少数几所招生时男女平等的大学之一。一八九〇年，罗莎在这所大学注册，选读哲学专业。她花了两年时间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一八九二年，她改变了学科，转而研习法律。罗莎用了五年时间学习这个专业。一八九八年，她以题为《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于同年在莱比锡发表。这是个不寻常的荣誉，说明这篇作品确有出类拔萃之处。

罗莎在苏黎世遇见了比自己大几岁的波兰同胞利奥·约基希斯。这个人在她以后多年的私人生活中成为最有支配能力的人，而且在她后半生中肯定是对她政治影响最大的人。卢森堡和约基希斯在苏黎世时，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FP)。这表明该党在民族问题、特别在波兰自决权问题上脱离了波兰社会党(PPS)。“使用‘波兰王国’这个术语……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决心把他们的活动限定在波兰的俄国控制部分之内。自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这部分被称作波兰王国或议会王国。”^①这一点说明，社会主义者坚信不疑的原则是所有的国家都享有自决权。然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赞同最初由卢森堡提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波兰无产阶级应该和俄国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来寻求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在任何民族斗争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提出这个论点的原因是，波兰资产阶级非常需要向广大俄国市场推销工业产品，因而和沙皇制及俄罗斯帝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能领导有效的斗争。另外，还提出了一种思想：波兰工人阶级应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这个思想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提出，由于不平衡的综合发展规律，在类似俄国

① M. K. 齐凡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史纲》第 23 页。

这样的落后国家中，任何斗争必须直接转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上。虽然卢森堡的大部分社会生活是在德国度过的，但是一直到她牺牲时为止，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是她最关注的事物之一。

一八九八年，卢森堡决定去德国。当时那里已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心，有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它显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化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一三年拥有九十家日报，发行量达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二份；还拥有六十二个印刷机构，共有将近三千名领取工资的全日制工人。^①甚至在一八九八年，这个党在帝国议会中就有了自己的议员，并且看起来是国际社会党中最强大的党。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领域是卓越的。它拥有一批才能出众的人物，当时最负盛名的是有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为了使自己在德国定居而不致遇到警察制造的麻烦，卢森堡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和古斯塔夫·卢贝克举行了婚礼。这使她拥有了德国国籍。这次婚礼完全是假办法律手续，因为这一对在走出登记处门口时就分手了。

卢森堡到德国时，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刚刚开始。爱德华·伯恩斯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试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纲领修正为渐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纲领。卢森堡投身到这场辩论中来，在她的著作《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斯坦作了响亮的回答。她这样总结了围绕伯恩斯坦言论而展开的争论：“最后的目的是没有的，不论这个目的是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卢森堡用下面一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① 见 A·拉莫斯·奥利维拉：《德国人民史》，第 23 页。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区别社会民主党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又是使工人运动从修补资本主义秩序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唯一因素。象伯恩斯坦提出来的：“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等于这样一个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在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争论中，党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使用这套或那套战术的问题，而是有关社会民主党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①

在这场论战中，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崭露头角，在国内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卢森堡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作、讲演和奔走的同时，还继续领导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通过文字进行；但她也作为该党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后者的执行委员会中就波兰问题提出建议。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时，卢森堡急于返回波兰，以便积极参加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但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她直到一九〇五年早些时候才回到波兰。这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消耗掉——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卢森堡回到华沙后，在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为党报写文章，在工厂讲演，有时忙得通宵达旦。最后，当沙皇当局重新控制了局势时，高涨的革命活动开始转入低潮。罗莎被捕了，她被关押了几个月而没有被审讯。罗莎的德国公民身份给俄国当局带来了问题，她最后以健康不好为由，被保释出狱。她设法到了圣彼得堡，会见了还未遭拘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然后前往

^① 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7页。

赫尔辛基，她在那里见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其他一些成员。罗莎从芬兰回到德国。罗莎根据自己在波兰的经历和对俄国革命的全面评价，写了《群众斗争、政党和工会》一书。

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一年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在俄国革命疾风暴雨的日子之后，小心谨慎和踏步不前的情绪在德国党中占了优势。

一九〇八年，罗莎开始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任教，直到一九一四年才离去。当罗莎在中央党校试图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她才确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仅仅提出了某些问题。她设法解答这些问题，结果写出了《资本积累论》。^①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本书是罗莎的主要理论著作，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引起了（现在仍然引起）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莎的大部分著作还有待于译为英文，因此她在英语国家的威望主要依据她的一部分著作。在罗莎牺牲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仍然切合实际。

事实证明，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年代对卢森堡来说是更加富有成果的。她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的有关普鲁士人选举权问题的鼓动工作。这项工作有效地阻止了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参加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在这一时期，罗莎和卡尔·考茨基断绝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她看得非常清楚，考茨基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在这件事上，罗莎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同代人、特别是列宁的前面。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之前，列宁对考茨基（并意味着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的真正演变还不得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三年罗莎写了《资本积累论》一书。

^① 英译本于1953年出版（中译本由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译者）。

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接着社会主义国际的垮台，卢森堡立即对战争采取了不妥协的反对态度。因为这种反对态度，她实际上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现在的这部作品就是她一九一五年在狱中写成的。她在狱中还以“尤尼乌斯”的笔名写了著名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本小册子为反战的左派吹响了集合的号角。和卢森堡一起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弗朗兹·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利奥·约基希斯。最后，这伙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斯巴达克派。

随着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被推翻，卢森堡获释出狱。她立即着手加强并扩大革命左派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派和其他左派组织一起举行会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KPD）。卢森堡在大会上发言并介绍了新的党纲。从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她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热忱支持者，但她绝不是不加以鉴别的盲从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上旬，柏林的工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示威，抗议当局企图解除埃米尔·艾科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艾科恩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民粹派左翼，这是陆军在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纵容下企图“恢复法律与秩序”的障碍。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作斯巴达克周。虽然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反对这次武装示威，但是当无法说服工人退出行动时，就挺身而出进行了领导。最后，示威活动被血腥而野蛮地镇压下去，一场对付所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十足恐怖行动发动起来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陆军军官（在新的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的控制下）逮捕，随即被残忍地杀害了。卢森堡被用步枪枪托活活打死，遗体被扔进运河，在河里浸泡了好儿星期。李卜克内西后脑中弹，他的遗体当作“被发现枪杀的无名氏”存放在停尸房。假如卢森堡不牺牲，德国共产党以后

的演变很可能大不相同。假如事情果真如此，它很可能改变欧洲历史的进程。但这只是历史的“假如”。

卢森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来没有动摇过群众能够并且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她在牺牲前一天写道：

群众是决定性的要素，他们是革命最后胜利的基石。群众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一系列历史性失败这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一系列历史性失败却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自豪和力量。这就是胜利将从这次“失败”中产生的原因……明天，革命又会穿着闪亮的盔甲站起来，吹起那让你们心惊胆战的号角；我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将来也存在。^①

这一段话的确可以作为卢森堡的墓志铭。毫无疑问，卢森堡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迄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妇女。不仅如此，人们还同样可以说，无论作为理论家还是作为实际的领导人，卢森堡都是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过去她的影响遍及德国、波兰和俄国；今天，她仍然对许多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列宁是这样评价她的：“罗莎·卢森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鹰。”

卢森堡传记的作者 J·P·内特尔这样写她：

……我并不认为卢森堡所有的著作今天依然完全恰当有理。最多可以说，她的著作中一些被人忽略的方面正在得到其应有的地位。的确，一位政论家的部分著作经过五十年的时间甚至部分仍然恰当，这已经是伟大的标志了，特别是这位作家并不从事一般哲学研究，而是对当代事态发展进行分析和发生影响的人。^②

^① 引自利奥波德·拉贝兹主编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中 P·L·卡特的文章《自由与革命：罗莎·卢森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71 页——译者）。

^② J·P·内特尔：《罗莎·卢森堡》，第一卷第 6—7 页。

这就是我愿介绍给读者的作者——一位满腔热忱地将自己整个生命贡献给她为之生活并牺牲的事业的妇女。这场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也的确包括整个人类，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

布哈林是一个比卢森堡复杂而微妙得多的人物。从他的相对来说短暂而有效的政治生涯看来，其立场态度的转折和变化是相当大的。在他的事业开始的时候，他被认为是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极左一边；但是到1929年，他已成为公认的右翼领袖。

在1888年的秋天，他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因此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数学家，他把尼古拉描绘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不实际的人”。^①布哈林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有机会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接触，所以在学生时代就作为革命者而开始了他的事业。这是1906年的事。同年，他帮助一家皮靴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罢工。

1909年他因进行政治活动而被捕，最初关进监牢，后来则被流放。1910年他逃脱并奔往国外。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第一次同列宁相遇。这是二人之间进行长时期而有成果的合作的开始，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没有摩擦的。在战前的这些日子里，布哈林在一些欧洲国家过着流浪生活。1913年他才在维也纳定居。对这个时期的布哈林，罗莎·迈耶-莱文有一段描述：

“1913—1914年的冬天，我在维也纳第一次见到布哈林，那是在一次俄国海外殖民地通常安排的聚会中。这种聚会有文学和政治演讲，有讨论，有时甚至跳舞。听众中常有许多引人注目的面孔，连托洛茨基有时也参加这种聚会。但是布哈林以其特有的气质而显得突出。他的外表有些象圣者，而不象叛逆者或思想

^① 见E. H. 卡尔：《一国社会主义》，第1卷第177页。

家。这使人们不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梅什金伯爵的形象，至少象俄国演员试图所表演的那样。也许是这个原因，使我立即发现这位不寻常的人的主要特征。他的身材瘦小，看上去甚至比他的真正年纪还要年轻，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他那开朗的面孔，宽宽的前额和闪闪发亮的眼睛，呈现出一种宁静的真挚，有时几乎显得永远那么年轻。”^①

就是他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成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位第一流理论家。布哈林在维也纳的时候，听博姆-鲍沃克教授在大学的讲课，研习奥地利经济学边际派理论家的理论。大战爆发时，他被流放到瑞士，在那里同列宁合作。后来他从瑞士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在那里又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挪威。1916年他到达纽约，同托洛茨基共同主办俄文报纸《新世界》。

正是在这段放逐和流浪时间里，布哈林写出了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等。其中许多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才出版的。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布哈林经日本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回到俄国。到这个时候，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党的主要宣传家之一。他和列宁在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上的分歧至此得到克服。列宁大大接近了布哈林关于国家的思想，《国家与革命》就是一个例证，而布哈林则依从了列宁关于一切民族拥有自决权的立场。^②

布哈林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并以这种身份在1917年10月夺取首都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同年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主要日报《真理报》的主编，并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

^① 引自一部未发表的回忆录。对作者允许我从这个来源中援引这段话谨此表示感谢。

^② O. H. 甘金和H. H. 费希尔在《布尔什维克和世界战争》一书中用文件说明了列宁和布哈林的争论。

补委员。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布哈林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他仅担任过《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的主席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委员。因此他的父亲对他的评语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实质上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而拥有他的职务和权威，列宁不无道理地把他称为“党的宠儿”。甚至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他都抽出时间来同艾夫吉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共产主义入门》（译者按：又可译作《共产主义ABC》）。在二十年代他的著作以及或许包括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著作中，这是一本得到最广泛的阅读、流传和翻译的书，以致成了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圣经”。在一份晚近编印的书目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再版或重印了近四十次。^①布哈林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写作此书，但一点也没有缩小他的作用，因为布尔什维克进行那场战争时用笔和用枪是同样借重的。

在到1922—1923年期间，布哈林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左派；对于1918年同德意志帝国缔结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他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支持同德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的思想，谴责缔结和约是放弃革命的完整性。他在日报上，甚至在莫斯科《真理报》的上下午版上，公开反对签订和约。布哈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追随者就接受德国要求一事辞了职，并继续公开反对这种要求，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州委员会作为活动基地。但是在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及其同伙被重新选任他们原来担任的职务，这主要是由于列宁的坚持。^②

在内战期间，布哈林成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实行征用、减少使用货币和最大限度地致力于

^① 《尼古拉·布哈林著作书目》，由悉德尼·海特曼编纂。

^② 见罗伯特·V·丹尼尔斯：《革命良心》第3章。

为红军生产军火的时期。这个时期使许多布尔什维克产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他们认为有可能取消市场和废除货币。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布哈林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最著名的著作是《过渡时期的经济》。这可以说是他作为共产党左派的最后一次“冲击”。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很快开始转向党的右翼。最初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成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的理论发言人；后来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决裂而在1926年成为反对派时，布哈林又变成斯大林的理论发言人。

在这个时期，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开始作为农民的发言人出现。1924年共产国际采纳了资本主义已使本身稳定的论点，布哈林就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俄国的现实。这个现实使他确信，需要把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发展为向农民和小生产者作出让步。在党的各部分人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退却。这种政策容许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的因素重新出现，从而促使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极其需要的恢复。从那个时候起，布哈林认为，苏维埃经济只能按照占优势的农民成分所决定的步调来发展。实质上，这种做法所采取的形式是，农民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就会提高对消费品的要求，从而鼓励轻工业的发展；而轻工业的发展依次又会刺激重工业的发展。1923年末和1924年初，在苏维埃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布哈林同他以前的亲密同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了公开论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①，其含义是，非国营经济部门首先一定要对发展重工业作出贡献，其次再通过市场的作用而发挥其作用。这个理论同布哈林的论点正好相反。布哈林的看法很快就为党的统治机关所认可，看来苏维埃经济就此决定了按照

^① 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

他所谈论的蜗牛爬行速度发展。（布哈林谈到过，用农民的老马把车子拉向社会主义。）

随着1924年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失败和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的失败，布哈林的权力和影响似乎达到了顶峰。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免去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布哈林被任命担任了这个职务；布哈林还是莫斯科州党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是国家最强有力的机关。他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地位似乎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联合反对派失败以后过了一年稍多一些时候，布哈林本人及其追随者被攻击为“右倾”，并被剥夺了一切有效的权力。右翼反对派和斯大林派发生争论的原因是，在工业化速度和对农民特别是富农的态度这些问题上有分歧。促成这次争论的因素要从这一点上去寻找，即苏维埃经济按照布哈林规划的路线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农民没有为市场提供消费品，而宁愿把剩余粮食留在家里，因为苏维埃工业不能按照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向他们提供他们所要的商品。1928年春天发生了粮食危机，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来为城市获得粮食，例如征粮等。该年秋天城市又发生了粮荒（更不用说出口粮食了，而原先在这方面抱着很大希望，以便获得外国资本的货物）。

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决定不同斯大林新出现的工业化热情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宁愿继续试图幕后达成妥协。结果争论公开以后，布哈林及其追随者已经一败涂地了。斯大林一面在口头上同他们搞妥协，一面采取组织措施剥夺了他们的任何有效斗争手段。^①到1929年，布哈林向斯大林投降，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

^① 丹尼尔斯，同前书，第13章。

因素了。虽然他被容许保留某些职务，但他只不过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囚徒。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哈林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帮助发出了一连串的谎言和歪曲来攻击以前的反对派，同时也帮助创造了那些毁掉他自己的方法和机器。

布哈林剩下的九年生命，只不过是也以前的活动的脚注。他没有再创造任何新思想，甚至也没有再提他过去的那些信念；他完全生活在胜利的斯大林的影子下，逐渐失去了他还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形式上的权威，而滑进一个昏暗没落的世界。

但是，他没有被容许糊里糊涂地结束他的生命。1938年他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受到审讯，被控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并多年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津贴。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讯中，布哈林是最后也是最惊人的怪事。在这次审讯中，实际上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整个领导层都被控犯有类似的罪行并被处决。斯大林爬向权力高位，首先靠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誉，后来则靠踏着那些曾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人们的尸体。布哈林在受审期间曾试图拯救他的革命完整性的一些残余，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乔治·卡特柯夫评论说：“……他同起诉人合作编织了他在其中被逮住……的网，只不过为的是公开驳斥这个荒谬而卑劣的控告——说他是间谍，是阴谋暗杀他热爱的导师列宁的谋杀犯。”^①最后，他遭到了和那些宁死不屈的人相同的命运，他被枪决了。

罗莎·迈耶-莱文在回忆布哈林的文章中最后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布哈林……他把他的整个人格投向狼群后，那样悲惨地试图拯救他在个人和革命方面的荣誉剩下的一些残片；布哈林在词句上战斗，天真地提醒迫害他的人维辛斯基

^① 乔治·卡特柯夫，《布尔什维克受审》，第53页。

搞一项秘密交易，容许他保留一些尊严，而与此同时，他开始为自己蒙上永恒的耻辱；他有时很象一个孤单无助、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子。

“一些骄傲而才华横溢的人，在审讯中成为泣不成声的蠢夫，不敢承认自己光荣的过去以及自己本来的面目；在这些人当中，布哈林是最具有悲剧性的人物。

“杀害他的刽子手们要他承认的那些罪行，他一个也没有犯过。但他因为犯了一个超过一切罪行的罪行而受到惩罚——那就是在毁掉他一生工作的同时，也毁掉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当布哈林默认对手们伪造的思想时，他就开始毁掉他自己，毁掉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个老卫士。他一旦踏上这条道路，就一步一步难于再弯回来了。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他那一代最优秀的人物的悲剧。布哈林尽管有那么些错误和弱点，仍然稳固地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投向他的种种谎言和诽谤，并不能抹掉他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标记。布哈林这部著作的出版，将有助于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智力巨人中恢复他应有的地位。

英文版编者绪言

一

本绪言的职责是分节说明一些问题。第二节概述就罗莎·卢森堡的两部著作展开争论的前因后果：一部是她的主要作品《资本积累论》，另一部是被认为续篇的《反批判》，后者收在本书中。第三节简述马克思关于扩大资本再生产的图式，包括不熟悉这些图式的人们所应了解的内容。第四节转向扼要说明卢森堡和布哈林就争论的问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第五节谈其他作者对卢森堡的意见，但只是有选择地谈一点。第六节在说明我们对卢森堡的理论的一些想法的同时，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作一阐述；我们在这当中陈述我们认为卢森堡存在的主要误解和缺点。帝国主义问题放在第七节中谈，这一节简要地叙述其他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同卢森堡的关系。最后在第八节中，我们试图总结并得出一些结论。

有的读者可能愿意把本绪言的某些节暂时放一放，等到读完原著后再回过头来看。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些节的内容，因为我们有必要不得不简述某些论据。对卢森堡和布哈林进行研究后，这些节的内容可能更清楚些。

我们在书后还补入三篇附文，我们希望这些附文有助于澄清书中所讨论的某些部分。这些附文只能这样处理，因为如果我们试图把附文的内容写在本绪言中，就会使行文受到妨碍。

二

关于资本积累问题的争论，一般认为来自卢森堡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给她的朋友们的印象是，她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她试图写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还因为她钻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以后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看看卢森堡的传记和对那个时期进行一次考察就会明白，总的说来正是由于帝国主义问题——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德国垄断资本结合的具体形式，才使一些表面上抽象的问题卷进激烈的政治争论。

卢森堡受过作为经济学家的学院训练，并且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足够她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进行教学。因此，她不可能不熟悉她所提出的问题，而这就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到1912年这些问题对她才具有严酷的意义？这只有把这些经济研究放到政治的范畴中才能找到答案——卢森堡为反对修正主义而斗争，她试图警告德国党注意帝国主义的危险及其在该党内日益增长的影响这样一些范畴。她对社会民主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堕落所抱的忧虑，到1914年8月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当时该党的议会党团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赞成战争贷款。

《资本积累论》初版于1913年，这本书在德国党的报刊上以及甚至其他方面都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这连卢森堡本人似乎也大为惊异。考虑到她通过社会民主党取得的相当巨大的进展，这本不应使她那么惊异，这一点表明了她是怎样把她的生活和思想区分开的。

《反批判》是1915年在狱中写成的，但到1921年以前还不曾

出版；本书收入的这篇著作是第一次用英文出版。文章使用的轻蔑口气和高度论战性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卢森堡对于她遭到猛烈攻击感到的惊讶，但也一定同当时支持或反对战争的争论有关。由于当时严厉批评《资本积累论》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同时也是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人，毫无疑问，这使卢森堡在捍卫自己的理论主张方面产生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感觉，从而使她看不到她的对手们提出的某些正确的论点。毕竟当时关在监狱里的是她，而不是那些批评她的人。

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虽然写于1924年并且印刷了几次俄文版和德文版，但以前一直没有译成英文。由于该书直接攻击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中提出的思想，把后者收入本书将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掌握争论的问题。《反批判》虽然是对批判者作出的答复，但自成体系，可以说是一本单独的著作，因为它以无可辩驳的形式概括了散见于原著中的论点。因此，布哈林针对该书提出其大部分批评的做法是正确的。

布哈林写这个著作的时候，正是他作为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发言人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因此他以这种身份说出的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很重的份量。另外，还必须把这部著作放在历史的范畴里：布哈林写此书时，正值德国共产党内进行一场反对“卢森堡主义”运动。因此，这部著作帮助了德国共产党诸如马斯洛夫和费希尔等领导人，这些人是想从党内清除卢森堡主义的遗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卢森堡主义”是被当作右倾提出来的，而后来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进行另一场反对它的运动时，却又把它看作左倾了！）虽然如此，布哈林并没有攻击卢森堡的整个思想体系，因而他的论战不能只看作派别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著作就不会依然有其价值了。

三

在写下去以前，有必要向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些文中使用的名词以及它们同所争论的问题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社会总产品流通时，假定闭关自守的经济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所有其他阶级都被排除在外，因为据认为其他阶级的收入都来自那两个基本阶级的收入。社会总产品分为 C 、 V 和 S 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不变资本指一定时期（一般是一年）消耗的原料和固定资本。同这种提法有联系的问题之一是，在任何特定时期消耗掉的固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等）只有一部分。这有时导致混乱，因为图式中并不包括固定资本的主要部分——似乎可以说，这一部分被抛到一边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假定来克服，即所有的固定资本在一定时期全部消耗掉了。但在计算利润率时，这可能引起一些问题，因为马克思表述的利润率是 $\frac{S}{C+V}$ ，这事实上是流通额的利润率，而不是全部投资的利润率。还有，在计算平均利润率时，整个资本是考虑到的。但是在不变资本中，如果来自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被认为是折旧部分，这个问题就不一定妨碍人们的理解。

可变资本通常指作为工资支付的那部分资本，即为了购买劳动力而支付的资本。

重要的是要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使用这些名词。不变资本这样定名是因为它在整个生产周期中都保持着它的价值，它本身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仅仅在生产的每个阶段转移到新商品中去，所以它的价值被认

为是常在的、不变的。另一方面，可变资本则购买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当劳动力作为劳动进行操作时，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即支付的工资），而且创造一项额外的价值。所以马克思选择了“可变资本”这个概念。

这种分类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学说扼要地说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这里用数字举一个例子：资本家为一天的生产支付值五个单位的原料和机器折旧等，比如说 $5C$ ，还支付值两个单位的工资，比如说 $2V$ 。在这一天的过程中，劳动者生产十个单位价值的商品。这样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即十减去五再减去二，也就是 $3S$ 。因此，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无偿地生产的那一部分。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一种和每一件商品都包括 $O—V—S$ 的因素，商品没有哪个单独的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公式，他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指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指消费资料的生产。马克思首先用这种分类来说明简单再生产，即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仅仅再生产任何一个时期用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没有扩大社会总产品。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式，但它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几个重要论点上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式：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 \text{第二部类}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l} O + V + S \\ O + V + S \end{array} = \text{社会总产品}$$

现在把数字填入这个公式：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 \text{第二部类}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l} 4,000O + 1,000V + 1,000S = 6,000 \\ 2,000O + 500V + 500S = 3,000 \end{array} ,$$

= 社会总产品 9,000

这个公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开始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第一部类的 $1,000V$ 和 $1,000S$ ，从自

然形式来说是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的，但是从价值形式来说，则代表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由于只有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这就意味着，第一部类必须用同等数量的价值同第二部类进行交换，才能得到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同样，在第二部类中，商品的自然形式是消费资料；这意味着，为了继续生产，第二部类必须取得商品来替换生产中用掉的 $2,000C$ 。这两种情况都表明，每一部类都必须用自己的某些产品同另一部类进行交换。实际上，这意味着，第一部类用 $1,000V + 1,000S$ 交换第二部类的 $2,000C$ 。

第一部类的 $4,000C$ 和第二部类的 $500V + 500S$ 又怎样处理呢？它们都在本部类内部消费了。在第一部类中， $4,000C$ 用于生产性的消费，重新构成不变资本；在第二部类中， $500V + 500S$ 被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消费了。这两种情况都是假定交换在有关的部类内部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在简单再生产下取得平衡的条件，我们必须接受下列公式：

$$I_v + I_s = II_c$$

在每个生产周期开始的时候，有 $7,500$ 资本投入流通，因此：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 4,000C + 1,000V = 5,000 \\ \text{第二部类 } 2,000C + 500V = 2,500 \end{array} = 7,500$$

在周期过程中，社会总产品为 $9,000$ ，其中 $1,500$ 为剩余价值，由资本家阶级在没有任何替换的情况下用于非生产性消费。

当然，必须说，这样一种情况是高度抽象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各种形态的社会都会留下一些差额以防天灾等。但是，这个图式的用处在于，它为任何要生存下去的社会突出地指出了必要的条件。其次，对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确定了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和剩余（价值）周转的具体形式。马克思进一

步用这个图式强调工人阶级遭到剥削。应当着重指出，这种剥削不是用诡计花招来进行的，因为假定工人劳动力的全部价值都得到了偿付。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也是决定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数量。^①

剥削就是被认为不从事生产的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用。但是，简单再生产的图式是静态的，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基本上是一种扩大的能动的模式。他开始说明这一点时，介绍了一种扩大再生产图式，即资本积累图式。

运用马克思自己的图式，我们在第一年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quad 5,000C + 1,000V \\ \text{第二部类} \quad 1,430C + 285V \end{array} = 7,715 \text{ 投资资本。}$$

在生产周期的过程中，剩余价值产生出来，它向我们呈现这样的情况：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quad 5,000C + 1,000V + 1,000S \\ \text{第二部类} \quad 1,430C + 285V + 285S \end{array} = \text{社会总产品 } 9,000$$

这里应当说明几点。第一，马克思假定百分之百的不变剩余

^① 琼·鲁宾逊夫人在《资本积累论》英文版的绪言中，对马克思所表述的工资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说，“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是要把工资水平降低到工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维持费用所规定的限度。但是，一个家庭有多大呢？如果由一个工人的一定工资所供养的平均规模的家庭，形成一种正好适应资本积累率的人口增长率，那将是非常偶然的……”（《资本积累论》第15页）

这里可以提出三点。第一，马克思对工资水平的表述并没有说工资将降低到最低生活维持费用水平。马克思明确地说，工资水平将因困而异，因时而异，因为在计算和决定总的工资水平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第二，鲁宾逊夫人可能认为平均工资应当足够维持平均家庭人口的生活是一种“偶然”，但这是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正常的工资解决办法并没有规定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的不同需要。工资解决办法并不是以这些假定为基础，而是以提供的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与此有关的另一点是，鲁宾逊夫人没有把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同他的劳动后备军（即失业者）理论联系起来，这个劳动后备军是资本主义人口增长（这与人口的绝对增长无关）的特定形式。今天在西德和瑞士这样一类的国家可以找到这种最邪恶的形式，它们从贫穷的国家输入劳动，而在不需要的时候把他们送回國。这种做法十分清楚地说明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现实情况。

价值率。第二，第一部类总是使它的百分之五十的剩余价值变为资本，而第二部类不是这样。在积累的第一周期，第二部类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但在以后的每个周期是百分之五十。还应当指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率保持为一比五，这个比率假定在生产方法上不发生技术上的变化。

在第一轮积累结束的时候，获得的结果是：总资本从 584 增加到 8,399，社会总产品从 798 增加到 9,798。^①

应当着重指出，人们不应当寻求给予这些图式过重的份量，因为这些图式本来是准备说明一个理论模式的。一旦某些假定作了修改，就会开始出现一种不同的图景。马克思深知这种状况。但是，这个模式的确阐明了这样一点，即对产生积累来说，某些比例还是需要的。但需要的比例对每个周期都是特有的，这表明平衡是一种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的状况。

四

卢森堡在讨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时提出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归纳如下。一旦人们开始去掉一些限制性假定并观察实际运行的资本主义，那个图式的缺点就开始出现，其中最严重的是马克思假定他的图式中不发生技术上的变化。一旦采纳了这种假定（即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而这意味着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的价值增加），第二部类就会开始出现一种生产剩余，而这种剩余在假设的封闭体系内是不能被吸收的。这意味着，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要实现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就必须在两个阶级的体系以外寻求市场。实际上，这意味着，只有在资本主义扩展到第三市场即小商品生产、封建制度生产等基础上，才能产生积累。

^① 关于再生产图式的详尽说明和讨论，参阅附文一、二。

这种经济在市场关系上同资本主义越密切，它作为独立实体遭到毁灭并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就越迅速。但是，这个“第三”市场并不一定是外国或海外市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很近时期以前，在本国往往可以找到这种市场。卢森堡说，没有这个“第三”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没有这个市场，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因为缺乏一种实现全部剩余价值所必需的有效的需求，而这是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需要争夺新市场和出口——的基础。

布哈林从《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中提出一系列问题，试图表明卢森堡自己的若干假设是有毛病的。撇开从技术上说明扩大再生产这一点，也许他反对她最有力的一点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前提问题。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创建并借以吸取超额利润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机器同卢森堡的前提即所有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假定按照正常的比率）作了鲜明的对比。布哈林问道，在开始到海外从事冒险事业以前，在国内剥削那些第三市场，那不是更安全和少费力气了吗？布哈林提出的其他有趣问题使他离开原来讨论的问题，而从理论上说明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组合，它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从而以一种即使不快但总是有规律的比率进行积累。毫无疑问，布哈林是批评卢森堡的最老练的人。他坚持自己的论点，但他仍把卢森堡当作诚实而有才智的对手。

五

在英语世界中，有为数较少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讨论罗莎·卢森堡关于积累的思想，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作过真正详尽的说明，布哈林的论述或许是现有最详细的。许多人承认卢森堡具有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甚至更加具有作为革命战士的能力；他

们进行这样的评论是想使之具有一种一般的安慰性质。但是与此同时，她的名字却在许许多多书中出现，即使仅仅在脚注中出现。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哈林甚至就更加漠视了，因而他们没有写出什么有份量的东西。

在讨论过卢森堡思想的少数作者当中，我将只提出几个最杰出的人物，因为他们的作品将会拥有最（相对来说）广泛的读者。其他批评家大多数是从这些流派中派生出来的。

保罗·M·斯威齐^①认为卢森堡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属于消费不足思想派。他认为，卢森堡的立场是混乱的，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她在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讨论中盲目地坚持关于简单再生产的一些假定。他争辩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她就不能看到由于增加不变资本而雇用的额外工人有可能成为第二部类的额外市场。不仅如此，他还断言，如果资本家必须同“第三”市场进行交换来实现剩余价值，那么，这只会延缓问题的解决，因为只能进行货物交换。

“只向非资本家消费者销售而不向他们购买，这是不可能的。就资本主义流通过程来说，剩余价值不能这样处理；它顶多只能改变其形式。”^②他进一步争论说，如果问题真象卢森堡所说的，那就不是资本主义日益接近崩溃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③读者将会看到，布哈林也提出了这一点。但是，问题似乎是，两位作者关于“第三”市场有必要性或无必要性的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他们也都陷入了另外的错误。从含义上说，他们似乎无意识地接受了萨伊规律，这个规律假设，每一笔销售也是一笔购买，因此总的说来保持平衡。马克思在其所有关于这个问

① 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② 同上书，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205页。

题的著作中花了些力气，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销售和购买并不等同。在小商品生产下，可以说流通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C—M—C）。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生产者出售他们的商品，所以他们可以买进其他商品；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事物的顺序是：销售商品，变成货币，购买商品（C—M—C）。对资本家来说，过程不同：他从货币开始，买进商品，又试图卖掉商品来获得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式将是货币——商品——货币（M—C—M）。^①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用他的货币买进商品时，并没有得到保证能够卖掉这些商品；即使他得到保证，在两次行动之间也需要一个时间滞差。此外，他向之买进商品的人不一定就是他向之出售商品的人。因此，每次出售和买进商品都是独立的行动。那些向“第三”市场输出商品的资本家并不就是那些输入商品的资本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出入将相互抵销；所以向“第三”市场销售的东西将不得不同买进的东西相等。但是，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指出的，^② 同非资本主义市场进行交换，不一定意味着交换商品；这种交换可以是交换非资本主义的货币收入。所以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曼德尔在反对卢森堡的争论中走的是另一条路。他认为她的“错误在于把世界资本家阶级当作一个整体，即没有考虑到竞争”。他指出，竞争“决定资本主义的整个动力，所有的发展规律”。^③ 曼德尔进一步详述了他的论据，他指出在国内、国际以至于工业内

① 事实上，公式应当是这样的： $M-C \begin{matrix} L-P-C'-M' \\ \text{imp} \end{matrix}$ ，M是货币资本；C是商品资本，由劳动和生产资料构成；P是生产过程；C'是扩大的商品资本；M'是扩大的货币资本。

② 欧·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362页。

③ 同上书，第363页。

所有的层次中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他接着说，“这一点说明了如何在甚至没有任何非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如何在这些条件下通过一种具有资本集中特点的市场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实际上，同非资本主义环境进行交换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方面。”^①曼德尔指出的问题实质是，竞争意味着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并由此而实现剩余价值。这种解释似乎有些含糊不清，因为它好象来自马克思主义对平均利润率所下的定义，价值由此而转变为价格和利润。^②从卢森堡的观点来看，曼德尔提出的证明正是需要证明的东西。曼德尔的这个似乎是相当偶然提出的最后一点论述，部分地承认了卢森堡提出的论点。他没有详细阐明这一点，因此人们怀疑，同非资本主义环境进行交换对他究竟多么重要。这样，他似乎是在把卢森堡的主要论据掩盖起来，因为他对同非资本主义环境进行交换这一点作出的回答仅仅是一种转弯抹角的回答。卢森堡争辩说这种交换对资本主义是极其重要的，而曼德尔却把这种交换降低到“一个方面”，使其重要性不明确。这有点类似同意一部汽车有若干重要构件，但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只是为了使汽车更加舒适或豪华。

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另一答案是莫里斯·多布提出的，它实际上很少回答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回答什么。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关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怎么能够进行积累？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直到第二卷的最末尾，马克思才对这个谜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向黄金生产者（他们被含蓄地包括在第一部类内）出售他们的产品来换取黄金。这个回答的关键不是我所想象的货币……进入体系，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同黄金生产者

① 歌·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362页。

② 参阅《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分。

进行的交换代表一种换取货币的单方面商品交换，而不是商品换商品的交换。”①

这似乎是曼德尔答案的变种，但事实上它混淆了黄金生产的两个方面。只要黄金还没有被当作货币使用，它就象任何其他进入市场的商品一样，同时任何黄金交换都必须被当作商品交换。那么，黄金在没有作为货币使用时究竟算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在生产中有许许多多用途的好东西，例如，珠宝饰物、金牙以及工业用途等等。另外，因为当作货币使用的黄金在黄金总生产中只能占一部分，在社会总产品中占甚至更小的部分，它不能完全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接受黄金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一点，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往往导致这样一种情况，随着总生产的增加，人们将需要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黄金。正象布哈林表明的，这是十分荒谬的。在资本循环中，黄金作为货币来使用只是一瞬间的事，而由于所有的商品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交换的，黄金在实际实现的剩余价值中只占一小部分。多布对《资本论》第二卷末尾的一小段话给予过高的评价。这一段话本身就有点暧昧不明，而马克思写得最少的也正是这一部分。依靠这一小段话就使马克思看起来象一个变戏法的人在表演结束时从帽子里拿出一只兔子——卢森堡对他指责的正是这一点。

多布还十分错误地谈到卢森堡用对外贸易来实现剩余价值，其实她在许许多多段落中说得很清楚，这种“对外贸易”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认为的对外贸易，而是同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贸易，并且不一定是同外部的贸易。所以多布似乎把这一部分的问题所在搞乱了。

汤姆·肯普作了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叙述和批评，他十分正确

① 莫·多布《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第 269 页。

地指出，大多数提出批评的人都趋向于在误解的基础上否定卢森堡的立场。他说，“对卢森堡的立场进行批评必须依据诚实的态度，承认她是在力图抓住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想象的问题”。^①不幸的是，他自己就没有抓住问题，而只不过是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他否认扩大到非资本主义市场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但他承认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同非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这说明资本主义还可以选择其他手段；但是，我们被告知，在“第三”市场进行积累的做法是一种必要的做法。这样，不是可以选择就是面对必要性，而后者包括前者。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必要性来自需要实现剩余价值本身，而同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交换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部分。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提出的严格理论性问题和一种历史分析之间就面对一种混乱。肯普想维护卢森堡提出的公平听取意见的要求，结果不知不觉地两头落了空。

肯普是考察过卢森堡这一理论的少数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军火开支是克服实现剩余价值问题的手段之一。^②他一方面指出卢森堡在这个领域是一位创新者，同时评论说：“罗莎·卢森堡在国家预算平衡这一思想的束缚下，不可能把军火开支的可能性描绘为实现剩余价值并在现代的规模上进一步积累的手段。”^③这似乎有些苛刻，因为卢森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仅缺乏预见，而且缺乏具体经验，所以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并不损害她的概念的真正光辉，因为这种概念使她在这件事上远远走在她的任何同代人的前面。不仅如此，肯普由于提出平衡预算和反提出赤字

① 汤姆·肯普《帝国主义理论》，第55页。

② 参阅《资本积累论》第32章。

③ 肯普，前引书，第58页。

财政（即通过贷款而债台高筑）而忽视了关键的一点：有一个平衡的国家预算，就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避免一次危机——因赤字财政固有的贷款“气泡”破裂而引起的危机。甚至一个平衡的预算可以对经济发生真正刺激效果（这与通货膨胀的预算相反），只要掌握真正未使用的资源（即因为消费与节省的限界倾向中某些不变因素，收益增殖率将仍然起作用）。的确真实的是，实行赤字财政可以发生大得多的效果，但是卢森堡图式具有的“长处”在于，即使是一种得到充分利用的经济，也还要考虑到军火开支，因为它容许把价值从工人阶级方面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为其他用途而解放生产。

肯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忽略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即卢森堡在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来说明军火开支时，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部分在较后阶段产生的收入。从为这个图式提出的那些假定看来，这将是不可容许的。她也没有表明这种额外收入如何列在这个图式中，这使这种收入不清不楚和缺乏根据，因为它将代表没有供应的额外需求。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友好的评论者，那就是托尼·克利夫。他在《罗莎·卢森堡》这个小册子中用了一章篇幅论述她的积累理论，独一无二地涉及到她的原作。不幸，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她对问题的提法完全搞混了。克利夫按照罗莎的评论重述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第一个图式。这些评论十分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在第一次尝试中得出了一些奇特的结果，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在每一时期积累其剩余价值的百分之五十，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则以非常不稳定的情况积累其剩余价值。克利夫接着说：

“……如果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关系制订了任何合乎逻辑的规则，那么，在为第二部类等建立这些关系时，本来是可以牺牲任何原则而得到这些规则的；如果这些合乎逻辑的规则象运用于

第一部类那样也运用于……第二部类的积累，第二部类中以过分生产为形式的不均衡就会出现并且累进地增长。”^①

读过这段话的任何人都会认为，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批评集中在他的第一个扩大再生产图式上，但是卢森堡完全知道马克思抛弃了那个图式而提出了第二个图式。事实上，她对第一个图式的评论是想表明为什么她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它。在他的第二个图式中，剩余价值的积累在两个部类里都是以同样的比率进行的（在第一轮以后），卢森堡作为正确的论点接受了它，如果它赖以建立的那些假定站得住脚的话。实际上，克利夫歪曲了卢森堡的立场，他说，她争辩说，扩大再生产的第一个图式使两个部类之间产生了不平衡。其实，她对第二个图式也没有这样说。

克利夫提到对图式的一些修改——剥削（即剩余价值）率的不断增长、积累率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然后说：“如果考虑到这些，卢森堡说的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下经济不平衡将是一种绝对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的现象这一论点，将会大大加强。”^②但是，卢森堡的确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不是不变的5对1比例……我们假定，例如，伴随着资本的这种增长而来的是累进地重新调整资本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在第二年是6对1，第三年是7对1……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剩余价值率也按照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而累进地增长，因而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象图式（第一个图式）那样的数量——已经假定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减小——到八

森堡才得出结论：剩余将在第二部类中出现。没有一个想了解卢森堡思想核心的人能够在这种提法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

六

显然，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进行的争论牵涉到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大多数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有时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市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根本性问题，基本问题是生产问题。对此的简单回答是，市场问题仅仅是同一硬币的另一面。

让我们来考察这个基本问题，并首先回到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我们已经指出从这些图式产生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仍然需要作一些阐述。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这些图式表明了在没有竞争的理想的和理论上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如何为此规定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些图式，而不应当试图把它们直接套在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的现象上。这不是说这些图式同现实没有关系；相反，它们说明，制度是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运行，不受真实生活中任何抵销倾向和变动的影响。例如，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总是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方法并存而具有关系的，但是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显然并不认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方法是一种必要的关系，因此排除了它们。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似乎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考察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和亚当·史密斯的错误，马克思声称，史密斯抽掉了不变资本，而只留下 $V+S$ 作为社会生产的数额（工资、利润和租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资本的不变部分就会溶解在 $V+S$ 中，工人阶级也用不着为反对占有它的无偿劳动而斗争，而只等待其劳动产品溶解在工资中就行了。恰恰相反，马克思表明，不变资本远远不是这样溶解自己，而是变

成资本家用来支配活劳动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称之为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情况。马克思进一步用他的再生产图式、特别是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来回答消费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争辩说，因为缺乏有效的需求，就不可能实现全部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和生产只是间接地联系着，即在钢的生产和为个人使用的消费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对了解下述论点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扩大得更快，只有到最后消费才能赶上生产。这意味着，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自己最好的市场，市场问题就基本上为资本主义本身所“解决”。

再生产图式应当提到的另一方面是用两大部类来划分社会生产。在讨论价值计算转变为价格时，各种各样的作者设计了使用三个部类（有时四个部类）的图式。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的讨论中也包括第三部类，她把黄金生产放在这一部类，说这是马克思所认可的。但是，事实上，马克思非常谨慎，他只用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他十分具体地把黄金生产列为第一部类的一个次部类。这可能看来仅仅是一种诡辩之词，但事实上它是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使用两个部类，而且仅仅两个部类，这是因为他要表明制度最深处运行的情况：创造再多的部类意味着偏离他工作所依据的抽象水平，从而可能最后陷于混乱。不仅如此，分为两个部类的再生产图式不仅是一种技术性说明，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是描述社会中两大阶级——即资本家和工人——的具体份量。马克思是在表明一种阶级关系。

卢森堡争辩说，《资本论》第二卷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和第三卷在资本主义矛盾方面提出的思想有矛盾。此外，卢森堡还以最刻板的态度对待图式，她假定积累是一个行为或者一瞬间的事，而不是通过时间展开的一个过程。她还没有看到，图式事实上只是

事情发生以后的一种事后提法。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和现实之间的混乱不断地掺杂进卢森堡的阐述。如果人们以同等的条件把这两卷《资本论》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实际运行情况的描述，人们只能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卢森堡对向她指出这一点的批评者很厌烦，但她确实犯了这个错误。进一步说，卢森堡心里显然不十分明确这一点：如果没有“第三”市场，资本主义是否不能实现任何剩余价值，或者是否只能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

也许可以对卢森堡提出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卢森堡把“第三”市场当作这个过程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从来自剩余劳动产生的东西改变为一种从外部来源吸取其主要营养的过程。换句话说，她是把对“第三”市场的剥削而不是把对工资劳动的剥削作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根据这个前提，那就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劳动者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同资本家阶级一起成了联合的剥削者！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再是一个正确的主张了。资本主义将要么通过“第三”世界的袭击而崩溃，要么在这个市场因为没有能力实现剩余价值而取消时陷于崩溃。^①在每种情况下，这都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垮台中顶多只起一种纯粹被动的作用，或者他们将同其本国的资本家阶级一道击退“第三”世界的反叛。

从另一个水平上说，卢森堡关于剩余价值实现理论的逻辑可

^① 要考察一种表明这种思想的尝试，可参阅附文三。

以解释为，剩余价值不是从工人阶级中得到，而是资本家通过同“第三”市场进行贸易来得到利润，其方式很象在一个组织不完善的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商人资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通过一种不平等的价值交换。^① 这将好象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的思想似乎把我们带回到十八世纪重农主义者中间，只有农民阶级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这正好割裂了马克思在分析纯粹资本主义时提出的主要假设，即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价值交换的。另一方面，布哈林在介绍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家托拉斯这一思想时甚至试图表明，在关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实现剩余价值是可能的。他没有说这是一种盖然性，但他的确认为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过，如果这种社会存在的话，那将不再是资本主义，它将不是商品生产经济（象马克思所下的定义），它将没有竞争，而且它将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交换。这样，他就犯了他指控卢森堡所犯的同样错误——把某些想法当作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他们在这个结论上实际上都是不合逻辑的。

卢森堡不断地寻求那些推动资本家去积累的“动机”时，在寻求市场中陷于绝望。她这样做就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关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假设中所包括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即假定所有的剩余价值都可以实现（也就是所有的商品都卖掉），这样，只有在寻求更大的利润这一意义上寻求市场才可以说得通。而寻求更大的利润又决定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马克思把危机的真正原因归之于这一点，而不是归之于缺乏有效的需求。但是，当然，《资本论》第二卷中没有提到这个论点，只是第三卷中才提到。人们不得不问，卢森堡除了寻找矛盾以外，不去看看马克思的全部

^① 我很清楚，世界市场上有一种不平等的劳动时间交换，特别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的价值交换。

著作而只死抱着第二卷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七

帝国主义问题是从这个讨论中产生的。卢森堡认为，她的“第三”市场具有必要性的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说明。但是，象她自己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一个从这个制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的过程。不看这个制度中发生的任何变化，就说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而争夺殖民地和进行随之而来的战争仅仅是过去的发展趋势的继续，这种争辩是看错了形势。实际上，卢森堡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尽管她的第一部著作中有丰富的说明材料。

布哈林认为，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把她不知不觉地引进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人们的阵营。他指出她对现象下的定义：“帝国主义在竞相争夺非资本主义环境中仍然空着的地盘的斗争中，是资本积累的政治表现。”布哈林争辩说，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有巨大的唯意志论成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她置于象霍布森所属的一样的阵营。

“帝国主义”这个词汇是在进入本世纪前后通用起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去探讨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次要的方面。然而，我们要强调指出，第一个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那种适用于殖民主义的普遍用法——使用这个词汇的是英国的自由派 J. A. 霍布森，他是在 1902 年写《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一书时使用它的。这比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讨论都要早些，的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者都承认他的工作起了先锋作用。

霍布森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对帝国主义作了实质性的解释，而不是庸俗的侵略主义的或军国主义的解释。他宣称，帝国主义的

主要根源是：

“如果这个国家的消费公众按照每次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那就不可能有过剩的商品或资本需要采取帝国主义的做法来寻找市场；对外贸易的确还会存在，但用我们生产的一小部分剩余产品来交换我们每年输入的粮食和原料是不会有困难的，而我们积攒的全部储蓄如果选定在国内工业使用，那也是能够做到的。”^①

霍布森十分深刻地争辩说，“剩余”资本产生这种压力的原因之一是资本集中于卡特尔和垄断集团；在这方面，他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对问题的了解上都走在卢森堡前面。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仅仅简短地提到垄断集团一次，显然没有把垄断集团同帝国主义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

霍布森对垄断化趋势提出一些尖锐的评论意见后，作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就是大工业控制者努力扩大其剩余财富流通的渠道，即寻求国外市场和国外投资来处理掉他们在国内卖不掉或用不完的商品和资本。”^②作为“消费不足”派的追随者，霍布森争辩说，要使消费能力的重新分配有利于工人阶级，那就要铲除帝国主义。但有一个大缺陷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只有利于一小部分资本家阶级的政策。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用不着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改变这种政策，这将意味着，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必要改变根本的阶级关系。在这方面，卢森堡在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必然时更接近于现实。

起先是希法亭，后来是列宁，是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是帝国主义背后的力量。希法亭的著作《金融资本》可以称为分

^① J·A·霍布森：《帝国主义》，第81页。（有趣的是指出霍布森这部著作曾经不断地重印，这表明它的创新具有的重要意义。）

^② 同上书，第85页。

析这种现象的第一次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尝试，尽管从世纪之交起就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进行了充满活力的讨论。这场讨论是伯恩斯坦——最早的“修正主义者”——和帕沃斯煽动起来的，考茨基和卢森堡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希法亭的著作最早识别出，银行的作用在于促进垄断资本的发展，促成它们用来保护和扩大其特殊利益的侵略政策。他强调的特殊方面是银行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配，他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经验中吸收了大量东西来论证其论点。但这种情况现在只能看作是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自我筹措资金的企业组织大规模地出现了。

列宁从那些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比他论述早的人的著作中吸取了大量东西。不象卢森堡那样，他十分明了帝国主义的性质，他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①。我们在考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时候可以看出，列宁的态度与卢森堡有明显的分歧。虽然列宁在写作时主要是说明1914—1918年的大战，但是他明白，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卢森堡只看到延续性的存在。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页）。

(四)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五) 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①

我们从上述可以看出，列宁把过去已经提出的许多论述捏合成一个新的东西来说明帝国主义。

我们注意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列宁概述的第二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失效，即使它曾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认为银行本身今天已经不起主要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亲眼看到的不是银行支配垄断组织，而是二者统一起来了。第五点从列宁写那本书以来似乎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老殖民帝国解体并代之以“自治”国家。但是，只要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在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垄断组织（或者象有些人所喜欢说的，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的产生和扩展大大地加快了。这种发展已经为马克思主义作者和非马克思主义作者用大量材料所证明。但是，有一点也许将表明这种趋势已经走得多么远。我们从1968年3月19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

“在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坚实的金融中心是由不多于六十家商号、合伙商行和公司组成的，它们为大约一千人所拥有或控制。这些人领导着纽约城的投资银行，伦敦的商业银行冒险事业，巴黎的商业银行以及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类似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他们直接间接地提供每年需要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采取的做法是，把列宁这本书（由于其书名）说成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描述。但是，在原稿中本来想用的书名是“现代（现今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参阅《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0页。由此可见，列宁并不想把他的这本书当作在这个主题上的最后断语，也不想把他概述的发展阶段当作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断语。

用来促进工业国家长期发展的一百七十亿英镑新资本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五。”

因此，这样说将是真实的：列宁概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某些明确的特征，在他提出以来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变得更明显了。

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问题时抓住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思想，一个是垄断组织的成长和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之促成的变化，另一个是与商品不同的资本输出的需要。在这两方面，卢森堡都没有把它们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明显分歧。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并发展了一个新的观点。与卢森堡相反，他们争辩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处理“经济剩余”的问题。“剩余”的定义被定为“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东西和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①巴兰在其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更早一些说明了“剩余”的概念，书中说：

“麻烦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坚持经济剩余就是统计上可以观察到的利润……但是，事情的关键在于，利润并不等于经济剩余，而是构成……仅仅冰山的可见部分，而其余部分则为肉眼所看不到……因为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利润、租金和利息作为经济剩余的因素，而且在成本的招牌下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剩余部分。这是由于必要的生产工人的生产率与国民收入中给予他们作为工资的部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②巴兰详细阐述了这个论点，他指出，从合理的观点来看，同现代垄断组织有联系的活动有多少是浪费的，例如做广告。

①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第9页。

②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61页。

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中发展了这项理论，他们试图指出，现代垄断组织远远不是利润率下降（这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竞争情况下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是正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这就产生了剩余处理——或者象他们所称的“吸收”——问题。

然而，他们由于给经济剩余下的定义不够严谨，因而在分析中似乎变得有些混乱；例如，他们估计，在1956—1960年期间，美国汽车工业因改变型号而花费的成本——其本身并没有实行新的技术改变，也没有增进任何新的效用——等于销售价格的百分之二十五。这的确表明了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因为这种方法造成社会实际财富的损失。但是，当人们考虑到垄断资本家的需要，考虑到他们不得不努力保持或许还要扩大他们的市场范围时，这种成本又不是不合理的。鉴于生产的方式，这种成本是必要的。站在这个观点上就可以看到，这种非生产性开支有很多包括在特定的商品中所体现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量。巴兰和斯威齐忘记社会必要的东西也就是社会决定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技术因素。从他们对“剩余”的特有解释来看，他们在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资本输出问题上似乎也陷于混乱。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他们说，“该公司三分之二的财产留在北美，而它的利润只有三分之一来自该地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该公司的国外投资只有国内投资的一半，但它的国外利润比国内利润多一倍。上述利润率因而是国内利润率的四倍。”^①他们接着分析1962年赚取和分配利润的情况并得出结论说，“……付给股票持有者的约百分之四十的红利加上在美国的纯投资，都是由国外生意赚得的利润提供的。

^① 《垄断资本》，第194页。

换句话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一个很大的一贯的资本输入者。”^①因此，他们似乎要争辩说，霍布森和列宁提出的剩余资本问题并不是一个争论点。但是，这里似乎有些混乱的地方。首先，正如我们从巴兰较早著作中看到的，他们争辩说，很多归入成本的款项经常是隐蔽的利润（或剩余），所以书中的数字充其量只能作为掌握真实情况的一个轮廓。其次，也许更加严酷的是，收入和资本之间存在着混乱。从海外汇回的利润可以当作——只要它作为红利加以分配——收入，因此不能与资本等同起来，它是放进流通过程以增加剩余价值的价值。此外，如果投入海外的资本转移并投入国内，没有试图估价这会对国内利润率发生什么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剩余资本并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剩余，而意味着这样一点，到了这一点进一步投资将会降低国内利润率。

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②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答了某些批评这种立场的人。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经济剩余”的处理问题与实现剩余价值问题没有关系。具体地说，他们争辩说，海外投资是经济剩余的来源和使用。这样，他们就站到这样奇特的立场上：试图处理经济剩余，结果导致取得进一步的剩余。他们争辩说，现代帝国主义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动力是需要取得并控制原料产地，虽然较低的生产成本也可以说是一个辅助因素。尽管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展示了大量统计材料，^③而由于他们使用“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所引起的混乱，他们似乎只做到这样一点，即他们自己在帝国主义问题上陷于混乱。

尽管混乱是斯威齐——巴兰派引起的，这一派写出的著作对卢森堡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不仅不同意她的结论，而且不

① 《垄断资本》，第195—196页。

② 《每月评论》，1970年11月。

③ 关于马格多夫的著作，参阅《帝国主义时代》。

同意那个不得不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着重点上以及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的转变。卢森堡不断地设法了解工人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怎么能同她正在讨论的现象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劳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和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几乎不值得一提，这不是偶然的。这种不提的做法来自分析所使用的方法，而这样就把上述不提的事物同卢森堡在其中工作的那种传统大大地割裂开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欧内斯特·曼德尔既从历史上也从当时的表现上（要考虑到该书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写成的）论述了帝国主义。在说明主要的题目方面，它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这是一部紧跟列宁论点的著作，只有一点例外，他修改了列宁的这一看法：垄断组织倾向于放慢技术进步的速度。列宁的这一看法由于下列事实而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无价值的，一个是现有工业中工艺革新的迅速发展，另一个是1945年以来建立了若干新工业，例如电子工业。垄断资本家在国际竞争的逼迫下不得不加快技术革新并为剩余资本开辟新的出路。事实上，1945年以后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这种革命导致大大加强资本的活动程度和毫无疑问按照价值来说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

由于这种日益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①曼德尔关于资本输出的主要论点是，今天资本输出决定于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货物输出，而这些国家倾向于更换

^① 关于这一点，把巴兰和斯威齐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理论同约瑟夫·吉尔曼的著作《日益下降的利润率》（伦敦多布森公司1957年版）作一比较是有益的。这部著作从更长的时期考察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使用与巴兰和斯威齐很相同的做法考察非生产性开支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吉尔曼争辩说，根据他的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并没有失效，而是还在起作用。令人惊奇的是，巴兰和斯威齐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时决定无视吉尔曼的著作。

较旧的输出形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消费品工业有了发展，而这些工业倾向于换掉宗主国生产的这种商品。可以说明这种趋势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英国棉花工业的绝对下降。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遭到了全部损失，因为它们从它们参与的这种海外工业或者通过特许权和专利权都可以经常获得收入。

当我们回顾卢森堡的论据是消费品工业将会出现剩余时，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和卢森堡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依据是，如果某些假定作了修改，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就会出现剩余。在这方面，曼德尔处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流中。列宁和曼德尔都把剩余资本的思想放在帝国主义经济活动的中心。

八

在本绪言中，我们试图对两位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并说明了他们撰写各自的书以来有关领域的一些发展。我们不可避免地不得不集中到卢森堡的思想上来，因为这些思想都是“置于被告席”（姑且这么说）的思想。关于以后的发展，我们只能接触到很少的一部分有关帝国主义的材料。但是，在对这些材料进行的任何考察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大部分材料要么遵循已定——特别是列宁所定——的路线，要么基本上是说明性的和叙述性的。除了巴兰—斯威齐派思想以外，从本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任何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很少试图发展帝国主义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斯大林统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期间把列宁思想提升为经典性教义的缘故。我们希望出版这本书将促进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我们还没有解决卢森堡和布哈林提出的问题，因此就这些问

题进行讨论仍然是恰当的，我们的确会说，这些问题甚至更加中肯了。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自从1917年以来，仍旧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区域缩减到不足世界的三分之二了。同时，自那个时候以来从“第三世界”榨取的财富量已经大大增加，因此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从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个空前的繁荣和成长时期，这似乎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与1945年一种几乎普遍的期望相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可以正确地称为的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这种新情况的最后结果迄今还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

然而在写本绪言的时候，这样一点好象也是真实的：某些理论家一度宣称已经消除的某些资本主义特征，再一次重新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例如，某些国家日益增长的长期失业趋势和大规模的破产现象。这甚至没有去接触可能发生的生态上的和环境上的灾难——而这作为这种“返老还童”的资本主义的后果似乎正在隐约地出现在前面。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亲眼看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各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日益高涨的斗争。同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面对这种反帝斗争却主要采取沉默的态度。难道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没有指出一点这种现象吗？我们在这里没有试图回答这一类问题，只是指出来而已。

本书的形式也许说明了我们的态度。只有以自由坦率的态度进行思想交锋，这一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把以某一个个人的思想为基础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其结果只能扼杀一切创造力。本书应当看作是古典科学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一个部分。

肯尼思·塔巴克

资 本 积 累

——一个反批判

《马克思的信仰者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理论》

罗莎·卢森堡 著

1000

争 论 的 问 题

小书命薄——所有的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当我写作《资本积累论》一书时，有一种思想常常使我感到沮丧：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会说，我试图要说明和小心求证的问题，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对问题的解决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唯一可能的答案。结果大谬不然，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许多人批评说，我这本书一开始就完全走入了歧途，要解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成为一种纯属误解的可怜的牺牲品。必须说，与出版我的书有关的事态发展是相当不正常的。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①上发表的对《资本积累论》的“评论”，即使对于那些不大关心的读者来说，亦看出它的语气和内容都是惊人的；由于这本被批判的书都是客观的论述而且纯属理论上的探讨，不是针对任何一个活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所以就更令人惊讶。这还不够，这个中央机关报甚至采取了高压手段，反对那些发表评论肯定我那本书的人。这件事显得有点滑稽，而且是罕见的——对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进行纯属理论性的研究，居然受到一个政党日报的所有人员的责难（他们当中，大概最多只有两个人看过这本书）。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撇开了象弗·梅林^②和J·卡尔斯

① 《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日报，出版于柏林。

② 弗·梅林(1846—1919)，卡尔·马克思传记的作者，罗莎·卢森堡1914至1918年在她的反战宣传中的密切配合者。他四十六岁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该党报纸和杂志的赫赫有名的撰稿人。1919年，他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一道，帮助创建了斯巴达克联盟——它是德国共产党的直接前身。

基^①那些精通经济学的人，而只将那些把我的书撕碎的人封为“专家”。就我所知，任何其他政党的出版物都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命运。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的出版家们出版的东西也绝不会全是金子 and 珍珠吧！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这里面掺杂了其他感情，而不是“纯科学”的争论。为了恰当地判断这件事，人们首先必须至少了解一下所争论的问题的要点。

这本书为什么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书中某些外在的东西如经常使用的数学公式等，似乎是个很大的障碍。在批评我这本书的时候，这些公式就尤其成为焦点了。某些尊敬的批评家已经造出新的甚至更加复杂的公式来教训我。揭开这些公式的面纱，就会使普通人噤若寒蝉。我们将会看到，批评我的人之所以热衷于搞这些公式绝非偶然，这与他们对于这个题目的观点密切相关。然而，积累这个问题本身完全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它与数学公式毫无关系，不用这些公式也可以论证和理解。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一节里建造的数学模式，是作为一门精密科学来使用的，重农经济学派^②的创始人魁奈一百年前也这样做过。但是，那完全有助于解释和阐明他们的理论。而且，它帮助马克思和魁奈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进程就象大自然的进程一样，是由严密的规律所决定的，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混乱现象和明显的个人反复无常的独断专行。我所写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基础的，有一部分是批评他

① J·卡尔斯基，真名是朱里安·马什留斯基。他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卡尔斯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在德国工作多年。他于1919年到了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积极党员。1925年去世。

② 重农学派，十八世纪经济学派。他们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关于它的详细情况和对它的批评，见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一部分（莫斯科版）。

的——特别是关于他不进一步阐述积累问题，而只是提出几个模式和一种分析。我的批评就从那里开始，因此，我就自然要以马克思的模式来运用马克思的公式。我不能武断地删去它们，我特别想说明他的论据方式的不足之处。

现在，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利润动机来支配的。生产只在它给资本家的钱袋带来“纯收入”时才对他有意义，就是说，利润最终仍然要成为他的投资金额；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块利润，而是要得到不断增长的利润。这就是它与任何以剥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处。为了这个目的，资本家——也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剥削者——不仅仅是或者不是主要地把这些剥削得来的成果用作个人享受的，而是要越来越多地扩大剥削本身。他把获得的最大部分利润重新变为资本，用以扩大生产。资本就这样不断增加，或者如马克思所称作的“积累”。

作为积累的前提和结果，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地扩大。要做到这一点，单靠资本家的好意是不够的。这个进程依赖于社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旦已经运行和相当巩固，资本就通过自己的途径确保资本主义生产：

一、通过使工人刚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以进行进一步的剥削和再生产；

二、通过使中等阶级无产阶级化和使工人面对机器的竞争来形成一支常备的工业无产阶级后备军。

这个条件实现以后，即保险有无产阶级能供剥削而且剥削本身的途径受到工资制度支配以后，资本积累的一个新的基本条件就出现了——即有可能出售工人生产的商品，以货币的形式来补偿资本家原先的开支和从劳动力那里窃得的剩余价值。“积累的第

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① 稳步地增加销售商品的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以使积累保持连续不断的进程。资本本身（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为剥削创造了这个基本条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详细地分析和描述了这个进程。但是，实现这个剥削成果的可能性会是怎样的呢？市场的情况如何呢？它们要依赖什么呢？资本本身或者它的生产途径能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就象资本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工人数量一样呢？一点也不行。这里，资本依赖于社会条件。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其他所有生产方式有共同之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客观上，它必须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虽然主观上唯有利润动机才是要紧的。这个主观目的，只有当资本完成它的客观任务之后才能达到。只有当这些货物满足社会的需要，货物才能销售出去，接着而来的利润才能变成货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即资本的不断积累，是与同样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然而，社会需要是些什么呢？我们能否给它们作出更确切的解释和衡量，抑或我们非要依靠这个含糊的名词不可呢？事实上，如果用单个资本家的观点考察日常经济生活的表面，它们就似乎不可捉摸。资本家生产和出售机器。他的顾客是其他的资本家，他们购买他的机器来生产更多的货物。其他人扩大他们的生产时，那个人就可以更多地出售他的货物。如果其他人在他们的各个生产部门积累得越快，他就积累得越快。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家所依赖的“社会需要”：其他资本家的需求是扩大生产的先决条件。另一个资本家生产生活资料，并出售给工人。其他资本家（以及他自己）雇佣的工人越多，他能够出售的货物就越多，他能够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19页。

积累的资本就越多。但是，这些“其他的”资本家是如何扩大他们的工厂的呢？很明显，是通过其他的资本家（比如机器制造商或生活资料的制造者等）越来越多地购买他们的货物来实现的。

这样，资本积累所依赖的社会需要，细看起来似乎就是资本积累本身。

资本积累得越多，它就积累得越多；一切都变成这个耀眼的反复——一个令人目眩的圈圈。人们看不清它从哪里开始，或者推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圈圈里打转转，抓不着问题。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我们从这个表面的观点来看待它，或者从庸俗经济学的大众讲坛即单个资本的角度来检验它。

我们一旦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它的形式就立即显现出来，如果我们从总体资本的观点看待它的话。这是唯一恰当和正确的方法。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的观点，是他全部理论的基础。

自给自足的单个资本的存在确实仅仅是一个外部形式，即经济生活的表面，只有那些庸俗的经济学家才把它用作他们唯一的知识源泉。在那个表面底下，透过竞争的一切矛盾，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所有单个资本组成一个整体。而且，它的存在和运动是由社会的共同规律所支配的，这些规律在目前制度的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只是在单个资本家的背后起作用。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那末，社会需要就成为一个可以分为若干部分的可数的量。

让我们假定，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在某个地方堆积在一起，供整个社会使用。那末，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大堆货物是如何自然地被划分为几个种类不同和目的地不同的大的部分的。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里，生产总是要提供两件东西。第一，它

必须向社会提供食品、衣服，并通过物质货物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即是说，它必须在最广义的意义上为所有的阶级和不同年纪的人生产生活资料。第二，任何形式的生产都必须更新那些消耗掉的原材料、工具、工厂，等等，以使社会能不断生存下去，并向人们提供工作。不满足任何人类社会这两个主要需求，文化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甚至无政府状态到了极点但没有伤害利润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都必须满足这两个社会需求。这样，我们在这个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的整体中将会发现很大的一部分用于更换上一年度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些是原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马克思把它叫做不变资本）。各种各样的资本家必须相互生产这些东西，然后进行交换，以便所有部门的生产都能进行下去。根据目前我们的假定，是资本主义商业为这个工作进程提供了全部必要的手段。在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资本家之间的一个内部和家庭问题。当然，这个进程所需要的钱，是来自资本家的钱袋——因为每一个雇主都必须预先拨出货币资本——在市场上的交换实现以后又回到资本家阶级的钱袋里去。

因为我们仅仅假定按以前的规模来更换生产资料，所以同等数量的货币将足以使这个周期性的进程继续下去，然后让货币回到资本家的钱袋里休息一段时间。和一切社会一样，第二大部类的商品必须包括人民的生活资料。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结构是怎样的呢？人民又是怎样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呢？有两个基本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第一，是一般性的货物交换，即谁没有购买手段——货币，谁就不能从社会的商品储存中得到任何东西。第二，是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即劳动人民的绝大部分必须与资本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购买手段，而有产阶级则仅仅利用这种关系就获得生活资料。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以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它的先决条件，这两大

阶级在获取生活资料上是截然不同的。工人必须吃饭，来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以提供进一步的剥削，尽管他们个人的命运对于资本家毫无关系。从工人生产的全部商品数量当中，资本家给他们拨出一定的份额，这个份额是与他们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成正比的。工人以货币形式领取工资，购买这些货物。工人阶级就这样通过交换，每年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他们用这些货币从社会库存的商品——当然，它们是资本家的财产——中购买他们的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斗争的阶段分配给他们的。引起第二次大交换的货币，还是来自资本家的钱袋。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预付必要的货币资本来购买他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为“可变资本”——为的是使他的企业进行下去。但是，工人购买了他的生活资料之后（而且每一个工人都必须这样做来养家糊口），这部分货币的每一个铜板都统统回到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钱袋里——因为资本家把生活资料作为商品出售给工人。但是，他们自己的消费是怎样的呢？生活资料已经在交换之前通过资本主义关系以商品存货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根据这种资本主义关系，所有商品——劳动力除外——作为资本家的财产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正是由于它们是商品，所以“较高”等级的生活用品就作为许多单个私人资本家的财产出现了。因此，资本家之间必须进行一次象交换不变资本一样的总交换，他们才能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个交换也必须用货币来进行，而且资本家自己把必需数量的货币投到流通之中。象更新不变资本一样，这又是雇佣阶级的一个内部和家庭安排。这部分货币再次回到它原来开始的地方——进入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钱袋里。

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同种途径——它调节工资制度——确保了必需数量的货物和奢侈品是为资本家生产的。如果工人只是生产他们实际需要的数量，那末，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雇佣他们就

毫无意义了。当工人除了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即他的工资以外，还能提供足够的东西来维持他的雇主的生活，就是说，当他生产出马克思所称的剩余价值的时候，它才开始变得有意义。而这个剩余价值必须在提供其他东西的同时，向资本家提供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如历史上任何其他剥削者所需要的那样。资本家所要做的，就是去进行伤透脑筋的相互交换，获取必需的货币手段，来维持本阶级的艰难生存，确保它的物质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到了社会商品总数量中的两大部分：用来重复工作进程的生产资料和用来维持全体居民即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生存的生活资料。

当然，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东西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种臆想。有哪一个活着的资本家知道或者关心需要什么和多少东西来更换消耗掉的总资本和喂养全体居民呢？每一个资本家盲目地进行生产，同别人竞争，几乎看不到他鼻尖底下所发生的事，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但很明显，这里必定有一些在这个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一片混乱之中起着作用的看不见的规律，否则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完蛋了。而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研究）的全部目的，就是去探索这些在私人企业的混乱状态中组织整个社会的隐蔽规律。我们现在必须去探索这些资本主义积累——通过逐渐扩大生产积聚资本——的看不见的客观规律。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规律对于单个资本家的自觉行动不是权威性的；实际上，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自觉建造和操纵这些规律的总机关。因此，今天的生产象是一个蹒跚而行的醉汉，在所有这一切过剩和匮乏，价格波动和危机当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价格波动和危机在社会亦有其唯一的功能：把混乱的私人生产纳入一个广泛的联合体，不这样，社会就会立即瓦解。让我在这里与马克思一道设法简要地描述资本主义总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

关系吧。我们将省略那些具体的资本主义价格波动的方法和危机，而集中论述基本的东西。

除了我们目前已经谈到的社会商品存货中的那两大部分之外，肯定还有别的东西。如果剥削工人只是为了让剥削者过豪华的生活，那我们就会有一种现代化的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奴隶制度，而不是现代资本的统治。它整个的目的和目标是货币形式的利润和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当剥削在于获得更多的东西的时候，生产的实际历史意图才开始实施。剩余价值不但要允许资本家阶级过一个“适合于他们的身份”的生活，而且还要有一部分留作积累。这个实际意图如此重要，以致只有当工人生产这个利润和有希望以货币形式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工人才被雇佣。

在我们假设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总存货中，我们必须相应地找出第三部分，它既不是用于更新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也不是用于维持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它将是这样一份商品，它包含着剩余价值中那无法估价的部分，它构成资本存在的真实意图：即用于资本化和积累的利润。它们是什么样的商品呢？社会中又是谁需要它们呢？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积累问题的核心，而且我们必须考察所有的解决尝试。那些享用后一部分社会商品存货的人，真的可能是工人吗？然而，工人除了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得来的用于购买微量必需品的工资之外，并无其他手段。此外，他们不可能有其他的成为资本家的商品的消费者，尽管他们有许多需要尚未得到满足。使这一部分社会总产品和购买手段尽可能地少，这也是符合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按照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的观点——把这个观点与单个资本家的深奥思想对立起来看，这是很重要的——工人不象其他人一样是他们的商品的顾客，而仅仅是劳动力，他们必须从自己的产品中获得一部分来维持不幸的生活，

这一部分被压缩到社会允许的最低限度。

也许可能是资本家自己为增加自己的个人消费而成为那后一部分商品的顾客吧？那是有可能的，尽管统治阶级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穷奢极欲的情况下，都有足够的东西享用。但是，如果资本家自己象流水似地花掉全部剩余价值，那就不会有什么积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那就意味着极大地倒退到一种现代化的奴隶经济或封建主义。当然，这是可以想象到的，而且甚至有时是倒行逆施：我们可以看到直至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存在于美国的带有奴隶制和农奴制形式的资本主义积累，今天在罗马尼亚和国外各个殖民地也还存在着。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即自由工资制度下的现代剥削，伴随着用古代方式或封建方式挥霍剩余价值，忽视积累，这种违背资本的精神赞美歌的不可饶恕的罪孽是不可思议的。总体资本的观点又一次从根本上不同于单个雇主的观点。因为，对于单个雇主来说，“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是一种扩大销售的求之不得的途径，即是积累的一个良好机会。而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资本家来说，把剩余价值作为奢侈品全部消费掉，这是彻头彻尾的精神错乱，经济自杀，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积累。

那么，谁可能是那部分商品——它的出售仅是积累的开端——的买主和消费者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那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资本家。

然而，社会上不是存在着如公务员、军界人士、牧师、学者和艺术家等各种阶层，他们既不能算作工人也不能算作雇主吗？所有这些范畴里的人民的需要不是也得满足吗？他们不是可能成为剩余商品所追逐的买主吗？再说一遍：是的，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们可能是！如果我们把雇主看作一个阶级，考虑到社会的总资本，情况还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那些阶层

在经济上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附庸。如果我们要问这些公务员、牧师、军官、艺术家等等从哪里获得他们的购买手段，我们发现，它的一部分来自资本家的钱袋，一部分来自劳动工资（通过间接的税收制度）。从经济上说，这些阶层不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消费者阶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购买力来源，但可算作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消费中的寄生虫。这样，我们仍然看不到那后一部分商品的顾客，而他们可能是使积累进程开始的人。

总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也许我们就象那个骑着毛驴的人，还在拚命寻找他骑着的毛驴哩。也许资本家互为其余那部分商品的顾客——他们没有乱用它们，而是用它们来扩大生产，进行积累。那末，积累若不就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它还能是什么别的呢？完成这个目的的那些货物一定不能由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奢侈品来组成，而必须由各种生产资料（新的不变资本）和工人的生活用品（可变资本）来组成。

好，但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在我们假定积累已经开始和增加的生产在下一年里向市场投放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到顾客来购买这一批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呢？我们是否这样答道：这批数量增大的商品将再次在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以再次扩大生产，等等，每年如此，这是不是可以呢？那末，我们就有一个旋转木马，它在天空中自我旋转。那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资本的积聚，而是相反：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是全部商品的唯一顾客，除去他们必须拿出来维持工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总是必须用自己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实现剩余价值，那末，利润的积聚，为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

他们必须寻求许多其他的买主，这些人从一个独立的来源那里获得他们的购买手段，而且不象劳动者或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和自由职业者这些资本的合作者那样从资本家的钱袋里获得购买手段。他们必然是在商品交换亦即货物生产的基础上获得购买手段的消费者，这种商品交换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外发生罢了。他们必须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不能被看作资本，他们不属于两个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任何一个范畴，但他们仍然或多或少对资本主义商品有某种需要。

然而，那些买主在哪里呢？除了资本家及其一伙附庸之外，在今天的社会里再无其他阶级和阶层了。

这里，我们开始考虑问题的中心了。马克思就象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一样，在第二卷里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是独一无二的生产方式。他在第一卷里说：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①

他在第二卷里又说：“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②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里只有资本家及其附庸和工人；其他阶级，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资本主义生产面临我在上面试图指出的这样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各种解释，但只要 we 坚持这个假设，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637 页脚注。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 卷第 386 页。

即只存在资本家和工人而不存在其他阶级，那末，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就无法处理剩余货物，从而把剩余价值变为货币，并由此积累资本。

但是，马克思的假设仅是为了简化考察的一个理论性的前提。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唯一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和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里所强调的那样。实际上，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那些具有最发达的大型工业的国家里，都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和农村企业，它们从事着简单商品的生产。实际上，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即使在欧洲也还存在着那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仍然占强有力的支配地位的国家，如俄国、巴尔干半岛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西班牙等。最后，除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北美洲之外，还有其他幅员辽阔的大陆，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只不过撒下了一些种子；此外，这些大陆的人民有着各色各样的经济制度，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到封建、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制度。所有这些社会和生产形式不但相互共存着，并局部地同资本主义共存着，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十分活跃的交流。作为合适的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依赖于来自古老国家的农业和手工业阶层的消费者以及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如果不是技术上的原因，它缺少这些阶层和国家的产品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那些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环境里，资本不仅找到实现硬货币剩余价值，进行进一步资本化的可能性，而且获得各种各样商品来扩大生产，最后通过瓦解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来获得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

这仅仅是这种关系的表面的经济内容。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式样构成了世界舞台上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首先，资本同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例如易货经济、传统的社会关系以及家长式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有限需求等。因此，资本使用了政治暴力铁斧这个“英勇手段”。它在欧洲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用革命征服了那种封建易货经济。在国外，资本一开始就去征服和摧毁那些传统社会，这是资本诞生的世界性历史行动，从那以后，就经常出现积累的附带现象。通过摧毁这些国家的原始易货关系，欧洲资本就为商品的交换和生产打开了大门，把那里的人民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的顾客，并通过大量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和积聚起来的财富来加速它自己的积累。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欧洲积累起来的资本已经在这几方面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它找到了新的顾客，从而在本地生产形式的废墟上找到了积累的新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就这样由于它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得到扩张，用损害他们的办法而得到积累，同时把他们推到一边去，取而代之。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它的掠夺转变为一连串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世界危机，战争，革命。

然而，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在两方面准备了自己的毁灭。当它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与此同时，这个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资本规律激化了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使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远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就必然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

简言之，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和它的解决办法。乍看起来，它似乎纯属理论性的分析。然而，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是

显而易见的——这个同我们时代最突出的事实相联系的东西：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典型的外部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获得殖民地、势力范围、投资机会而进行的竞争，国际贷款制度，军国主义，关税壁垒以及金融资本和托拉斯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作用，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它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联系和它对于积累的重要性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它得到它的支持者和它的敌人的明确公认。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绝不满足于这个经验之谈。它一定要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规律，以便找出这一大堆五光十色的帝国主义现象的真正根源。这些情况向来是，唯有从根本上对这个问题作出精确的理论阐述，才能使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更有把握，更有力量，目的性更明确——这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和利润，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唯有关于剩余价值、工资规律和产业后备军的精确理论（正如马克思把它们作为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那样），才给这个实际阶级斗争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德国人的斗争以及其后的国际工人运动一直开展到这场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单是理论是不够的，人们有时可以用最好的理论搞出最坏的实践，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就是证明。这个垮台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造成的，而正是忽视了它所造成的。只有把工人运动的实践同它的理论协调一致起来，才能推翻它。在整个阶级斗争中，如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重要部分一样，我们只能从马克思的理论，从埋藏在他的基本著作中的财富那里，为我们的立场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然而，如果一个人对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是唯一的形式，全体人民只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所组成——作出的假设不提出疑问，那怎么可能呢？

不管你如何解释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结构，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也是常识，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那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但是，正如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看到的，马克思假定整个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其他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都已经消失了。如果帝国主义在一个社会里不再有立足之地，我们又怎能解释这个社会里的帝国主义呢？

我想，我要在这一点上开始我的评论。关于一个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个理论假设——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这是允许的（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某个工厂的单个资本和剥削手法所作的分析）——似乎不再适宜了，因为我们论述的是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由于这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历史进程，所以，如果把一切历史现实条件都抽象到一点，那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理解的。作为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在一个具有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结构的环境中，在一个经常性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经济互惠关系中发展的。我们怎能在一个不流血的理论虚构——它宣称这场斗争和各种关系的整个现实是不存在的——中实现这个进程呢？

在这里，根据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似乎特别需要放弃《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前提，把积累作为一个总进程包括资本的新陈代谢和它的历史环境来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末，对这进程的解释就同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自然地衔接起来，并与他论述经济学的重要著作的其他部分一致起来。

马克思自己只是对总资本的积累提出了问题，但他没作进一

步的回答。他首先选择那个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他分析的一个基础；但是，他不但没有把这个分析引导出结论，而且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停住了。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建造了一些数学模式，但当他正要开始论述它们对于社会实际可能性的意义和从这个观点出发检验它们的时候，疾病和死亡迫使他停止写作。很清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就留给他的学生去解决了，而我的《资本积累论》就是在这个方面的一次尝试。

我提出的答案很可能已经被人认为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它可能已经受到批判，引起争议或得到补充；或者人们可能得出了另外一个答案。这一切全然没有发生。随之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人意料：那些“专家们”解释说，根本就没有问题需要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说明是对积累的一种完美无缺的解释；那里的模式结论般地证明了资本能够迅速增殖，生产能够扩大，如果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无其他生产方式的话，它就是它自己的市场，而唯独我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模式的起码的常识，这才使我在这里看出一个问题来。

批 评 家 们

请想想吧：在政治经济学上，关于积累问题以及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性的争论，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二十年代，西斯蒙第同萨伊、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①进行争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俄国的民粹主义者^②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前后，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反复谈论过这个问题。在社会强烈批评的影响下，凡是在知识生活通过政治经济学开展活跃的地方，这个问题就使研究人员不得安宁。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不象第一卷那样真正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部有如一个研究员为便于自己的理解而写下的但又或多或少已经完成的碎文和草稿的松散集子，马克思对于问题的详细论述，经常因为疾病而受到妨碍和中断。尤其是他对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总体资本积累的分析显得最不好，它在卷末的最后一章；在一部五百二十三页的书卷里，它只占很少的三十五页，而且谈到中间就停止了。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证实的，第二卷这最后一章，马克思

① 西斯蒙第、萨伊、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十九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对于他们各自的思想的揭露和批判，见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及《剩余价值理论》。关于他们的简要介绍，见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的历史》（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1962年版）。另见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② 民粹派，一群俄国知识分子，活跃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企图唤起农民反对沙皇。这个革命活动被称为“走向人民”。它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场运动的中坚分子然后采取恐怖行动。他们于1881年3月1日暗杀了亚历山大沙皇二世。自那以后，运动走向衰落。

自己似乎也认为是“亟待修改的”，它仍然“只是对于这个题目的初步处理”。当马克思在分析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论述实现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疑问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因此，他自己肯定看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性。

事实上，马克思在第二卷末尾谈论积累的短小片断中的前提与他在第三卷描述“资本整个运动”中的说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第一卷中所谈到的许多重要规律也是如此，我在我的书中详细地提到了它们。

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生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它已经显示出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吸引力。它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它的发展的始终，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作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直接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从来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一个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和只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国家。《资本论》第二卷里所设想的前提下的社会，在具体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官方“专家们”无视这一切，他们解释说，不存在一个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一切！他们从来没有被第二卷里这个突出的积累的前提所困惑过，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虽然已经把情况给他们指了出来，但他们觉得这个奇异一点也不奇异。他们顽固地坚持这个思想，猛烈地攻击任何一个认为看出问题的人，那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抱着这个问题自我陶醉了几十年！

这个“追随主义”事例如此典型，以致它只能跟爱挑剔的学界传出的一件奇闻相比，即康德写的“前言”里的所谓“书页误置”的有名故事。

一个世纪以来，哲学世界对康德理论特别是这个前言进行了

热烈的争论；康德理论的意义导致了許多学派的出現，它們相互之間進行了尖銳的鬥爭。然而，維興格^①教授用尽可能簡單的方式說明了這些問題中一個最含混不清的問題——他指出，這個“前言”的第四段的一部分是屬於第二段的，它實際上與該章的其餘部分毫無關係；由於原版印刷上的錯誤，它被拆離開來，放到一個錯誤的地方。誰現在看一下其中的上下文，都能立即清楚地看出這個問題。但是，那些排他的學究們卻看不出來，他們在一個世紀里為一個印刷上的錯誤建造了各種深奧的理論。而且，確有一個愛賣弄學問的學究，波恩的一位教授，他在發表於《哲學月刊》的四篇發泄怨憤的文章里說，這個“所謂的‘書頁誤置’”是不存在的；正是這個印刷上的錯誤，表達了唯一正確的完人康德的觀點；如果有誰胆敢在那裡找出印刷錯誤，他就絲毫不懂康德的哲學。

“專家們”現在就是用這種辦法繼續抱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前提以及那些由此而建造的數學模式不放的。我的評論中的主要疑問是針對這樣的事實，即在積累這個問題上，數學模式絕對證明不了什麼，因為它們的歷史前提是站不住腳的。他們的回答是：但那些模式運算得非常準確，因此，積累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了——它根本就不存在。

這是一個正統牌公式迷信的例子。

^① 漢斯·維興格(1854—1933)。德國“好象”派哲學家。創建了《康德研究》雜誌。其主要著作是《“好象”哲學》。見C.K·奧格登的英文譯本(紐約1924年版)。另見《康德研究》雜誌(1934年)第316—327頁上德爾·尼格羅寫的《漢斯·維興格專論康德研究的哲學著作》(“HANS VAIBINGER'S PHILOSOPHISCHES WE-RK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SEINER KANTFORSCHUNG”)。

在《新时代》上，奥·鲍威尔^①开始考察我提出的问题——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他用的是下面的方式。他建造了四份很大的数字表格，在这些表格里，全部罗马字母都不够用——正如马克思为了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作简要注释所使用的那样。鲍威尔还加上了一些希腊字母。这使他的表格看起来比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的全部模式甚至更加可怕。然后，他运用这个新发明试图说明资本家在更新消耗掉的资本之后是如何处理过剩商品的，而这些过剩商品包含着需要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同时（更换那些旧的生产手段之后），资本家想利用上一年里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扩大现有的企业或者建立新的企业。如果他们想在下一年里使用已经增加到12500的资本，他们必须在今年的建设新的工厂，购置新的机器和增加原材料的供应，等等，等等。”^②

问题据说就这样解决了。如果“资本家想”扩大生产，那末，他们当然比以前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而相互成为自己的消费者。同时，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并向这些工人提供更多的生活用品——这些反正是工人自己制造的。这涉及到全部过剩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问题，积累可以开始了。正如大家所看见的，

^① 奥托·鲍威尔（1881—1938），出生于维也纳。1907年成为奥匈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书记。自从发表《民族问题与奥地利社会民主》之后，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战斗》经常的撰稿人。1914年8月之后在奥匈军队中服役。1914年秋天被俄国人俘获，作为战俘度过了战争的其余时间，直到1917年8月被遣送回国。在俄国期间，他学会了讲俄语。他同情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国际主义派，但又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性的支持者，哈普斯堡君主政体倒台后，鲍威尔在社会民主党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他企图填补社会民主党和新共产党之间的鸿沟，设法重新联合国内外的工人党派。鲍威尔1914年前也是《新时代》（见下一个注解）的经常性撰稿人，并影响了德国党，尤其在民族问题上。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理论刊物。卡尔·考茨基任主编。〕

一切都要取决于资本家是否“想”扩大生产。为什么不呢？当然，“他们想做”。“结果，两个方面的生产总值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就实现了”，鲍威尔得意洋洋地解释说，并从这点引出了结论：

“同样，表格 IV 清楚地表明，两方面的生产总值顺顺当当地解决了，全部剩余价值解决了，不仅在第一年里如此，而且在以后的每一年里也如此。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①

鲍威尔简直没有注意到，他几乎不需要这种冗长而详尽的计算，用四大表格和又宽又长的加上椭圆形括号的四层公式来作出这个光辉的结论。鲍威尔甚至不是从他的表格中得出这个结论；他只是现成地把它拿了过来。鲍威尔只是假设必将得到证实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全部“论据”之所在。

如果资本家想用他们拥有的全部剩余资本来扩大生产，那末，他们要做的就仅仅是把这部分剩余资本投放到他们的生产中去（当然，假定他们自己能绝对生产出全部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话！）——那末，他们手里就没有未出售的多余的商品了。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还用得着那些满是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的荒唐公式来“论证”一些如此显而易见的东西吗？

然而，问题产生了，资本家——当然他们总是“想”积累的——是否也能这样做，就是说，他们是否能够为扩大的生产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市场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用一些在纸上虚构的数字通过任何算术运算得到的，而只能从分析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

如果有人问那些“专家”：“对，的确没错，资本家‘想’扩大生产，但是，他们然后向谁销售他们增加的那部分商品呢？”他们

^①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886 页。

回答道：“资本家自己总是可以消费掉这部分不断增加的商品数量的，因为他们总‘想’扩大生产。”

“而那些模式表明了谁来购买那些商品”，《前进报》的评论员古·埃克什坦解释说。^①

简言之：资本家每一年都用他们“积蓄起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来进行扩大；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消费者，因此不存在市场的麻烦。这个假设是他们的全部“论据”的出发点。但是，一个数学公式对这个假设既无必要又完全不能证实它。认为数学公式能够论证这里的主要之点——这样一个积累的经济可能性——这个天真想法，是那些看守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们”的令人发笑的报酬。这个报酬本身，就足以使马克思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马克思本人从来作梦也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数学模式作为任何一种论据，证明积累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里事实上是可能的。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结构，并找到了这个进程所依据的某些经济规律。他开头这样粗略地说：如果总资本的积累——即在整個资本家阶级里——将要发生的话，那末，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十分准确的数量关系。生产的逐步扩大和与

^① 《前进报》，1913年2月16日。安潘涅库克（见下面）在1913年1月19日的《不来梅市民报》上也说，“模式本身非常简单地作出了回答，因为一切产品都在那里找到了市场（即在《不来梅市民报》的纸上）。资本家和工人自己就是消费者，……因此，这里绝对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埃克什坦，奥地利人，是《战斗》和《新时代》的撰稿人。写了一本关于家庭的书，这主要是以日本的家庭、传统和法律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研究，刊登在《马克思研究》上。埃克什坦被认为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者之一（见89页上的注解）。〕

〔安·潘涅库克博士，荷兰天文学家。1914年以前在德国民主社会党中央党校任教，直到普鲁士警察威胁说要把他驱逐出境。自那以后，他作为不来梅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员活跃于不来梅。1918年以后，积极参与荷兰共产党的事务，再次支持荷兰共产党左翼。热情支持工人管理生产，热情支持工人委员会成为一种政府形式。〕

此同时资本的逐步积累——这是它的一切目的——只能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如果这种关系得以维持的话。这样，生产的一大部类与另一部类就持续不断地齐头并进。马克思用设想的数字拟就出一个数学例子，一个模式，目的是要清楚地准确地说明他的思想，而且用它来表明，如果积累要进行下去，那末，模式里的各点（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就必须相互如此这般行事。

很清楚，对于马克思来说，数学模式是说明他的经济思想的例子或图解，就象魁奈的《经济表》^①是为了说明他的理论或象各个时代的地图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主要天文概念和地理一样。马克思构想的或更确切地说简单地指出的积累规律是否正确，很明显，只有通过经济分析，比较马克思揭示的其他规律，考虑它们导致的各种结果和检验它们发展的前提等等，才能得到证实。但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把任何这种批评都视作精神错乱来予以拒绝，因为这些规律的正确性已经为那些数学模式所证实！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呢？积累能否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如马克思的模式所依据的那个社会里进行下去，我表示怀疑，而且我相信，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根本不能被套到单纯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公式化的关系上来。那些“专家们”的回答是：然而它是完全可能的！那已经“被表格 IV”光辉地证实，“而且那些模式表明……”——就是说，为便于说明而构想出来并写在纸上的一行数字可以任意增减！

古时候，人们相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怪物：矮人，独眼人，

^① 《经济表》，被魁奈用来说明他关于把社会划分为各种经济阶级的观点。这些阶级是由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组成的生产阶级，依赖剩余、地主和教会等等为生的阶级以及由所有从事制造业的人组成的非生产阶级。对于他的观点的附有图表的彻底揭露，见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单臂单腿人，等等。有谁相信这种怪物确实曾经存在过呢？但是，我们在古图上看见它们被画得活灵活现。难道这不是证明古人的那些思想完全与现实相符吗？让我们再举一个枯燥的例子。

计划修建一条从 X 城到 Y 城的铁路所需要的成本已经计算出来；关于每年必须达到的多大的旅客和货物运输量亦已作出精确的计算，这样，除了折旧费、营业费和正常的“储备金”之外，一笔“合理的”红利就可以分配了，让我们假定先是百分之五，然后是百分之八。很自然，对于铁路公司创始人的中心问题是，他们能否期望在这条计划路程上获得那个旅客和货物运输量，确保在成本帐上计算出来的收益。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来自关于这段路程上以前的运输情况，它对于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附近城镇和乡村的人口增长等精确的基本事实以及其他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事实等。现在，人们会如何看待一个这样叫喊的人呢：你要问铁路的利润将从何而来吗？对不起，成本帐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去看看，它来自旅客和货物运输量，而从中获得的红利将先是百分之五，然后是百分之八。先生们，如果你们看不到那点，那末，你们就完完全全理解错了这个成本帐的性质、目的和意义。^①

在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当中，有人可能会对着这个知识里手耸耸肩膀指出说，他是属于疯人院或托儿所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看家中间，这种知识里手组成了“专家”的“最高法院”，他们要对其他人是否理解或误解“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开出判决书！

那末，被那些模式所谓“证明”了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

^① “而且，这些模式表明了谁购买产品”，“卢森堡同志基本上完全理解错了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这是埃克什坦在 1913 年 2 月 16 日《前进报》副刊上说的话。

我的不同观点是，要进行积累，就必须越来越多地销售商品，以便把它们中固有的利润转化为货币。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扩大生产，从而继续积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市场呢？批评我的人回答说，他们自己组成市场。由于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营业（或者开始新的营业），他们自己需要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工厂提供生产资料和向他们的工人提供生活用品。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市场，因此，后者随着生产的增加而自动增加。但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主要问题是：资本家的利润能这样获得和积累吗？只有在这以后，才能谈得上资本积累。

让我们另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资本家 A 生产煤炭，资本家 B 生产机器，资本家 C 生产食品。让我们假定，这三个资本家组成资本家雇主总体。如果 B 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A 便能向他出售越来越多的煤炭，因而能够从他那里购买越多的机器，以作开矿之用。这两个资本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因此，C 也找到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并从而反过来成为煤炭和机器的越来越大的消费者。整个东西在越来越高的圈圈里旋转——只要我们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荡的话。但是，让我们更加具体地探讨这个题目吧。

积累资本不是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堆积如山的商品，而是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转化为货币资本。在剩余价值积累中间，总是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商品生产的惊险的跳跃，正如马克思所谓的：为货币而卖。这也许只是对单个资本家适用而不适用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社会吧？绝对不是。因为，在考察社会现象时，马克思说，“……我们绝不可陷入蒲鲁东^①从资产阶级经

^① 蒲鲁东(1809—1864)，法国社会主义者，今天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同他论战。他虽然较早去世，但他是个多产作家。要看参考书目，见亨利·吕贝尔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伦敦希德——沃德出版社1948年版。

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①

现在，作为货币利润的利润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和十分基本的特性，对于这个阶级和个体顾主都是一样适用的。马克思自己就在观察总体资本的积累时也强调，“……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② 而且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资本家阶级怎么可能积累货币资本呢？

让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检验那些“专家们”的高见吧。资本家 A 向 B 出销他的商品，因此，从 B 那里获得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后者向 A 出售他的商品并从 A——它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那里收回那部分货币。A、B 都向 C 出售他们的商品，因此，也从同一个 C 那里为他们的剩余价值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后者从哪里获得他的货币呢？从 A 和 B 那里。根据我们的前提，没有其他实现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说，没有其他商品消费者。但是，新的货币资本能够这样形成，使 A、B、C 致富吗？让我们暂时假定，这三个人的商品交换数量都增加了，生产不断扩大了，因此，以商品形式体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数量能够增长了。剥削实现了，致富和积累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以增加的新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的那部分增加的剩余价值的交换和实现必须发生，以便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不问，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经常问的那样：为流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 卷第 483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 卷第 573 页。

货币从何而来？最后答道：从金矿主那里来。我们却问：既然（除工人外）资本家是唯一能够消费彼此的商品的人，那末，新货币资本是怎样进入资本家钱袋的呢？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停顿地游荡，从一个钱袋出来，从另一个钱袋进去。

但是，且慢：这种问题也许把我们推向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也许，利润积累在这个不停顿地从一个资本家的钱袋进入另一个资本家的钱袋的游荡中，在私人利润的连续不断的实现中已经的确发生，而货币资本的总量甚至不必增加，因为全体资本家的“总利润”这样的事情在模糊理论之外并不存在？

但是——啊，亲爱的——这样一个假设将会完全引导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扔进火里。因为，平均利润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于它的论据是至关重要的。单是这一点就对第一卷里的价值理论赋予了具体的含意——剩余价值理论和第二卷都是以它作为基础的，因此，这些也得被扔进火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随着作为一个具体数额的社会总资本的概念而上下起伏，这个社会总资本在总资本利润及其分配中有形地表现出来，它的无形运动推动了个体资本数额的一切有形运动。总资本利润事实上是一个比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具体得多的物质经济数量。因为后者只是作为一段时间过后回头加起来的统计数字而出现，另一方面，总利润则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体现出来，因为竞争和价格波动总是把它作为平均利润或者额外利润在个体资本数额中间进行分配。

这样，问题仍然是：社会总资本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实现着总利润，为了实现总积累，总利润必须不断增殖。那末，如果这个数额的组成部分总是从一个钱袋流向另一个钱袋，它怎能增殖呢？

它会是这样——象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假设的那样——包含利

润的商品总额至少能够这样增长，唯一的困难在于提供货币，这也许只是货币流通的一个技术问题吧。但这只是貌似，表面而已。商品总额将增加不了，扩大生产不可能发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里最重要的前提是转换成货币，是利润的普遍实现。从A到B，从B到C，再从C到A和B，出售不断增加的商品和实现利润，只有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最后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之外找到一个市场的时候才能发生。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旋转木马转上几圈后就要停止。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能够估量出批评我的那些“专家们”造谐之深，他们叫嚷：

卢森堡同志继续说：很清楚，我们是在打转转。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只是为了维持更多工人的生活而生产更多的消费资料，只是为了让增加的劳动力有某些事情可做而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是荒谬的！——很难探测出这些话同马克思的模式有什么关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这在所描述的进程中来到资本家那里，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是一点也不荒谬的；相反，从这个观点来看，它就是理智的体现即追逐利润的体现。^①

的确，这里“很难探测出”哪一个更大些，是在深入研究关于社会总资本对于个体资本这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天真地承认无能透顶呢，还是对于我所提的问题无知至极？我说：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规模越来越大地为生产而生产是荒谬的，因为这样——根据“专家们”所坚持的前提——就不可能为整个资本家阶级实现利润，从而进行积累。回答是：但那绝不是荒谬的，因为那是积累利润的途径呀！然而，专家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好，……在数学模式里已经表明，利润事实上已经积累了。在那

^① 这是埃克什坦在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副刊上说的话。

些模式里，我们任意写进了一行又一行的数字，用这些数字所进行的数学运算分毫不差，而其中的货币资本却被完全漠视了。

很清楚，在这些刚毅不屈的“专家们”面前，一切批评必定碰得粉身碎骨，因为那些专家只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分析剥削即生产进程以及进而理解《资本论》第一卷是足够的，但就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而言，这是完全不够的。在闪耀着社会总资本这个基本概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里，他们看到的是死资本，学到的是字母、公式、“模式”，但却看不到实质。马克思本人肯定不是“专家”，因为他并不满意他的模式的算术“进程”；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总积累怎么能够发生？新的货币资本怎么能够在资本家阶级里形成？那些“信徒们”总是有特权提出丰富的假设，把它们变成死教条，并且沾沾自喜，心满意足，而一个智慧先驱的心灵却充满创造的疑问哩。

但是，“专家们”的观点引出了一连串令人奇怪的结果，很明显，他们没有用心考虑过它们。

第一个结果：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充当它自己的消费者，即生产和市场是一体的话，那就完全不可能解释周期性危机的出现。如果生产能够“象模式表明的那样”用它自己的增长来任意积累，进行新的扩大，那就令人迷惑不解，不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一个充足市场时，怎么能够和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些情况。按照专家们的公式，它要做的一切只是吞掉那些剩余商品，以及象奥·鲍威尔的“表格Ⅳ”所表明的那样“在其后的每一年里”把它投放到生产中去（部分地作为生产资料，部分地作为工人的生活用品）。然后，那些无法消化的商品就只好听任积累和谋取利润的新的祝福了。无论怎样，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特定概念变成谬论，根据这种观点，每次危机都是资本增长速度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超过市场的一定限度的倾向所造

成的。然而，生产增长速度怎能超过市场，因为它是它自己的市场，从而市场以生产的同等速度自动增长呢？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怎能周期性地超过它自己呢？这可能象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身影那样容易。资本主义危机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或者，剩下的就只有一种解释了：危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能力与市场扩大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所致。在它们当中，这些消费者对于它们来说是完全充足的，除去因无政府状态而失去正确比例的一些东西，如一种东西生产的太多，另一种东西生产的太少。这会意味着否定马克思，最后成为被马克思讥讽得体无完肤的那个人。他就是“可怜的人”萨伊，庸俗经济学、曼彻斯特理论和资产阶级协调理论的创始人。1803年，他提出了这条教义：说全部商品都能够生产得太多未免荒谬，只能有局部危机，没有总危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理由生产的一种产品太多，那只是证明它生产的另一种产品太少了。

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生产一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资本主义积累就（在客观上）变成无限的了。因为生产将仍然增长，就是说，生产力将无限地发展，甚至当人类被划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基础就崩溃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造反，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需要的思想反映，是资本主义在某一经济阶段上的客观不可能性导致的结果。当然，那不意味着（似乎仍然需要向“专家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要素），这个历史进程必须或者甚至能够耗尽到这个经济不可能性的极限。远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在这个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足以使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以致它们必须结束。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只是

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防御性的产物。当这个不可防御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形势继续激化下去。如果我们同“专家们”一起假定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上是无穷无尽的，那末，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极端重要的基础将要消失。我们就得在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图完全根据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恶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推断出社会主义的学派里避难了。^①

第三个结果：当资本主义生产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并允许扩大积累起来的总价值的时候，现代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谜题：即为最遥远的市场和资本输出而竞争这个现代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点。的确不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大喊大叫呢？为什么要征服殖民地呢？为什么会有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呢？为什么要为刚果的沼泽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而争吵呢？资本应该留在家，老老实实地过活。克虏伯公司应该去为蒂森公司生产，而蒂森公司应该去为克虏伯公司生产，让它们把资本投到自己的企业中去，相互扩大，等等。资本的历史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现代帝国主义变得完全不可理解。

但是，在《不来梅市民报》上仍然看到潘涅库克珍贵的说法：寻找非资本主义市场是“事实，但不是需要”——一颗货真价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珍珠，他正确得要死！按照“专家们”的假设，作为最后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先导为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个是值得称颂的工人阶级的决定；另一个只是资产阶级的

^① 或者，我们还能得到《德累斯顿人民报》的一个小“专家”所提供的几分间接的安慰，这个“专家”彻底摧毁了我的书之后解释说，资本主义终将“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崩溃。人们尚未完全搞清楚这位可爱人士是如何产生这种设想的——资本家阶级是否将在某个时候因为利润率低感到绝望而自杀，还是它将会宣布生意太糟，完全不值得费心经营，于是它将把钥匙交给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这种安慰却不幸被马克思的一句话驱散了，他说，“大资本将通过大规模生产对利润率下降实行补偿。”因此，在资本主义因利润率下降而崩溃之前，仍然要经过一些日子，大概要等到太阳熄灭。

罪孽。

这样，“专家们”面临着在两个方面作出抉择。要么——象他们从马克思的模式所推断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与它的市场是一体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消失了，要么资本积累只有在资本家和工人之外能够找到顾客的时候才能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在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里，日益增长的销售是积累的重要先决条件。

尽管我受到孤立，但我仍然确实找到一个毋庸置疑而且非常内行的“专家”来证实上述那些结果。

1902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出版了一本书《英格兰危机的理论和历史》。图冈通过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陈腐学识逐步取代马克思的理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除了其他谬论外，他还叫嚷说，危机纯属调整不好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生产扩大的能力大于人民消费的能力所造成的。这种学识（这是他从萨伊那里借用过来的）之所以如此新奇和令人惊讶，在于他使用《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模式来加以论证！

图冈说，“只有生产力得到充分地发展，扩大社会生产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需求也必须在社会生产的按比例的划分当中经历一个类似的扩大，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每一件新生产的商品都代表着为获得其他商品的新购买力”（第25页）。这一点的“论据”是从马克思的模式那里来的，图冈只是用不同数字把它再现出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上述模式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本身非常简单的东西，但由于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进程缺乏足够的理解，这个目的经常遭到反对；事实上，它还要证明这个基本论点，即社会生产创造了自已的市场。”（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因偏爱谬论而越走越远，以致他得出结

论，说资本主义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独立于人类消费。无论怎样，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图冈的笑话，而只是那个“实际上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他在这个原理上建造了后来出现的一切。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

批评我的“专家们”现在用以反对我的东西，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 1902 年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尤其是两种典型的说法：（1）资本主义生产通过自己的扩大为自己建立了市场，这样，销售出路不应该对积累造成困难（比例失常除外）；（2）证明此即此的论证是通过象马克思所使用的那些数学模式而获得的，即洁白纸上的加减练习。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 1902 年就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卡尔·考茨基立即在《新时代》上开始向他攻击；他无情地批判了这位俄国修正主义者的谬论，包括上述“基本原理”。

如果那是真的（考茨基写道），资本财富越大，英格兰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但是相反，它正陷于停滞状态，资本正在输往俄国、南非、中国、日本等等。这种现象已被我们的理论所解释，根据这个理论，消费不足是危机的最终原因；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理解的。^①

现在，考茨基用以反对图冈的理论是什么呢？用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

虽然资本家的财富增加了，被剥削的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但是他们自己不能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形成一个充足的市场，因为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增长得更快。他们必须在那些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阶层和民族中寻找市场。他们找到了这个市场，并且发展它，但是仍然不够快，因为这个追加市场几乎没有那种资本主义生产

^① 《新时代》1902 年第 5 期（31）第 140 页。

进程的灵活性和扩大能力。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发展到大规模工业生产，象十九世纪英格兰已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它就有可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很快超过市场的扩大。因此，市场极大的扩展所带来的任何繁荣一开始就注定是短命的，而且最后必定出现危机。

简而言之，这是关于危机的理论，就我们所见，它是马克思建立的，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接受。^①

让我们忘记，考茨基用一个含糊的名词来称呼这个理论，说危机是“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讥笑了这个名词（第410页）。

让我们忘记，考茨基只看到危机的问题，而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除了使商业时盛时衰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最后，让我们忘记考茨基的解释，说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增长“不够快”，满足不了积累的需要，因此需要一个“追加市场”，这是相当含糊的，而且无助于准确地理解积累的问题。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考茨基在白纸上写的他自己的见解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遍接受的见解：

1. 单单资本家和工人不能为积累形成一个充足的市场。
2. 资本主义积累需要在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内有一个“追加市场”。

至今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考茨基1902年攻击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时候，批驳了“专家们”用来反对我的《资本积累论》的那些说法，并批驳“专家们”的攻击惊人地偏离了忠诚的信仰，只是这一次为了准确地论述积累问题，考茨基才把这些说法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用来反对修正主

^① 《新时代》第3期(29)第8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义者图冈—巴拉诺夫斯基。

那末，考茨基怎样证明他的对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呢？只是通过使用马克思的模式吗？考茨基向图冈表明，这些模式即使使用恰当，也不能证实他的论点，相反，它们却证实了“消费不足”引起危机这个理论。

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个最高级的专家对于“马克思模式的性质、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不是比图冈甚至还少吗？……

但是，考茨基从图冈的断言里引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认为这个断言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背道而驰，认为它使资本输出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无法解释，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现在，这个观点的总的倾向是：

我们的理论分歧……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考茨基问）无论危机是社会生产中不稳定的比例造成的或是消费不足造成的——这不就是一个学术问题吗？

许多“实际”家可能会那样认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党正在争论的战术分歧。修正主义起劲地攻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决非偶然的。

而且，考茨基清楚地说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所谓“阶级矛盾的缓和”。那意味着回到这个理论的传统观点，即相信“社会民主的变化，从一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改良的民主党的左翼民主党”。^①

这个最高级的专家十四年前在《新时代》的三十六页纸上就是这样砍杀异教徒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最后他把受害者置于死地后扬长而去。

现在，我必须站在一边，看看这位大师的高徒“专家们”，是

^① 《新时代》第5期(31)第141页。

怎样用曾使这位俄国修正主义者在《新时代》的打猎场上丧生的那个“基本原则”，来谴责我对积累的分析的！在探求“就我们所能见到的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的冒险中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人们不大清楚的。

但是，某些甚至更富于独创性的东西发生了。我的《资本积累论》在《前进报》、《不来梅市民报》、《德累斯顿人民报》和《法兰克福民意报》上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武器摧毁之后，在《新时代》上出现了奥托·鲍威尔的批判。这位专家也相信数学公式在论证社会再生产问题方面的魔力，这是大家都看见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模式仍然不十分满意。他发现它们“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是“武断的，不是没有矛盾的”；他是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即恩格斯在他的大师的笔记本里“发现这一部分尚未完成”！因此，他费尽心机建造了自己的公式：“这就是我们建造模式的理由，当大家承认这种假设时，这些模式就不是武断的了。”只是有了这个新模式，鲍威尔才相信他找到了“一个回答卢森堡同志提出的问题的无可争辩的基础”。^①但是，鲍威尔完全懂得，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在稀薄的空气中飘浮，“不受干扰”。因此，他要为资本积累寻找某种客观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他最后在人口的增长中找到了。

这里，最荒唐的事情开始了。“专家们”的一致评判加上《前进报》编辑人员的呼声，宣布我的书是彻头彻尾的胡扯，是不折不扣的误解，积累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已经把它解决了，模式给予了充分的回答。鲍威尔现在被迫把他的模式放在一个实质性稍多一点的基础上，比简单的加减法强些：他考虑到了某种社会现象——人口增长；他是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他的表格的。资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8页。

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如他的模式假定要显示的那样，不是资本围绕自己的轴心进行的自我运动，而是随着人口的相应增长而造成的结果：

积累把生产范围的扩大作为前提，而这又是通过人口增长而扩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着资本积累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的趋势。……这个积累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的趋势决定了（资本的一一原译者）国际关系。……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在工业循环中根据人口增长来调整积累的趋势变得非常明显。……繁荣和萧条危机的周而复始经验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机能是要消除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并继续调整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①

我们将在下面仔细看看鲍威尔的人口理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理论实际上代表了某些十分新颖的东西。对于其他“专家们”来说，关于积累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问题似乎纯属废话，“的确难以发现”。另一方面，鲍威尔建造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鲍威尔的理论不仅对于其他批评我的书的人是新奇的，而且它第一次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崭露头角。我们在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中或在《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都找不到作为积累基本原理的鲍威尔人口理论的一点痕迹。

让我们另外看看卡尔·考茨基是怎样在《新时代》上宣告和评论《资本论》第二卷的。考茨基在第二卷里关于积累的详尽内容中，非常彻底地论述了关于流通问题的头几段，搬出了马克思所使用的全部公式和符号。然后，他在总共二十页中化了三整页的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873页（着重点是鲍威尔加的）。

篇幅专门谈论卷中最重要和最富于独创性的部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这三页里，他谈论的仅仅——当然完全照搬那些不可避免的公式——是“简单再生产”的介绍性虚构，即没有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只是把它看作探讨总资本积累这个实际问题的理论出发点。考茨基仅用了两行字就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剩余价值的积累，生产过程的扩大，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就在第二卷出版之后的日子里以及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也没添上一个字。这样，不但我们找不到鲍威尔人口理论的痕迹，而且考茨基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论述积累问题的整个部分。

他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问题（象鲍威尔为解决它而创造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原理”那样），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考察当中停下来，没有回答他几次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考茨基又一次（在前面提到的一连串反对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中）谈论《资本论》第二卷。在这里，他制造了“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它的中心点是，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不足以构成积累的基础，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民族”中找一个追加市场是必要的。考茨基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既不适用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谬论，也不适用于他自己的带有一般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积累模式。这是因为，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分析的前提是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这些模式是要作为经济规律来详细说明，那两个不足的消费阶级如何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使积累年复一年地变为可能。考茨基甚至一点也没有向我们提示人口理论，如被鲍威尔用来作为马克思的积累模式的真正原理的那个人口理论。

让我们看看希法亭的《金融资本》^①吧。他在介绍中赞扬马克思对总资本再生产条件的说明是这本“惊人著作”最辉煌的成就——确实他是对的——之后在第十六章里，他用十四页的篇幅逐字逐句地照抄马克思著作中的有关页数，当然包括那些数学模式。这里，他埋怨说，这些模式被人漠视了，只是由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才引起了某些注意。那末，在这整个辉煌的成就里，希法亭本人注意到什么呢？下面是他的结论：

马克思的模式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能够以简单的规模和扩大的规模发生，要是这些关系能够保持稳定的话。另一方面，甚至简单再生产亦能产生危机，如果比例遭到破坏的话；例如消耗掉的资本和必须投放的资本之间的关系。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说，危机的原因在于群众的消费不足，而这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

也不能说这些模式表明总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相反，能够表明生产的任何扩大在现存生产力的限度内是可能发生的。^②

这就是全部结论。希法亭也把马克思对于积累的分析只看作解决危机问题的指南。数学模式表明这个比例允许积累不受干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希法亭由此引出这些结论来：

1. 危机只是从比例失调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点上，他把这个

①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4)，奥地利人。《马克思研究》的一名编辑。1907年离开维也纳来到柏林，他在那里获得一个评论《前进报》的首席评论员职务。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这是最先对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一。1914年，他是社会民主党内反对社会民主党议会集团在帝国国会里进行投战争信任票活动的少数派的一员。他后来成为1917年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这个党反对战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梅林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了这个党，直到“斯巴达克联盟”建立为止。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建立后，希法亭成为德国公民。他1922年带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分子回到社会民主党。绝大部分独立党党员投票赞成加入1920年的第三国际，并与“斯巴达克联盟”实行合并。希法亭在1923年和1928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出任财政部长。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18页。

“被普遍接受的危机理论”沉入海底，而接过了被考茨基谴责为修正主义邪说的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理论。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与这个“可怜的人”萨伊的理论相同的结论：总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2. 除了危机因比例失调产生周期性的干扰之外，资本积累（在一个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里）能够在实际生产力允许的情况下扩大，这里，他再次一字不漏地照抄图冈的话。

对于希法亭来说，除了危机之外，积累问题不复存在，因为模式表明，“任何扩大”都是无限可能的，即生产和销售同时增长。我们又看不到鲍威尔的“人口增长”理论的踪影，也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理论是必要的。

最后，甚至对于鲍威尔本人来说，他目前的理论也是一个新发现。只是在1904年，考茨基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发生争论之后，他才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专门论述危机理论的问题。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解释说，他第一次想完整地阐述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危机主要归因于流通的特殊形式，“固定资本”，他引用了《资本论》第二卷里试图解释现代工业十年循环的一句话。鲍威尔一次也没有提到生产扩大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鲍威尔的整个理论即“适应人口增长的调整趋势”，现在对危机和繁荣、积累和资本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国际运动，以及最后甚至对帝国主义都作出了解释：这个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并“自动地支配了它”的非凡规律，对于鲍威尔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来说都不存在。现在，为了回答我的书，把马克思的模式放到一个“无可争辩的基础”上，这已经成为根本的理论，唯一的理论。这个基础突然随意地出现，以解决那个据说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怎样看待所有其他的“专家”呢？让我们把他们的话概

括一下吧：

1. 按照埃克什坦和希法亭（以及潘涅库克）的说法，不存在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毋庸说，一切都象马克思的公式显示的那样清楚。只是由于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公式，我才对它们提出批评。按照鲍威尔的说法，马克思使用的数字是“武断地选择出来的，并不是没有矛盾”。唯有他，鲍威尔，才找到了一个“对马克思思想的恰当说明”，并造出了一个“免除武断性的模式”。

2. 按照埃克什坦和《前进报》的编辑们的说法，我的书毫无价值，必须“摒弃”。按照《法兰克福民意报》（1913年2月1日）的小“专家”的说法，它甚至是十分有害的。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在这个错误的解释中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它指出了资本积累的极限（《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3. 按照埃克什坦和《前进报》的说法，我的书与帝国主义毫无关联；“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本书与今日活跃的经济生活的新现象关系甚微，也可以在二十多年以前把它写出来”。按照鲍威尔的说法，我的研究事实上发现的“不是唯一的……而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根源”（同上，第874页），这对于象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来说，已是相当可喜的成就。

4. 按照埃克什坦的说法，马克思的模式表明了“社会需要的实际程度”；它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现实远远不能达到的“平衡的可能性”，因为它被追逐利润所支配，结果导致危机。下一段开头的“那个说明，与马克思的模式相一致，而且也符合现实”，因为这个模式准确地显示“这个利润是如何为资本家实现的”。^①

按照潘涅库克的说法，没有平衡状态，唯有“空荡的蓝天”；“生产规模可以比作一个漫天飘浮的没有重量的东西”。“因为，

① 1913年2月16日《前进报》副刊。

生产规模不是处在平衡状态中，它偏离时拉不回来”。“工业循环不是围绕一个被某种需求限定的平均值而波动的。”^①

按照鲍威尔的说法，马克思的模式——他已经终于发现它们的真实含意——只是意味着调整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以适应人口增长。

5. 埃克什坦和希法亭都相信无限积累的客观经济可能性：“那些模式表明了谁来购买产品”（埃克什坦）。潘涅库克的“没有重量的东西”更是可以“漫天飘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按照希法亭的说法，“生产的任何扩大在现有生产力的范围内都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正如模式所表明的，“销路随着生产自动增长”。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只有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才可能谈论积累的无限性”，并断言“消费能力随着生产自动增长”。^②

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审判团的先生们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论述的积累存在不存在一个我们至今谁也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抑或问题仍然是（甚至在鲍威尔的最新解决之后）我“不会使用马克思模式的无能透顶的产物”，如《前进报》评论员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模式是终极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还是“武断的并非没有矛盾的”？我阐述的问题是挖掘了帝国主义的根源呢，还是它“与今日活跃的经济生活现象毫无关联”？马克思那些“闻名于世”（如埃克什坦所称的）的模式最终说明什么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生产平衡状态呢，或是一个现实图景，“扩大”的可能性的一个证据，或是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扩大”的不可能性的一个证据，或是调整生产以适应人口增长，或是潘涅库克的“没有重量”的儿童气球，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只骆驼或是一只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2期《论危机的原因》第733、792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黄鼠狼？“专家们”开始下决心的时候了。

同时，让我们看看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部分的一幅清晰、和谐和完善的美丽图画吧。这是对于这些如此恶毒地攻击我的书的先生们的傲气的一种合适的回答。^①

既然奥·鲍威尔解除了我同其他“专家”争论的麻烦，我现在可以转向鲍威尔本人了。

① 这个《前进报》的评论家埃克什坦，是所有批评我的人当中最不了解事情底里的人。他属于随着工人阶级报纸的发展而涌现的那类新闻记者。他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日本的家庭法啦，现代生物学啦，社会主义历史啦，人种学啦，文化啦，经济学啦，战术问题啦——看当时的需要就是了。这些万能作家如此泰然自若地在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里游来荡去，使得他们成了任何严肃的科学家羡慕的对象。若是他们对事情毫无所知，他们就代之以蛮横无礼。这里有两个事例：埃克什坦有一次在他的评论中说，“让我们在此时此地承认吧，这位作者理解错了马克思的分析的含义和目的，这在她的书中的其余部分都可得到证实。首先，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些模式的技巧。这一点在她的书的第100页上已经十分清楚。”在那里，我谈的是这个事实，就是马克思在他的模式里把货币生产包括在生产资料的部类里。我在书中批评了这一点，并试图说明，既然货币本身不是一种生产资料，这个混乱就必定不可避免地精确地阐述这个题目产生巨大的困难。埃克什坦接着蛮不讲理地说：“卢森堡同志反对马克思把货币物质即金银的生产归入第一排，并反对马克思把它连同生产资料的生产一起进行运算。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她为此在马克思建造的公式里加进了第三排，并认为这代表货币物质的生产。”他现在失望透了：“在卢森堡建造的模式里，这个困难是……不但十分巨大，而且无法克服……她自己不作任何努力来描述这些‘有机的复杂事物’。她的这个举动向她表明，她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云云。但是，在第100页上卢森堡同志建造的模式”根本就不是我“建造”的——而是马克思建造的！我只是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第470页上提供的数字，为的是说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把货币生产归到那里去，这是不可能的，正象我在下面清楚地解释的那样：“此外，只要看一下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就可发现，混淆交换资料和生产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为了我所批评的马克思的模式，埃克什坦跑过来责备我，并且因为这个模式，他竟象一个愚蠢的泼妇一样斥骂我完全没有理解“这些模式的技巧”。

另一个例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510页上建造了他的第一个积累模式，他在这个模式里允许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总是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50%用作资本，但又让它在另一部类里任意出现，看不出有什么规律，纯粹按照第一部类的需要。我试图把这一假设批评为臆断的假设。这时，埃克什坦跑过来气呼呼地说，“错就错在她这个运算方法，而且这表明她没有掌握住马克思的模式^{的实质}。她认为，这些是以同等积

累率的需要作为基础的，就是说，她假设积累总是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齐头并进。但是，这个假设是完全臆断的，与事实相矛盾……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共同积累率，这是胡扯理论。”“作者的罕见的轩然大错”就在于此，“它表明她完全被马克思的模式^③的实质所困惑。”同等利润率的真正规律，是“与虚构的同等积累规律格格不入的”，云云。埃克什坦就是这样添油加醋、有声有色、完全彻底地把我置于死地。如果的确是……那么就的确是。但是，五页之后（FLPH版是三页），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式举了第二个例子^④，这是一个真正的基本模式，他然后就完全使用它直到结尾，而第一个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尝试，一个初步的描绘。同时，马克思就在这第二个例子里不断假设两个部类中的同等积累率，“这个虚构的规律”！这个“胡扯理论”，“与同等利润率的真正规律格格不入”——资本的这些冒犯和罪过，在《资本论》第二卷第513页上全都能够找到，而且马克思顽固不化，一直谈到书卷的最末一行。这样，这个攻击就全都落到这个不幸的马克思身上，很明显，他被他自己的模式的“实质”完全迷惑住了”。与我分担恶运的，至少不只是他一人；鲍威尔也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因为他在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模式里类似地说出他的清楚的假设，即“两个生产领域里的积累率是相等的”（1913年《新时代》第24期第838页）。看，一个人竟然遭到一个甚至没有很好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家伙如此蛮横无礼的对待！这样一篇“评论甚至能够在《前进报》上出现，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学派统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中央机关报的一个特点。如果上帝保佑我能活到看见我的书的第二个版本的话，谁也夺走不了我通过在附录中全文刊登的办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件珍品的机会！

[※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用来指弗·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马克斯·阿德勒、古·埃克什坦、卡尔·伦纳等人的集体术语。这不是观点完全一致的学派，而是一伙个人，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些他们认为马克思逝世以来已经发展而他又没有谈论过的特殊问题。他们的思想发表于总题目为《马克思研究》的一系列书籍以及奥·鲍威尔、卡尔·伦纳和阿道夫·布朗1907年创建的杂志《战斗》上。]

鲍威尔的一般评论

很自然，我将不去纠缠鲍威尔在表格里列出的运算。他的态度和对我的书的批评，主要是依据他用作积累基础的人口理论，它本身的确与任何数学模式毫无关系。我们必须研究的就是这个理论。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鲍威尔是通过什么途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表格中的运算的。即使它们对于解决纯属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积累问题毫无价值，也仍然不失为鲍威尔本人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意识到要探索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与众不同的。这个过程用几个非常简单的甚至普通人亦能判断的例子便可说明，普通人通常感到畏惧的是那些挖空心思搞出来的表格和神秘符号。

举三个例子就足够了。

在《新时代》^①的第836页上，鲍威尔说明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怎样发生的。他假设出（象马克思那样）两大部类的生产（I，生产资料的生产；II，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一部类起初有120,000的不变资本和50,000的可变资本（它可以代表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的马克，总之，是货币价值）。在第二部类中，他假定有80,000不变资本和50,000可变资本。这些数字当然是随意想出来的，但它们相互的关系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示一定的经济假设，鲍威尔就是从这点出发的。这样，两个部类中的不变资本都大于可变资本，这表示了技术进步的阶段。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支配地位比第二部类的大，因为第一部类的技术通常以

^① 1913年第23期。

较快的速度发展。根据这一点，第一部类的总资本最后大于第二部类的总资本。这些全是鲍威尔自己的假设，它们既然同马克思的假设一致，那它们就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现在来谈积累。鲍威尔开始给两个不变资本都增加10,000，给两个可变资本都增加2,500。^①但是，他这样就立即放弃了他的经济前提。因为(1) 第二部类的较小资本不可能与第一部类的较大资本以同等数量增长，因为这会破坏它们的彼此关系，而这些关系是技术进步所决定的；(2) 追加资本不可能在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以同种方式进行分配，因为原资本不是以同种比例进行分配的。鲍威尔又一次摧毁了他自己假设的技术基础。

这样，鲍威尔开始用他走的第一步武断地摧毁他自己的前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算术结果的缘故，是为了获得一个顺利的加减运算，否则不可能这样。

鲍威尔用这种方式扩大生产之后，试图向我们说明积累的第二个行动是怎样进行惊险的跳跃而实现剩余价值的。他正在试图说明数量增加的商品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交换，以致我们达到进一步的积累，即生产的另一次扩大。这出现在第863页上。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两堆商品的交换，它们是第一年生产的结果：220,000 生产资料和180,000 消费资料。它开始进行得很正常：每个部类都使用它的商品的最大份额——一部分直接地，部分通过交换——来更新旧的消耗掉的资本，并且向资本家自己提供消费。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当然，到目前为止，鲍威尔仍在步马克思的后尘。但现在形势变得微妙了：下一年要扩大生产，

① 1913年第23期。

积累。这个过程是用一句引语解释的：“而且，资本家想使用第一年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扩大现有业务并建立新的业务。”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关心我们在前面谈论的问题：资本家是否有足够的“意志”。我们在这里同意鲍威尔关于“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干出许多事来的说法，但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使资本的独立意志得以施展的手段。

鲍威尔的第一部类中的资本家“想”再投资 12,500 剩余价值。为什么要那么多呢？因为，鲍威尔需要用这个数字来进行运算。好，我们将毫无怨言地服从鲍威尔的计划，并且只允许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坚持他自己随意构想出来的假设。继续谈吧，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已经决定把他们的 12,500 剩余价值投资于生产。他们已经把他们的 10,000 商品投放到他们自己的不变资本里，另外把 2,500 转到另一个部类，来为他们扩大的工厂里所增加的工人购买生活用品。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在货物总储量中，他们仍然有 4,666 的剩余。他们已经消耗和更换了旧的用掉的资本，为扩大投资了新的资本，而且现在，他们仍然有这部分令人为难的剩余。他们怎样处置这 4,666 的剩余呢？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资本家“想”在第二部类和第一部类都得到积累。第二部类的这些资本家也打算投资 12,500，虽然象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拥有的资本少得多，而且他们甚至想用同一种方式分配它们——他们要仿效比较富有的同事的虚荣心，甚至使他们忽视了技术因素。无论怎样，为了使这个扩大得以发生，他们需要从第一部类中获得另外一部分生产资料；这能否成为清除那个部类尚未消耗的剩余的机会呢？不，那已经清除了，情况已经发生了。第二部类的扩大已经“按照计划”即按照鲍威尔自己发明的计划进行。那里甚至再也没有插针之地了。然而，无论怎样，第一部类里仍然有 4,666 的剩余。我们如何处理这部分剩余

呢？“它们从哪里找出路呢？”鲍威尔问道。现在，发生如下情况：

消费品工业中的资本家把第一年期间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到生产资料工业；或者他们自己建立工厂生产生产资料，或者他们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通过银行转到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家那里，供他们使用，或者他们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公司里购买股份……

这样，生产资料工业向那部分在消费品工业里积累起来的但将要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出售价值为 4,666 的商品。因此，除了价值为 85,334 的生产资料（它们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外，消费品工业购买了价值为 4,666 的生产资料，它们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①

这样，答案是：第一部类把没有消化的 4,666 剩余出售给第二部类，它却没有加以利用，而是把它“转”回……到第一部类，它在那里被用来进一步扩大不变资本 I。

我们再不必探讨鲍威尔把剩余价值从第一部类“转”到第二部类的经济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盲目地跟随鲍威尔经历艰难困苦；我们只是想注意一下他自己任意构思出来的运算是否进行得干净利索，他是否还在遵守他自己的假设。

资本家 I 把他们 4,666 的剩余商品“出售”给资本家 II，他们通过把他们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给第一部类的办法“购买”了它。但是且慢！他们使用什么来“购买”呢？为了购买而支付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哪里呢？在鲍威尔的表格里，一点也看不到！第二部类的全部商品已经用于两大部类的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以及可变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见 865 页鲍威尔自己的计算），至少除了剩下的 1,167 之外。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存留下来的消费

①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363 页。

品就只有这 1,167 了。现在鲍威尔不是把这 1,167 用作一种支付 4,666 生产资料的现付手段，而是用作增加工人的可变资本，为了这个所谓“被购买”的 4,666 生产资料，需要这些工人。这件事怎么看都行，但资本家Ⅱ已经把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光了；他们翻出钱袋，找不到一分钱来购买这部分贮存起来的 4,666 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购买已经真正发生，我们就得在第一部类中找出 4,666 交换消费品。但是，它们在何处呢？第一部类如何处理它们呢？鲍威尔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在“购买”中必须用来交换的这部分神秘的 4,666 消费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进程设想为：也许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拥有某些在表格里没有出现的多余资本；也许他们在德国银行有某些存款并提走 4,666 现金，来购买那些生产资料？很抱歉！如果鲍威尔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建造表格是要说明“社会总资本”，同时用一只眼睛盯着装有资本储备的秘密抽屉，在他的表格失去任何意义时，他可以把资本储备提出来，那对于马克思的模式来说，是一个侮辱。社会总资本就是社会总资本！不能把它弄得糊里糊涂。一切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加以说明，甚至银行存款和整个流通都必须在模式的框框内发生，否则，这个模式就不值得用纸把它写上！

事实仍然是，鲍威尔的资本家的手段纯系欺骗。这些先生们装作去购买和出售 4,666 的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购买手段。当资本家Ⅰ把他们剩余的商品给予资本家Ⅱ的时候，这是一件可爱的生日礼物。为了不显得寒酸，资本家Ⅱ用同样高尚的举动回答这个高尚的姿态；他们把礼物直接送回给同行，并慷慨地加进他们剩余的价值 1,167 的消费品（无论怎样，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乡亲们，送给你们，拿走吧，愿上帝保佑你们，你们

现在就有这部分可变资本来使你们多余的机器运转起来了。这样，作为第一部类积累的最后一个行动（根据鲍威尔的观点“按照计划”把它完结之后），我们仍然有一个新的 4,666 不变资本和一个 1,167 可变资本。而且，鲍威尔亲切地微笑着转向观众，补充说：你瞧！

两个范围的总生产价值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就这样实现了……同样，表 IV 清楚地表明，两个范围的总生产价值，包括总剩余价值，不仅在第一年里而且也在其后的每一年里都顺顺当地实现了。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那部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不可能实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①

结果是美妙的，但是这种兴奋却受到那些使它得以产生的手段的某些限制。说明白一些：两大部类之间为了更新和扩大资本发生交换之后，第一部类余下价值为 4,666 的没有消化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也同样余下价值为 1,167 的消费品。如何处理这两部分东西呢？首先，至少较小的部分可以作出决定，交换它们行吗？但是，在第一部类里仍然存在着毫无用处的剩余；我们只不过改变了数字，但没有改变困境。其次，这种交换能有什么经济目的和意义呢？第一部类如何处置它用此种方式为增加的工人购买来的消费品，而它又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雇佣这些工人呢？同样，第二部类如何处置它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因为它在这种交换中卖掉了它需要向增加的工人提供的消费品呢？因此，交换是不可能的，模式中的两部分剩余是不可能销售的。

鲍威尔使用下述手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困境。第一，他捏造那部分不可销售的剩余商品从第一部类“出售”到第二部类，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后者是怎样支付的。第二，“出售”被捏造出来之后，

^①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865—866 页。

他让资本家Ⅱ做一些甚至更加神奇的事情：他们带着新获得的生产资料，走出他们自己的部类，进入另一部类，并把他们作为资本投资在那里；第三，他们带着自己的不可销售的商品，同样把它们作为可变资本投资于另一部类。

人们不禁要问，鲍威尔为什么想出这种神奇的交易，为什么不干脆把剩余的生产资料留在第一部类，让它在那里用于扩大（根据他的手法，这是最后要发生的）呢？但是，鲍威尔这样就会跳出了煎锅又掉进了火里；就是说，他将不得不解释以1,167消费品形式出现的那部分必要的可变资本怎么能够从第二部类转到第一部类。因为，这完全是行不通的，通过交换用掉每一个产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鲍威尔弥补一下他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糊里糊涂的新鲜玩意，以便把第一部类中这些不可销售的剩余商品放在一起，作为积累的最后行动。

这无疑是个大胆的想法。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并用图解加以描述。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把社会再生产的整个问题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上，使第一次准确考察成为可能。

但是，马克思的区分和他的模式，假定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的只是交换关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或商品生产经济的基本形式。当马克思运用他的模式的时候，他也严格地坚持这个基本条件，正如他始终一致地坚持他的所有假设一样。鲍威尔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通过商品不经交换地在两个部类之间“转”来“转”去以及在严肃的模式里象只大雁在空中飞来飞去（用一句波兰谚语）的办法把马克思的整个分析掷在地上。

鲍威尔求救于这个事实，即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资料的生产将要牺牲消费品生产的利益而得到增长，后一部类的资本家将因而经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过银行，持有股票或者建立新的

企业)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放到前一部类中去。这一切妙极了。但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转移”,只能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即那种一视同仁的绝对的资本形式来实现,因此它对于社会波动和推动社会商品生产的更替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批不可销售的蜡烛不能购买铜矿股份,一个堆满不可销售的胶鞋仓库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机械厂。关键在于说明一般交换如何把资本家的商品转变成货币资本,惟有它才能使波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这样,当交换不再是可能的时候,一味不经交换地把不可销售的产品“转”到另一个生产部类的做法纯粹是逃跑主义。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鲍威尔关于让一个社会生产部类参加另一个生产部类的思想。马克思说的部类并不意味着登记雇主的名字,而是指客观经济范畴。如果第二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想用他的部分货币资本在第一部类“建立”和积累什么,那不意味着消费品部类正在生产资料部类中进行生产,这在经济上是荒唐的,而意味着这个人在两个部类中同时充当一个雇主。因此,从经济的意义来看,我们是在谈论两个资本,一个生产生产资料,另一个生产消费商品。对于分析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来说,两部分资本同属于一个人和从两部分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合并起来进入一个钱袋这种事实,客观上是不实际的。因此,交换仍然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唯一联系。否则,如果有人把这两者搅拌成一碗糊涂汤,象鲍威尔所做的那样,马克思的严肃解释,这个为澄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而奋斗一百年的结果,就瓦解了;这个对于再生产进程的分析就要混乱不堪,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萨伊及其相类似的才子们却勇敢地在“稀薄的空气”中游来荡去。

请注意,首先,鲍威尔自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例如,就在他开始建造他的表格的时候,他说:“因此,消费商品工业的产

品价值在下年里必须达到 188,000, 因为消费商品具有这些价值数量才能进行交换。”^① 同样, 他的表格已经完整和积累能够进行之后, 他问道: “谁购买这些商品呢?”^② 因此, 鲍威尔自己制造出一个条件, 即他将通过提高社会商品的总数量来获得积累。到头来, 经过各种交换之后, 他在两大部类里仍然留有一些不能交换的商品。然后, 他通过使两大部类互赠礼品和让一个部类参加另一个部类的生产来摆脱困境。这样, 就在他的表格的出发点上, 鲍威尔放弃了自己的前提和马克思的模式的基本前提。

现在, 举第三个例子。

众所周知, 马克思是以这个假设来展开他的模式说明积累的, 即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关系是固定的, 即当资本也在不断增长的时候, 剩余价值的比率同样是固定的。在我的书中, 除了其他方面外, 我还解释说, 这个假设是与现实生活不相符的, 但它为马克思的模式里积累进程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方便。我说, 对技术进步稍加考虑, 即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逐步变化以及对剩余价值比例的增加稍加考虑, 就会给马克思的模式里关于积累的解释提出无法解答的问题; 它将表明, 积累不能仅仅局限于纯粹资本主义工业的相互关系。

现在, 奥·鲍威尔与马克思不一样, 他对他的表格里的技术进步十分注意, 并且十分明确地把它塞进他的计算中去, 结果, 他每一年都让不变资本以可变资本的两倍速度增长。实际上, 当他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的时候, 他对处在商业状态变化中的技术进步赋予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我们通篇看到的是什么呢? 同时, 鲍威尔为剩余价值假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来简化考察”。^③

① 《新时代》1913 年第 23 期第 837 页。

②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863 页。

③ 《新时代》1913 年第 23 期第 835 页。

请注意，如果情况需要，科学分析可以无视现实条件或者任意把它们结合起来，以使问题简单化。数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降低或者提高他的方程式。物理学家可以在真空中计划试验，解释落体相对速度。同样，政治经济学家可以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而置经济生活的具体条件于不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著作里，马克思都是从这种假设出发的，即(1)全部商品都以它们的价值出售；(2)工资与劳动的全部价值一致，这一假设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每走一步都与实际发生矛盾。马克思使用这个办法，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甚至当工人处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是如何完成的。他的分析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的科学准确性；相反，他恰恰是用这种办法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来准确地估计日常实践及其例外情况。

但是，如果一个数学家用2来乘以他的方程式的一边，而让另一边不变或者除之以2，人们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比较各种落体相对速度时，把一个放在大气里而把另一个放在真空中，人们会怎样想呢？鲍威尔就是这样胡来的。当然，马克思在他关于再生产的全部模式里为剩余价值假设了一个永远固定的比率，人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假设对于考察积累问题是行不通的。但是，马克思的确严格地遵守他的假设，并且在那个假设的范围内：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没有考虑技术进步。

鲍威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不同：他象马克思那样为剩余价值假设了一个固定比率，但他又不象马克思那样，而同时假设强有力的不断的技术进步！他把技术进步放进他的计算里，但这点绝不能提高剥削水平——这两个条件完全相互矛盾，相互中立。然后，他慷慨地让我们去试验他建立在剩余价值比率不断增加（这一点，他起初是“忽视”的）这个假设上的全部计算，并使我们确信，一切都会令人满意地进行下去。很可惜，鲍威尔认为不

值得亲自费神去继续完成他的这点叙述，而是象其他计算专家那样中断他的天才运算，并且由于在他的论证应该开始的这一点上遭到紧迫的耽误而离开了我们。^①

至少说，这是为鲍威尔的断言提供一个算术“证据”的唯一途径。他现在所提供的东西再也无助于科学分析，只不过是骗术而已，它什么都解释不了，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

直至现在，我仍然没有触及到鲍威尔的表格的经济内容。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试图说明鲍威尔是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坚持自己的条件的。我没有十分详尽地深入讨论他对表格的运用，来庆祝在揭露他的笨拙的图解运算上一文不值的胜利。通过稍微巧妙一点地建造表格，他的许多错误能够很容易得到避免——比如，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这方面可谓一名老手——不是因为这对论证问题有多大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鲍威尔如何运用马克思的模式；事实上，鲍威尔在他的表格上制造的混乱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在运用马克思的表格方面能做些什么。

鲍威尔的同行专家埃克什坦可以随意谴责他，因为他“根本误解了马克思的模式”，在“运用马克思的模式”方面“无能”透顶。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象他的同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十分严厉地评判鲍威尔，所以我不满足于强调这么几个试验，而是因为鲍威尔非常天真地解释说：

罗莎·卢森堡满意地指出马克思的模式变幻莫测——我们建议用一种理智的态度来试图看看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并且用一个没有主观臆断的模式来进行我们的考察。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建造表格的原因，它们不再是变幻莫测，它们的一个计量必然引

^① 潘涅库克用迅速增长的资本但用不变的剩余价值率来计算他的表格之后，也说：“如上所述，剥削率的逐步变化亦需要考虑了”（1913年1月29日《不来梅市民报》）。但是，他也把困难留给了读者。

导出另一计量来，只要大家首先把这个假设作为先决条件。^①

现在，我作了这些试验之后，鲍威尔将会原谅我想与这个不正确的马克思及其“变幻莫测”在一起停留。最后，我们将仍然有机会来看看一个马克思的错误与他的“专家”信徒们的大错之间的不同之处。

但是，鲍威尔并不满足于教训我，而且——他是一个完人——他也认为有必要说明我的错误。他发现了我的错误的根由：他的表格通过上述运算证明“没有余剩”之后，他写道，“因此，卢森堡同志关于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卢森堡同志怎能得出这个不正确的假设呢？”下面是他的令人惊讶的解释：

“我们已经假定，资本家在第一年里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通过第二年里增加的劳动力而得到运行，同时，资本家在第一年里购买消费品并于第二年里出售给增加的劳动力。如果不是这样假定的话，要在今年内实现第一年里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又说：

“罗莎·卢森堡认为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不能实现的。实际上，它在第一年里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追加的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直到第二年才购买的话。”^②

这是问题的核心。我原来不懂得，如果一个人想开办一个工厂并于1916年进行投产，他不得不建造必要的厂房，购买机器和材料，并且为即将雇佣的工人获得储存中的生活用品——于1915年。我认为一个人首先建立商业企业，然后为它购买建筑工地；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2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6页。

一个人首先雇佣工人，然后种出黑麦，将来给他们烤制面包！事实上，这是荒唐可笑的一一就是因为这样的揭露居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报刊上排上了用场。

这样，奥·鲍威尔真地相信马克思的公式与“年份”有关，同时，这个好人用两页的篇幅、简单的语言以及三层公式、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煞费苦心地向我指出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模式与日历年份毫无关系。马克思论述的是产品的经济变态和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系，他论述的是这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进程在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里的先后次序是：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交换——消费，等等。由于交换是所有产品的不可避免的传统阶段和生产者之间唯一的环节，所以，当商品实现的时候，它起初对于获取利润和积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下面两个事实是有关系的：

1. 总体资本家，象每一个单个资本家一样，他没有交换他的商品数量之前不能计划扩大生产；

2. 总体资本家，象每一个单个资本家一样，他在没有表明存在一个扩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不能计划扩大生产。

那么，整个资本家阶级从什么地方找到那个日益增长的作为他们积累基础的市场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最后，鲍威尔提供了下面的详细阐述：

“事实上，积累起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已经实现了。无论怎样，这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实现的。因此，比如，将在第二年用来养活额外的工人的生活用品，一般地是在第一年里生产出来，出售给批发资本的。这样，存在于这些生活用品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第一年里将已经得到实现。然后，另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在批发商向零售商出售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零售商再出售给工人的过程中得以完成——这样，到目前为

止，我们的模式忠实地反映了现实。”^①

至少，鲍威尔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他是如何设想实现剩余价值的。不管是在第一年里或是在第二年里，它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发生的，工厂主把生活用品出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出售给零售商，最后小商贩出售给额外劳动力。这样，归根到底，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并把它转化成硬货币的，是这些工人。“到目前为止”，鲍威尔的模式忠实地反映了单个资本家和他的理论上的桑乔·潘萨^②即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视野。

当然，就单个资本家而言，对于消费他的商品来说，张三和李四，工人和另一个资本家，国民和外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并无两样。不管单个资本家把商品出售给谁，他都把利润装到钱袋里。同时，在生活用品部门向工人出售商品的雇主捞取利润，和在奢侈品部门向“最上层的一万名”贵妇人出售如饰带、金制品和钻石等高级货物的雇主捞取利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鲍威尔对此毫无察觉，把单个雇主的这个陈腐的经验主义转嫁到总体资本家身上，如果他不能区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单个资本再生产的条件——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呢？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即鲍威尔的同事希法亭所称的这部“惊人著作”的决定性的成就，在于马克思最后从魁奈、亚当·斯密和追随他们的可怜的模仿者的矛盾混乱状态和笨拙尝试中第一次无比清晰地推断出两个类别的根本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及其各自的运动！让我们尽可能简单地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鲍威尔的思想。

工人从什么地方得到他们将用来购买生活用品并因而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呢？只要单个资本家得到钱财，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8页。

^②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的仆人。——译者

他对他的“顾客”从何处获得钱财就根本不去理会——它可能是赠送的、偷来的或者通过卖淫而赚得的。但是，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仍然存在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即工人通过交换劳动——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我在上面解释的那样，他们根据现代生产的条件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获得这些手段：首先作为货币，后是作为商品，货币总是以这种方式回到它的出发点即资本家阶级的钱袋。这个可变资本的流通，通过与资本家的交换，完全耗尽了工人的购买力和堵塞了他们的门路。因此，如果生活用品配给了工人，从社会的意义上说，那并不意味着资本正在实现剩余价值，而是意味着它正在传递着商品（物质工资）形式的可变资本，因此，它以同等数量的货币资本从前一个时期中重新获得自己的资本。这样，根据鲍威尔的公式，剩余价值的所谓实现就在于，资本家把一部分商品形式的新资本同已经属于他们的数量相等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反复地进行交换！事实上，资本家阶级的确进行这种交易，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痛苦的必需，把总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给予他们的劳动力，以让他们能够生产出新的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阶级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正在“实现”它先前的剩余价值。这有待鲍威尔来发现。^①

① 一个小“专家”已经在《德累斯顿人民报》（1913年1月22日）上出色地解决了积累问题。他告诉我们说，工人获得的“每一个额外的马克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十多个马克的资本投资，因此，工人的斗争……为剩余价值创造了一个市场，使资本积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成为可能。”这个小家伙多么聪明啊！如果这样一位“专家”下一次有一个美妙的想法，打算在经济观察当中仅仅写上“噤噤噤”，那么，他就完全可以肯定，这亦将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而不受任何检查。看来，这些尊敬的编辑们，至少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正在忙于在议会的休息厅和走廊里颠倒整个世界历史的工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亲自阅读理论书籍以便对于出现的问题形成某种意见，是浪费时间。要把这种东西传给一个用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统计刊物来校对经济评论的最亲近的文宿，那就容易得多了。

无论怎样，鲍威尔自己对剩余价值向可变资本的转变根本不代表“剩余价值的实现”这个问题也有一点怀疑。例如，只要论述在老框框内更新可变资本的问题时，他对此就只字不提。“追加的工人”出现之后，这个聪明把戏才开始拿出来。已经被资本雇佣多年的工人仅仅获得工资——先是作为货币，后是作为生活用品——并反过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而最近被雇佣的工人，甚至完成更多的东西；他们通过使用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货币工资并从这些相同的资本家那里购买生活用品来“实现”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普通工人只是实现自己的商品——劳动力——为的是他们自己，而当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时，他们为资本家做的就太多了。但是，这些所谓“追加的”工人，据说要为资本完成一个双料的奇迹：（1）他们生产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2）他们实际上实现这个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

就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入口处，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再生产进程的基本概念。现在已经十分清楚，鲍威尔不仅是应命解释马克思的第二卷，而且是应命“剔除”它的矛盾和“武断性”并“合理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在批评我的书的总论部分冠之以如下段落：

“卢森堡同志认为，包含着 $(\alpha + \beta)$ 的商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包含着用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那些商品——罗莎·卢森堡），必须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出售才能使它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它们是些什么商品呢？它们是资本家扩大生产机器所必须的那些生产资料和喂养追加的工人所必需的那些商品。”

鲍威尔对我的迟钝感到惊讶，喊道：

如果那些商品被扔出资本主义世界，下一年的生产就不可能扩大。需要用来扩大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或者需要用来养活追加的劳动力的生活用品，都得不到供应。从资本主义市场消灭这一

部分剩余价值，会象罗莎·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使积累成为不可能，甚至会使任何积累都成为不可能。”^①

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再次断言：“包含着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不能出售给殖民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需要它来扩大生产。”^②

天啊，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种思想，这种批评好呢！我们又回到老基尔希曼^③或者那个尊敬的俄国大混淆专家沃龙佐夫^④那种水平的经济无知的范围里。鲍威尔真地相信，如果资本主义商品被“扔”到非资本主义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要全然消失，就象被扔进海里一样。他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这是今天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即如果商品出口到国外，它们并没有丢失，而是得到交换。通常是从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阶层购买其他商品，给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高傲地说我对资本主义历史里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现实无知，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十分有害的无知！

这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把煤和铁“扔”到当时非资本主义的北美和南美；它并没有灭亡，反而成长和发展起来，红光满面。德国资本主义急切地向土耳其输出机器、铁、火车头和纺织品，并没有崩溃。相反，它准备点燃整个世界，以便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垄断这个贸易。为了开创机会，把资本主义商品“扔”到非资本主义的中国，法国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3页（着重点全是鲍威尔加的）。

② 同上，第873页。

③ 〔尤利乌斯·基尔希曼（1802—1884），德国律师、哲学家和政治家。对于他的思想的评论，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部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版；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1969年版）。另见卢森堡的前引书。〕

④ V. P. 沃龙佐夫（1847—1918），民粹主义理论家。见格·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观点的发展史》（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另见卢森堡的前引书。

和英国在东亚打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本世纪初，欧洲的联合资本进行了一次反对中国的国际性十字军远征。贸易，与农民和手工业者——欧洲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交换，是今天每一个国家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同时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工业生存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奥·鲍威尔又突然宣称：如果资本家要把他们及其工人没有消费掉的商品“扔”到非资本主义世界，积累将会成为不可能！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历史上将会是可能的；如果资本完全依赖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话。

一个人就是这样因为热衷于愚蠢理论而作茧自缚！但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体“专家”信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征——我们将在下面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证实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埋在一个抽象的“模式”里，对现实失去一切知觉；他们越是勇敢地手持拐杖在理论的雾霭中徘徊，他们就在现实生活铁的事实面前跌撞得更加可悲。

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鲍威尔的基本观点；我们熟悉了他的方法和步骤。但我们还没有谈主要问题：他的人口理论。

奥托·鲍威尔的“新”人口理论

“每一个要发展的社会都必须每年扩大它的生产机器。这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对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一种必需，或者象过去它对自给自足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农民经济是一种必需一样。”^①

简而言之，这是鲍威尔对于积累问题的解答。为了积累，资本需要一条稳步增加的出路，来使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条出路从何而来呢？鲍威尔答道：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象任何其他社会的人口一样不断增长，这样就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并为总积累提供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需要调整资本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②从这个核心论点出发，鲍威尔推断出资本及其形式的运动特点。

首先是生产和人口的平衡状态，即波动发生时所围绕的中线。为了便于说明，鲍威尔假定人口每年增长5%。

“如果要保持平衡的话，可变资本必须增长5%。”技术进步增大了不变资本（死生产资料），但牺牲了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工资）的利益。为了强调这个事实，鲍威尔假定它以两倍的速度增长，即每年增长10%。在这个基础上，他建造了一个“无可争辩的”表格，他的许多表格我们已经熟悉，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只是它们的经济内容。在这些表格里，鲍威尔完全无视社会总产品。他得出了这个结论：“生产领域的扩大，是积累的先决条件，是人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4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页。

口增长所提供的。”^①

这个使积累不受干扰的“平衡状态”的极其重要的论点，取决于可变资本要以人口增长的同等速度增长。让我们简略地看看鲍威尔的基本积累规律吧。

用他的例子来说，人口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这样，可变资本也必须增长5%。这是什么意思呢？“可变资本”是一个价值数量，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体现在一定数量的货币上。这可以代表货物的不同总量。一般来说，假定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那末，可变资本的一个相对减少的数额就与消费资料的一个不变数额相符合。如果人口每年增长5%，可变资本也只需要增长比如说4.75%、4.5%、4.25%、4%等等，来提供一个同等的生活水平。鲍威尔的确假定了技术上的总进步，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预先假定不变资本以两倍的速度增长。鉴于这个假定，可变资本与人口平衡地增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即如果价格保持不变，尽管技术在各个生产部门进步迅速——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但是，这不仅在理论上埋葬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且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在实践上是不可理解的：因为降低价格是竞争斗争中的一件武器，是促进单个资本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驱的一种刺激物。

但是且慢！当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这种进步而提高的时候，尽管生产率不断增长，生活用品变得便宜，难道我们就必须认为货币工资保持不变吗？在这里，要考虑工人阶级的社会提高。但是，如果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猛烈，以致可变资本（货币工资的总额）必须每年完全以工人人口的相同比例增长，那末，这意味着所有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资本家既不能提高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剩余价值的比率。我们知道，鲍威尔确实为剩余价值假定了一个不变比率。他说，他只是“为了简化起见”而假设出来的，……“首先”，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知识界的糊涂虫去掌握他的理论要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能看见的那样，这个假设实际上是鲍威尔的理论的经济基础，整个“平衡状态”都依赖于它。鲍威尔自己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一点：

“我们的模式(表格 I V) 预先假定，(1) 工人人口每年增长 5%，(2) 可变资本以工人阶级的同等速度增长，(3) 不变资本(即死生产资料的成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达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不存在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这不会令人惊讶。”^① 对了，但这些条件本身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只要我们不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荡，而是站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面上，那末，如果全部利益只是为了工人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刺激资本家去利用技术进步并把越来越大的金额投资于不变资本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创造“相对剩余价值”，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剥削率，是整个资本家阶级要促进技术进步的唯一客观理由；它是单个资本不知不觉地追逐额外利润的竞争的真正客观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鲍威尔的令人惊讶的假设在经济上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顺着他的观点走下去，假定有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很清楚，我们就得出结论，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不可能以人口增长的“同等速度”增长。如果人口增长速度不变，可变资本只能以稳步下降的比率增长，比如说 $4\frac{5}{6}\%$ ， $4\frac{4}{5}\%$ ， $4\frac{3}{4}\%$ ， $4\frac{1}{2}\%$ ，等等。反过来说，要使可变资本每年固定不变地增长 5%，人口就得以不断增加的比率增长——比如说 $5\frac{1}{4}\%$ ， $5\frac{1}{2}\%$ ， $5\frac{3}{4}\%$ ，等等。

①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869 页。

鲍威尔的“平衡”规律象一座纸糊的房屋那样倒塌了。他的“平衡”理论建造在两个经济谬论的窘境之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实质和积累的目的相矛盾——要么技术进步根本不降低商品价格，要么降低价格不是为了积累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

让我们看看现实吧。鲍威尔关于5%人口增长率的假设当然只是理论上的假设。他是满可以选择2%或10%的。但是，人口的实际增长绝不是无形的，因为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进行调整，来与之相适应。他的全部积累理论就是依赖这个基本原则。比如德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情况如何呢？

根据官方统计，1816至1864年间，每年增长为0.96%，1864至1910年间为1.09%。这样，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增长率实际上从0.96%提高到1.09%——提高0.13%。如果我们看看德国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从1871至1880年，每年增长为1.08%；1880至1890年为0.89%；从1890至1900年为1.31%；从1900至1910年为1.41%。这里，在四十年间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期间，它是怎样与德国资本主义的增长率一致的呢？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甚至看到更好的例子。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的数字，人口的年增长率是：

	百 分 比
奥匈帝国	0.87
欧洲部分的俄国	1.37
意大利	0.63
罗马尼亚	1.50
塞尔维亚	1.60
比利时	1.03
荷 兰	1.38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0.87
美 国	1.90
法 国	0.18

人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以及不同国家的比较，为这个所谓资本积累基础的观点提供了极妙的数据。开个玩笑，要寻找鲍威尔假设的5%，我们恐怕需要迁居到气候暖和一点的地区，象尼日利亚或者巽他群岛什么的。实际上，下列国家（和地区——译者）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百 分 比
乌拉圭	3.77
英属马来亚	4.18
南尼日利亚	5.55
北婆罗洲	6.36
香 港	7.84

很可惜，那些诱人的丰美的牧场，只存在于那些尚未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地方，而我们一旦靠近资本主义庭院，就会觉得这些地区成了荒原！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件事吧。鲍威尔说，资本积累依赖于人口增长。比如说，法国的情况怎样呢？那里的人口增长已经稳步下降；现在只有0.18%。那里的人口增长正在慢慢地成为停滞状态，也许将来甚至是绝对的下降。尽管如此，法国的资本积累进行得十分痛快；如此顺利以致法国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它的资本储备。在塞尔维亚，人口增长比英国快两倍；但是，众所周知，资本积累在英国比在塞尔维亚猛烈得多。这怎么解释呢？

这些疑问的答案完全指出了我们的愚钝：鲍威尔的理论与单个国家及其人口没有关系。它说的是一般的人口问题。整个人类的增长是重要的。妙极了！但是，还有甚至更加离奇的——不解之

谜哩。

很明显，只有在人类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的情况下，“人类”的每年增长才和资本主义有关。毫无疑问，在北婆罗洲和在南尼日利亚令人鼓舞的人口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资本积累没有多大关系。资本主义的顾客数量的增加与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否多少有点联系呢？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资本要等待通过自然再生产来增加顾客，它充其量会仍然是处于它的生产初期的襁褓之中。事实上，资本没有梦想等待。相反，它运用其他简要的方法来扩大积累的基础。它利用一切政治手段来进攻(1) 易货经济，(2) 简单商品生产经济。它逐步把这两者摧毁掉，同时在全世界各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但是，这些方法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人口增长发生激烈的矛盾。

在人口下降的情况下，顾客数量可以增加。事实上，制造一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方法是与大量屠杀部落人民甚至灭绝整个部落齐头并进的。这个仍然进行着的过程自从发现美洲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西班牙人十六世纪在墨西哥和秘鲁是这样干的，英国人十七世纪在北美和十八世纪在澳大利亚是这样干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十九世纪分别在马来群岛、北非和印度都是这样干的，德国人二十世纪在西南非也是这样干的。欧洲资本为“打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也导致中国人民经常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因此，不可避免地减缓了他们的自然增长。

同时，由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基础的扩大是与那里的人民的部分灭绝联系在一起，所以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扎根的那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不同的变异。

在后者的两个要素（出生率和死亡率）里，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运动。一般来说，出生率正在下降。因此，下面这些是德国每 1,000 居民的出生率数字：1871

至1880年为40.7；1881至1890年为38.2；1891至1900年为37.3；1901至1910年为33.9；1911年为29.5；1912年为29.1。当你拿高度发达国家同不发达国家作比较时，存在着同样的明显趋势。1911至1912年，每1,000人当中，在德国出生的是28.3；在英国是23.8；在法国是19.0；在葡萄牙是39.5；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40.3；在保加利亚是40.6；在罗马尼亚是43.4；在俄国是46.8。所有的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和博士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大城市生活、工厂、人身的不安全、文化提高等的影响——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现代发展和文化提高成功地抗御死亡率。因此，在德国每1,000人当中每年死亡：1871至1880年为28.8；1881至1890年为26.5；1891至1900年为23.5；1901至1910年为19.7；1911年为18.2；1912年为16.4。拿高度发达国家同落后国家比较，出现同样的图景：1911至1912年每1,000人当中在法国的死亡人数是17.5；在德国是15.6；在比利时是14.8；英国是13.3；俄国是29.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26.1；罗马尼亚是22.9；葡萄牙是22.5；保加利亚是21.8。人口增长的快慢，有赖于这两个因素谁强谁弱。但是，无论怎样，影响人口增长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经济上、社会上、物质上和学术上的附带现象，是资本主义积累，而不是倒过来。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迟早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香港和婆罗洲与德国和英国形成鲜明对照，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与法国和意大利形成鲜明对照，这些例子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说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鲍威尔的理论颠倒了实际关系。他把资本积累从属于人口增长，否定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资本确定人口形式：它有时候大规模灭绝人口，有时候加速它的增长，有时候又减缓它的增长——一般的结果是：积累越

快，人口增长越慢。

这是对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绝妙的报答，他忘记要面向现实，忘记问问自己：对了，资本积累依赖于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本身又依赖于什么呢？

弗·艾·朗格^①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一书中说：

“这些年里，我们德国仍然有些所谓哲学家，他们用一种笨拙的形而上学方法写出了关于思想根源的伟大论文——也许甚至号称是通过内部感官而得到的精确观察——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存在着托儿所这个事实，也许这些托儿所甚至就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在那里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观察思想根源的征候。”

我不知道德国今天是否仍然存在着这种“哲学家”。但是，这种企图通过完全图解式的计算，通过使用“内部感官”和忘记眼睛，耳朵、世界和托儿所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笨拙的形而上学方法”，似乎在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中间找到了精干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

但是，事情甚至变得更加美妙。直到现在，我们始终在考虑人口增长的经济条件，因为鲍威尔看来正在把他的积累理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他的理论另有一个基础。当他谈论“人口”和“人口增长”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佣工人阶级，而且指的只是这个阶级。

下述引语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口每年增长5%。如果能够保持（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那末，可变资本（即所支付的工资总额）也必须每年增长5%。”^②

如果计算生产所依据的人口消费等于可变资本即所支付的工

^① 弗·艾·朗格，十九世纪《唯物主义史》一书的作者。见马克思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博士的信。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35页。

资总额，那末，这个“人口”指的只能是工人。但是鲍威尔自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人口增长获取生活用品，是通过可变资本的增加体现出来的。”^①他在下面的段落里甚至说得更加清楚，这是我已经引用过的：

我们的模式假定，“(1) 工人人口每年增加5%，(2) 可变资本以工人阶级的同等速度增长，(3) 不变资本（即死生产资料的成本）比可变资本增加更快，达到技术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不存在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这不会令人惊讶的。”^②

请注意，根据鲍威尔的假设，社会里只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他在几行之后接着说，“因为在一个只是由资本家和工人构成的社会里，失业无产者只有挣来的收入，”^③等等。这个假设绝非偶然；相反，它对于鲍威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的任务，象其他“专家”的任务那样，是要驳斥我，其办法是要证明，根据这个“模式”，资本积累是可能的，甚至在一个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里也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鲍威尔的理论里，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只是与无产阶级有关。鲍威尔先是把人口仅仅归结为工人和资本家（用他的明确的假定），然后偷偷把它归结（用他的运算）为工人。这些就是资本适应他们的需要的“人口”。这样，当鲍威尔把每年“人口增长”5%作为他的图解说明的基础时，这意味着只是工人人口每年增长5%。或者，我们也许应该把无产阶级这个增长仅仅看作总人口每年正常地固定地增长5%的一部分？但是，那会完全是新的发现，而且专业统计学家早已证实，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个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第884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③ 《新时代》1913年第23期

阶级都遵循着自己的人口规律。

事实上，鲍威尔不是在考虑总人口的固定增长。无论怎样，这对于他的资本家是无效的，可以很容易证明，资本家的年增长率根本不象是5%。

鲍威尔在835页里列出下述连续四年的消费货物数字：75,000；77,750；80,539和83,374。如果鲍威尔假定工人的工资随着这些数字而增加，那末，我们就有理由假定，资本家的生活水平至少不比工人的生活水平更糟；而且他们为消费而获得的收入是和他们的增长并驾齐驱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鲍威尔的模式里资本家的消费就可以得出下列数字，作为在相应的四年里资本家阶级每年增加的结果；第二年为5%；第三年为3.6%；第四年为3.5%。如果这将继续下去，鲍威尔的资本家会很快开始死光，这会是解决积累问题的最奇特的办法。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过问鲍威尔的资本家的个人命运；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证明，鲍威尔在谈论作为积累基础的人口增长的问题时，他总是指工人阶级的增长。

鲍威尔自己最后作出了说明，在869页上解释说：“它（积累率）必须继续这样增长，直到可变资本的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为止”。

他在871页上再次同样清楚地制定了这条总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积累总是需要根据人口的增长来调整。一旦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以工人人口增长的同样速度增长，这个调整就完成了，但是不变资本增长得更快，它的速度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

鲍威尔在文章的结尾作了最简要的说明，他把主要意思概括为：

“首先，（在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象他的模式所依据的那

个社会) 积累受到工人人口增加的限制。因为——在资本的特定有机组成下——积累数量取决于可以得到的工人数量的增加，等等。”^①

这样，整个问题就大白于天下：在调整资本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的借口之下，鲍威尔使资本完全依赖于工人阶级及其自然增长。我们明确说自然增长，是因为在鲍威尔的社会——它没有中间阶级，唯有资本家和无产者——无产阶级不能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那里招募，从而只能通过自然再生产来增加。鲍威尔就是把这个适应无产阶级人口的调整塞进资本主义商业循环的中枢。我们必须从这一点来检验他的理论。

我们看到，当可变资本即那部分拨出来支付工资的资本以人口的同等速度增长的时候，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就达到了。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断地企图破坏这个平衡，先是向下——成为“积累不足”——然后向上——成为“积累过剩”。让我们开始考虑这个摆动的第一个运动吧。

鲍威尔说，如果第一个“积累率”太低，就是说，如果资本家不留出足够的新资本用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增长就要落后于寻找工作的人数的增长。“我们可以把那时出现的状态叫做积累不足状态。”^②然后，鲍威尔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个状态。积累不足的第一个结果是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一部分增加的人口失去工作。失业无产者对受雇者的工资施加压力，工资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因为，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里，失业无产者只有工资收入，而没有其他收入；工资必须下降，剩余价值率必须上升，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找到工作为止，尽管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在产品分配中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是这种情况造成的，随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着体现技术进步的有机地组成的资本的不断增长，劳动力的价值已经下跌，从而创造了相对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的增长为资本家提供了新的资金，用来进行新的更加猛烈的积累，结果导致对于劳动更加强烈的需求：“因此，将被用于扩大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也增大了”。它将继续这样增大下去，“直到可变资本的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①就这样，我们从积累不足中解脱出来，回到了平衡。在这里，我们已经描述了资本钟摆运动的一半；让我们再费点时间，谈谈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动作吧。

平衡状态意味着——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无产阶级人口的增长相互平衡；这样，整个工人阶级都找到职业，来维持它的自然增长。那时，生产被扔出了这个平衡，对于工作的需求落后于无产阶级的增长。是什么东西把它扔出了平衡的呢？是什么东西使钟摆第一次移过平衡的中心点呢？要从鲍威尔的深奥的废话中发现这个秘密，一般的人觉得有点困难。很幸运，他在下一页里用稍微清楚一点的语言帮助了我们，他说：“通向更高级的有机组成的资本的进程，总是带来积累不足。”^②

这至少是清楚的，中肯的。技术进步用机器取代了活的劳动力，并因此周期性地减缓对于工人的需求，创造了产业后备军，降低了工资；总之，它造成了“积累不足”的状态。

让我们拿鲍威尔和马克思作个比较吧。

1. 鲍威尔说，在积累不足的状态中，“劳动价值下降”，“相对剩余价值”就这样形成，充当新的资金去进行积累。如果机器的使用使得“一部分增加的人口失去工作”，而且在这些失业者的压力下“工资下降”，那仍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下降；它却意味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69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0页。

着，由于供应过剩，商品劳动的价格（货币工资）降到了它的价值之下（即低于工人先前获得的生活水平）。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相对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工资因对于工人的需求的减少而降低到劳动价值之下产生的，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点——它在这个明确的条件下，就是在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与它的价值相等的条件下，换句话说，就是在劳动的供求处于平衡状态的条件下产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在这个条件下产生，是由于维持劳动的成本的下降，就是由于鲍威尔在解释时所忽略的那个因素，大家看到，他解释说，“可变资本以工人人口的同等速度增长”，这对于“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幌子下，鲍威尔事实上只是从通过资本主义钟摆的向下摆动强加给工人的工资下降中，来实现新的资本的形成，并打算用这新的资本来提供将来的积累。

2. 支配工资运动并使工资必须“不断地下降”直到整个工人阶级都受到雇佣的那个非凡的经济规律，是一种什么规律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工资降得越低，就业水平就升得越高。当工资达到最低点的时候，整个后备军将被吸收！在实际生活中，事态的正常发展则完全相反：工资的下降与失业的增加一致；工资的上升与就业的增加一致。当工资达到最低水平的时候，产业后备军通常是最庞大的，而当工资达到最高水平的时候，这支后备军或多或少得到吸收。

但是，在鲍威尔的模式里，奇怪的事情还多着哩。

资本主义生产用一种既简单又突然的办法把自己从积累不足的死亡幽谷里解脱出来：当工资最低的时候，资本家能够积存新的利润（鲍威尔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解有点不当，他把它们称作“相对剩余价值”）。然后，它们为投资提供新的资金，来扩大生产，提高对劳动的需求。再一次，我们不是站在干硬的大地上，

而是在鲍威尔的“社会”里随波逐流。在这些日子里，资本将不得不从工资的总下降中艰难地积攒起它的微薄储蓄，然后它才敢于开始新的投资和新的企业！它必须等待工资下降到最低水平，以便获得新的投资资本来扩大生产！在鲍威尔梦幻般的推测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的发展的终极水平。所有中间阶层已被吸收，唯有资本家和无产者留在那里。然而，这个社会没有资本储备，它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就象十六世纪英国“艾金大夫的艰难岁月”一样。很明显，那个社会还没有银行，而在这里，银行早就开始积累巨额资本储备，正在等待机会用各种工资水平进行投资。目前发生在所有交战国家和中立国家里最高水平的疯狂积累，把世界战争的残酷收获放进它们轻易得来的利润仓库里。这是对于鲍威尔幻想的贫血资本的最富于戏剧性的讽刺，这个贫血资本依赖于劳动力周期性的总萧条下降到最低水平，以便鼓起勇气，进行它的冒险性的积累活动。鲍威尔描述“恢复平衡”时自我重复地说：

“在产业后备军的压力下，剩余价值率，以及伴随出现的社会积累率，将要提高，直到它大得足以用工人人口增长的同等速度来增加可变资本，不管有机组成是否增加。这点一旦达到，产业后备军就被吸收（请注意：这是第二次了，它以前曾被吸收过，那时工资达到最低水平即处于最严重的“积累不足”。——罗莎·卢森堡），积累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就得到恢复。”^①

这个“平衡状态”恢复之后，接着出现钟摆的第二个摆动——向上，到“积累过剩”。鲍威尔非常简单地描述这个过程：

“如果社会积累率上升（由于有意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缘故！——罗莎·卢森堡），可变资本比人口增长更快这一点将可达到。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0页。

我们把这个状态叫做积累过剩状态。”

这就是鲍威尔谈的全部关于“积累过剩”的问题，他只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所发现的仅仅是，积累率（即适用于投资的资本的形成）“最终”增加到对劳动的需求大于供应这一点。但是，它为什么“最终”必须达到这一点呢？是它遵循着一条物理惯性规律，因为它已经处于增长的过程之中吗？让我们想象一下是什么东西推动这个增长吧！在失业的压力下，工资下降，导致了可处理（？）资本的增长。这个增长只有在所有工人恢复就业之后才能继续下去，而且，在鲍威尔的奇怪社会里，工资达到最低点时才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一旦整个工人人口都得到雇佣，甚至在这个奇怪的社会里工资就停止下降，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实际上又开始上升了。每当它们开始上升的时候，“积累”率——根据鲍威尔的观点——只能从那个源泉才能增长的“积累”率，必须停止增长。那末，当全体工人都受到雇佣的时候，它怎能继续增长，达到“积累过剩”的“最终”阶段呢？我们等待答案是徒劳的。

积累过剩的根源，我们仍然不得而知。把我们蒙在鼓里的，还有这个运动的最后一个动作：积累过剩得以克服和平衡状态得以恢复的过程。

“如果积累率太高（当然如此：对于劳动力及其增长来说——罗莎·卢森堡），那末，后备军很快就被吸收，工资上升，剩余价值率下降。”导致利润率甚至更加迅速下降的是这个，而不是有机组成的资本增加的结果。这引起“一切灾难性的危机，资本的大规模失业，价值的大量破坏和利润率的突然暴跌”，而我们再度回到“积累不足”，因为积累下降和“可变资本的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①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页。

但是，积累过剩高潮时出现“灾难性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于鲍威尔来说，积累过剩仅仅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增加快于人口的增加。更简单地说：对劳动的需求大于供应。那就引起了工业和商业的危机吗？鲍威尔回避说明，而引用希法亭的一句话来解救自己：“当前面描述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猛于因需求增加而引起价格和利润上升的趋势时，”危机就出现了。希法亭的这句话并没有替鲍威尔解释什么东西，因为它不是解释，而是对于危机的复杂描述——它象一只狐狸闯入鸡群那样闯入了鲍威尔的推断之中。

鲍威尔从来没有提到，对商品的“需求”的增长或者下降会引起“价格和利润的上升”。鲍威尔只是看到两个数字的相互作用：可变资本和无产阶级即“人口”。他从来没有提到对商品或者市场的需求以及它们的问题。积累过剩只不过是可变资本（即对工人的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方面的过剩。鲍威尔所谈的只是这个“需求”。那应该引起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吗？我们倒要看看这个奥妙！

诚然，在我们这个凡世上，一切危机的爆发也是出自一种形势，那里对劳动的需求非常强烈，而且工资上升。但是，这个现象实际上不是危机的原因，而只是它的“暴风雨中的海燕”，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称的那样，它对于形势、生产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次要因素。

无论一个人怎样在理论上解释周期性的危机，事实上它们很明显是由于生产（即商品供应）和市场（即对商品的需求）之间比例失调而造成的。对于鲍威尔来说，甚至不存在市场的问题，他的周期性危机，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工人阶级的自然繁衍之间的调整不当。由于工人的繁衍不象资本不断增加的需求所要求的那样迅速，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就发生了。周期性的劳力短

缺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原因——那的确是“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①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不仅是马克思以来而且是威廉·配第^②以来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的各个方面，鲍威尔进而得出了这个和谐的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带有一种把受阻的积累率提高到人口增长（即工人人口的增长）的水平的机能。”他再次强调：

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个整体的话，调整积累以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就作为一个周期而出现。繁荣就是积累过剩，它在危机中摧毁了自己。接着而来的萧条是积累不足时期；它自我恢复起来，因为萧条本身为回到繁荣创造了条件。周期性地回到繁荣、危机和萧条，这经验般地体现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动地克服积累过剩和不足，资本积累反复地根据人口的增长得到调整。^③

真是再明白不过了。鲍威尔的“机能”完全依赖于下面这个情况：居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是工人阶级。经济生活围绕工人人口和它的自然增长的轴心而转动。可变资本有时太小，雇佣不了所有的无产者，因此，它通过降低工资来促进增长。资本有时又铺得太广，不能找到足够的劳动；它在危机中毁掉自己。在两种情况下，生产的整个运动都是不断努力进行调整，以适应工人的数量及其自然繁衍。

这就是鲍威尔的“机能”、他的复杂数学技巧和解释的精华。

① 通常被译作“经济学”，但这个德文词具有某种无法直译的涵义——编者。

② 威廉·配第（1623—1687），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出生于汉普郡的一个穷苦的纺织家庭，他的一生做过多种工作，当过海员、小贩、医生、解剖学教授和音乐教授。他曾在法国耶稣会神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写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比如《政治算术》、《爱尔兰政治剖析》、《论赋税》等。

③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2页（着重点全是鲍威尔加的）。

深知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已经可以猜想到隐藏在鲍威尔的积累理论后面的哥白尼式的努力。但是，在我们能够充分估价这个努力之前，我们必须看看鲍威尔是如何轻易地解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特征的：

“调整积累来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驾驭着国际关系。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把它们每年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外国，而且这部分剩余价值越来越大。例如：法国和英国。（我想，还有德国。——罗莎·卢森堡）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向外国引进资本并向它们提供劳动。例如：东欧的农业国家。”^①

这一切说得多好啊，既清楚又中肯。人们几乎能够看见鲍威尔满意的微笑，在他新近获得的原理的帮助下，他得意洋洋地象解决小孩游戏那样解决那些最复杂的问题。让我们通过触及几点来参加这个游戏吧。

有些国家“经常出现积累过剩”，而有些国家则“经常出现积累不足”。但是，什么是积累过剩呢？什么是积累不足呢？答案在下一页：“繁荣是积累过剩，积累不足是萧条。”因此，有些国家经常出现繁荣：英国、法国、德国；而有些国家经常出现萧条，就是东欧的农业国家。那不是太妙了吗？再问一下：积累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在前一页：“通往更高级的有机组成的进步（简单：技术进步）导致积累不足。”因此，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必然是技术上最先进的——东欧的农业国家。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必然是那些进步最慢最弱的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太妙了，不是吗？

所有之中最突出的，似乎是北美。它同时既有“经常积累过剩”又有“经常的积累不足”，既有蒸蒸日上的技术进步又有最缓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1页。

慢的进步，既有经常的繁荣又有经常的萧条。它同时而又一直从其他国家引进——真是奇迹啊——资本和劳动力。……

让我们拿鲍威尔的“机能”说与马克思的观点作个对比吧。

鲍威尔理论的精华是调整资本来适应人口及其增长。对于鲍威尔来说，积累过剩意味着资本的增长快于无产阶级的增长，积累不足——就是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什么呢？鲍威尔从《资本论》第三卷里引用了一段话，马克思在那里论述的是积累过剩的问题，鲍威尔以此来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理论完完全全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说明：

“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 $C + \Delta C$ 同增加 ΔC 以前的资本 C 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种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①

鲍威尔对这段引语作了补充：“这一点是积累的绝对极限。一旦达到这一点，为适应人口增长而进行的积累调整便带来一场‘灾难性的危机’，”云云。这样，他要使一般的读者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同他自己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鲍威尔用自己的语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第 280 页。

言说得更加简明罢了。

就在鲍威尔引用的这一段的前面，马克思说：“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① 马克思说的与鲍威尔说的完全相反：资本和工人人口两者的同时过剩——是同一个第三者造成的。在鲍威尔在 246—247 页上引用的同一章里，马克思说：

“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②

马克思在同一页上进一步说：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这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它是作为绝对的过剩资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的；这是两者同时并存和互为条件的一个例子。”^③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末，马克思的这一章的标题是什么呢？是“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资本论》第三卷第 245 页）。

在那里，鲍威尔想从那一章里摘引一段并添上一句，来使人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第 280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第 285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第 285 页。

得出他是在忠实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印象。光是这一章的标题，就是十分强而有力，足以使鲍威尔的大厦崩溃。鲍威尔的“积累过剩”和马克思的积累过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术语，事实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鲍威尔的积累过剩，等于繁荣，等于对劳动的最高需求，等于产业后备军的吸收。马克思的过剩资本是等于工人的过剩，等于最严重的失业；积累过剩意味着危机和萧条。鲍威尔宣称：周期性地出现过多的资本，是由于工人过多。马克思说：周期性地出现过多的资本，结果出现过多的工人。这两个“过多”是与什么有关呢？在“正常的”条件下，与市场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市场周期性地变得太小，资本就必然被搁置起来，结果一部分劳动力也被搁置起来。经济的因果关系是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的市场，始终是一个出发点。可变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这个市场及其运动。而失业工人的数量，则取决于那种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反复阐明这个问题。因此在第240页上，他专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调整自己的。鲍威尔也引用了“生产范围的扩大”，来作为积累的根本，并加上了他自己的固有观念：“生产范围是通过人口增长而扩大的”。^①但是，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他认为的“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含义。“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②他又在第250页上描述了危机及其复苏之后说：“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同时，在第250—251页上，我们已经看到：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73页。

“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

很清楚，“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指的是市场而不是工人人口的增长。同市场的扩大一起出现的，是工人的过剩，失业大军的增加，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缩减。

在第 251—252 页上，又谈到：

“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末——〕，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危机并不是由可以处理的资本和可以处理的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失调所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不平衡所造成的。他甚至说，这个交换是积累的自然基础。几行之后他又说：“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在这里，他说得十分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取决于为资本主义商品寻找“国外市场”的可能性。

关于鲍威尔从第三卷中使用引语的问题，谈这么些就足够了。但是，鲍威尔继续引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 477 页上的话：“把积累当作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人口增加好象就是积累的基础。”这能否是鲍威尔理论总的概括？又搞错了，他只是从糕饼里挑出了一粒葡萄干。全段的意思是相当不同的。在这里，马克思考察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投资的条件。他

解释说，新增加的那部分资本必须转化为较大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和较小的一部分可变资本。

“首先，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和生活资料形式上的相应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必须要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被用来购买新的劳动。这件事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劳动者的人数已经增加，或劳动者从事工作的劳动时间已经延长。”^①当只是部分时间受雇的工人变成全天受雇的时候，或者当工作日的正常时间被延长的时候，后者才发生。而且，也许还需要有尚未参加生产性劳动的无产阶级的额外阶层：妇女、儿童、贫民。

“最后（马克思说），随着人口一般增加，劳动人口也能绝对增加。积累要成为一个经常的连续的过程，人口的这种绝对增加（虽然和所用资本相比来说可以是减少）就是条件。”^②

而鲍威尔引伸出来的一小句却是这样：“不断增加的人口好象是作为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的积累的基础。”

这是马克思在鲍威尔所引用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章里的同一页上说的话，鲍威尔把它作为他的“机能”说的最杰出的证据。如果这个引语里有什么需要读者必须立即掌握的话，那就是下面的那个马克思的推断：如果积累即生产扩大要发生的话，那末，也需要增加劳动。因此，没有不断增加的工人人口，生产就不可能不断扩大。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工人也能明白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好象是积累的基础”。

但是，鲍威尔的问题不在于工人人口的增加对于积累是否需要（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而在于条件是否充足。马克思说：没有一个不断增加的人口，积累就不可能发生。鲍威尔把这改读为：不断增加的工人人口足以使积累发生。这里，马克思把积累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 卷第 552 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 卷第 553 页。

作为先决条件，他假设了一个宽容的市场的可能性；他正在考察的是积累发生的各种形式，他在那里发现，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必要的。鲍威尔把工人数量的增加看作一个特定的因素，生产是由于并根据这个因素扩大的，不需要进一步考虑市场问题！这和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出的奇言妙语一样，同样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颠倒。

但是，我们也许对马克思的语录谈得太多了；鲍威尔也许能够对马克思的话作出自己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叫做曲解吧？人们仍然感到十分困惑的是，如果一个人认真地看一下这一章的话，他又怎能把马克思这一点理解错了呢？数页之后，他用下面清楚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和他所分析的真正问题：

“问题现在必须照这个样子提出：假设有普遍的积累（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也就是假设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或多或少的有积累——这在事实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种普遍积累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分解起来，这种普遍积累又是什么呢？”而他回答说，这些条件就是：“用货币的一部分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①

同时，为了消除任何疑问，他就象预先警告他的“专家”学生似地补充说：

“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说到这种情形，积累资本大于生产上能够投下的资本，以至必须在货币形式上，例如把资本存放银行不用，由此产生了对外贷款等等，一句话，也就是产生了投资的投机。我们也没有考察这种情形，即所产商品的总量不能售出，出现危机等等。这是竞争那一节应当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要研究资本在其过程不同阶段上所采取的形式，总是假定，商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9页。

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①

这样，马克思假设了市场的扩大，积累的可能性，他只是考察随此而来的事情。其中的一个结果，是雇佣新的工人，为此，工人人口的增加是必要的。鲍威尔从这一点上推断出：为了积累的发生，单是工人人口的增长就足够了，由于工人人口的增长，积累的确发生了。积累及其“机能”的客观目的和目标，就是进行调整，以适应工人人口的增长。

人类把必须呼吸空气作为生存的一个条件。按照鲍威尔的说法，结论是：人靠空气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呼吸空气，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仅仅是“自动”调整他的体内机能，来适应呼吸。这就是那些手持拐杖在愚蠢透顶的空气中游来荡去的人得到的奇妙结果！

但是，我们的玩笑到此为止，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的。他所谈论的，不再是我这个小人物和我的书，而是马克思自己教导的基本概念。我们现在可以不去谈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高深学问，很遗憾，这些学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读者几乎是陌生的，只有几个例外。让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一卷，它至今已经构成社会民主的实际经济基础。在这里，熟悉马克思的巨著第一卷的每一个读者，自己都能很容易检验鲍威尔的理论：他只需打开第25章第637页阅读：

“对于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的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它表面看起来要使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而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劳力的供求，”^②就是说，根据它的需要。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经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6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②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这里的译文是参照《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9页的译文译出的。——译者）

济学的老“教条”：这个所谓的工资基金。它把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特定数量，使受雇的工人依赖于自己的自然增长。马克思同这个“教条”进行了详尽的论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偶然地对他的“专家”学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训斥。

马克思在第 640 页上教训他说：

“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①

按照鲍威尔的“机能”说，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是积累受阻过于缓慢的结果。他断言：“积累不足的第一个结果，是产业后备军的形成。”^② 资本积累越小，后备军就越大。这是鲍威尔说的话。在上述引语之后的第四页上，马克思教训他说：

“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③

在同一页上，马克思讽刺地说：“当经济学的智者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④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702 页。）

② 《新时代》1913 年第 24 期第 869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707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④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哪一个更“愚蠢”呢：是那个向工人宣传调整他们的繁衍来适应资本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呢，还是这个告诉工人资本总是调整自己来适应他们的数量的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呢？我认为后者更坏。那个老“蠢货”只是无知地主观地反映现实关系，而这个新蠢货却颠倒了现实。

在谈论劳动人口及其增长的一章里，马克思通篇谈的是资本的“需要”。对于劳动的需求、工资水平、繁荣或者危机，全都取决于这些。马克思一直提及而鲍威尔在他的整个“机能”说里一次也没有提及的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呢？

马克思在同一章里不断地谈到关于资本“突然扩大”的问题，他把资本突然扩大看作资本积累运动和工人人口运动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突然和无限的扩大能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一大特征。对于这些马克思十分重视而鲍威尔甚至不屑一提的资本“突然扩大”，我们要了解些什么呢？

马克思在同一章的开头部分（第613页）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清楚的答案：

“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积累的规模能突然扩大……”^①

在第632页上，他又更加详细地说：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73页）。

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①

马克思在这里不但解释了资本的这些突然扩大是如何发生的——就是说，是由于市场突然扩大的结果——而且还阐明了产业后备军的特殊职能：为了资本的那些异常突然的扩大随时“待用”。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产业后备军的这个最重要的实际职能，为此，他把它称作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生存条件。工业人口过剩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② 马克思在第450页上最清楚最简明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③

鲍威尔是怎样谈论这一切的呢？在他的“机能”说里，没有资本突然扩展的余地，因而没有它伸缩的余地。这有两点理由：第一，因为生产完全依赖于工人人口及其增长，所以市场是无关重要的。通过自然繁衍而增长的人口，当然体现不出突然扩展。工人人口周期性地引起产业后备军的迅速增长，但对于鲍威尔来说，那是在“积累不足”和增长最缓慢并且可处理资本较之工人阶级短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92—694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③ 同上，第494页。

缺的时候才发生的。

第二，突然扩展不但意味着市场突然扩大，而且意味着已经积累起来的可处理资本储备突然增大，那个储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是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鲍威尔排除了那种可能性：在他的“机能”说里，从“积累不足”的阶段复苏过来，这只有在失业压力通过压低工资来允许新的积累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由于资本的突然扩展象危机的爆发那样，从鲍威尔的观点来看仍然无法解释，所以，产业后备军在其中是没有实际职能的。它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而出现，但不起任何作用，除了马克思在他的第二个计划中提到的那个作用：通过向受雇者施加重压去压低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个“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杠杆”，鲍威尔对此没有注意。在一次工业循环中三次被吸收这个滑稽过程，证明鲍威尔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后备军：先是在“积累不足”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后是处于“积累过剩”顶峰的时候，再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这些奇迹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对于鲍威尔来说，工人人口的运动不是因为资本及其需要所引起的（对于马克思和现实来说），而是相反。资本的整个运动围绕着工人人口而旋转。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资本的行动象那只野兔和那只野猪：它总是在工人人口的后面气喘吁吁，有时在中间超过它，有时落在它的后头，最后总是听到：嘿，我比你先到一步！

对于马克思来说，关于工人人口彻底调整来适应资本及其市场前景的理论，是第一卷的整个最后一部分的基本思想。从609—648页的四十页里，他仔细地解释了这个重要的经济发现。他最后强调说，“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总规律。”然后，他接着加以“说明”，另外填满了六十五页。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和主要国

家的英国的例子中，他说明些什么呢？——在英国人口每年的增长从1811至1861年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它的财富即资本主义积累却飞速地扩大！马克思用无数各种各样的统计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鲍威尔也许会插话：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这个大量增长，当然不能单独拿英国人口来计算，绝不能单独与它相比较，来作为经济基础。请注意英国向北美联邦、中美和南美的销售；请注意1825至1867年之间英国工业的周期性危机，它们都是在那些国家的市场扩大之后出现的！说得太好了！但是，如果鲍威尔懂得这一点，那末，他就懂得了一切，那末他也懂得，这个关于调整积累来适应人口增长的理论是胡说八道，那末他也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想要论证的东西，即工人人口进行调整来适应资本积累及其不断变化的需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最高潮之处。马克思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論的精神实质、劳资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这个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人口规律”全都汇集在一起了。

鲍威尔过来了，他把这整个大厦弄了个底朝天，并向世界宣布说，资本的全部运动都是调整资本以适应工人人口增长的趋势所引起的！从内容上看，鲍威尔的理论是个肥皂泡。

通过用马克思的观点假设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永久化（它的职能是要满足资本的需求，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如此）这一说法来纠正他，那末，他的特殊“积累过剩”就完蛋了。

通过用马克思的观点假设可变资本因为技术进步较之工人数量不断相对下降这一说法来纠正他，那末，他的“平衡”就完蛋了。

他的理论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但是，在这个自命不凡的立论后面有一个基本思想：这个所谓资本调整其运动来适应工人人

口的趋势。这把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抛到九霄云外。想想看，这一整套学究式地炮制出来的令人发指的胡言乱语，居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官方机关报上刊登出来！他们急切地为一个伟大事业而奋斗——要烧死一个傲慢无礼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攻击的是一个更大的人物！全面控制和公开批评，监视着自然科学家们。有谁声称要对地球周围的所有星球的运动作出准确的计算，以便解释现代天文体系，他将不会受到重视。这种思想甚至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因为没有哪个科学杂志的编辑会为这种无稽之谈开放绿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的统治下，这种事情容易发生。为了寻求科学知识，从那个讲坛上宣布鲍威尔的积累理论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样的事有可能出现。完全撇开它对我的书的态度不说，它是目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耻辱，社会民主党的一件丑闻。

鲍威尔的“实际”结论

这是鲍威尔自己解释资本积累的极限。它的实际结论是什么呢？鲍威尔表述如下：

我们的考察结果是，(1) 资本积累甚至在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不超越某个规定的限度（即工人人口的增长——罗莎·卢森堡）；(2) 资本主义生产的机能本身自动地把它拉回到这个限度之内。^①

鲍威尔紧接着在一章的结尾部分概括了他的理论的实际应用上的精华，是这样写的：

卢森堡同志用下面的方式来解释帝国主义：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有在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扩大它的市场，以便能够在尚未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地区出售包含积累起来的这部分剩余价值在内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大家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甚至在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②

这样，鲍威尔通过以新近发现的“人口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转义的办法，象其他“专家”那样坚持自己的论证，即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甚至在凡人看不见的条件下也能兴旺发达。而且他认为，他能够把这用作对待帝国主义问题的基础！

让我们讲清楚一件事情：在看来似乎是保卫马克思在《资本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论》第二卷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实际上是反对我的过程中，鲍威尔又一次把一个发现归结为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发现同马克思的假设直接背道而驰。

马克思谈的肯定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关于同时并列地存在着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我也从未提到过这样的社会。这种乏味的描绘就象金星从浪涛中出现那样第一次出现在奥·鲍威尔的理论想象之中。让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是如何阐述他的前提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清楚地表述了他的假设意图，是“为了整个地检验我们的考察对象，避免一切次要情况的干扰”，就是假设“全世界（是）一个国家”，它构成一个经济总体，并假设“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建立起来，占据着每一个工业部门。”^①同时，他在第二卷里同样清楚地说明他对积累的考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为根据的。^②

那是十分清楚的。因此，马克思没有假设一种幼稚的幻想，幻想鲁滨逊的岛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与非资本主义民族的大陆“隔绝”的情况下悄悄地兴旺发达起来，幻想一个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能的最高水平（因为人口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这个社会对于手工业者和农民都一无所知，与周围的非资本主义世界毫无关系。马克思的前提并不是怪诞的谬论，它是一个科学构想。事实上，马克思预先想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趋势。他假设资本主义的完全和普遍统治的状态已经达到，假设资本和当前每一个经济和政治发展事实上正在奔向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最高发展。这样，马克思把他的考察放在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轨道上，他认为这个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已经达到。科学地说，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3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386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罗莎·卢森堡）。

这个方法是十分正确的，而又象我在书中所说明的那样，它对于考察单个资本的积累是完全足够的，即使我认为，当它被运用于下面这个主要问题时，它是不正确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社会总资本的积累。

另一方面，鲍威尔描绘出一个没有中间阶层、没有手工业者和没有农民的“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古怪画面，这种经济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它与现实和发展趋势毫无关系；因此，这是一个捏造，它的天真的“机能”无助于澄清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象沃康松^①著名的机械模型无助于解释人体的生理和心灵现象一样。直至现在，只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求助于“孤立经济”这个天真说法，使用这个木偶来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谁也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无情地嘲讽这些资产阶级的“鲁滨逊式的人物”。更有甚者，鲍威尔的鲁滨逊式的越轨行动是为了解释马克思并把他放在一个“客观的基础”上。

但是，鲍威尔满有理由作出他的“解释”。因为，如果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假设“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已经普遍达到，他就把帝国主义排除在外，就不能为它找到解释，因为它在历史上已被这一个假设所超过、扼杀和埋葬。在这个假设下，一个人很难描述帝国主义阶段的进程，如象一个人很难在欧洲封建主义的普遍统治已经存在这个假设下描述罗马帝国的崩溃。“专家”信徒们面临着一个把今天的帝国主义同《资本论》第二卷的一个片断里所简略地说明的积累理论统一起来的任务，他们早就应该在下述二者当中作出抉择：要么否定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要么象我在书中所做的那样，抛弃马克思的错误前提并考察

^① 雅克·沃康松(1709—1782)，法国发明家，发明了第一部机器织布机，也发明了一个演奏笛子的机器“人”和一只会游会叫会拍翅膀会吃食物的机器鸭，以及其他许多机器玩意儿。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累进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同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不断相互作用。很明显，象埃克什坦这样的人，对手中的问题一无所知，就不会面临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困难。但是，奥·鲍威尔终于看见陷阱，发现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典型代表的解决办法不能自圆其说：资本主义的确能够在鲁滨逊的岛上兴旺发达，不过它的孤立的繁荣仍然有个“限度”，它只有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环境进行贸易才能打破这个限度。他最后宣布说，“在那个荒谬的解释后面存在一点道理（这是我的话。——罗莎·卢森堡）。”“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是处于某些限度之内。事实上，帝国主义就是为了扩大这些限度。——事实上，这个推动力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唯一的根源。”^①

因此，鲍威尔自己也并不认为他的关于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鲁滨逊式的见解足以作为一个科学前提，即作为考察的一个严肃的统一的基础；相反，他在立论过程中，用一只眼睛盯着前面的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他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一个能够自我生存和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巧妙“机能”的讨厌的学术报告，同时他又一直把非资本主义环境装在口袋里，以便当他不得不对鲁滨逊的岛上的帝国主义作出解释而陷于困境时，他能够最终使用它来把自己解救出来！

仔细阅读过《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那里专门揭露萨伊、约·斯·穆勒、凯里等等的理论欺骗——里的注脚和不时出现的批评的人，大概能够想象到马克思会对那种科学方法作出什么样的痛斥。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874页。

帝国主义

无论怎样，我们终于谈到帝国主义了。鲍威尔的论文结尾一章的标题是“帝国主义之解释”。看完这章之后，读者满可以希望最后找到一个东西。既然鲍威尔已经解释说，我揭示的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唯一的根源”，人们就只能期望，从他的理论的观点来看，他自己会揭示其他的根源。很遗憾，情况并不是这样。鲍威尔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其他的根源给予点滴的说明，他自己保守了秘密。尽管结尾一章的标题和介绍都很醒目，但我们仍然只是停留在帝国主义的一个可怜的“根源”上，这个根源在我的错误的解释里形成了“一点道理”。

但是，鲍威尔这样做，已是对我作出慷慨的让步，承认这“一个根源”“有道理”。因为这里又是一个要么这要么那的问题，而且，鲍威尔试图作出的让步，象大多数让步一样，基本上是暂时的和轻描淡写的。

因为，如果他的“人口增长”的积累理论是正确的话，这个“根源”将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那样帝国主义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鲍威尔的“机能”是由什么构成的。它存在于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地调整自己来适应工人阶级的增长。那么，怎能谈得上积累的“限度”呢？资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度”。因为，如果生产的增长快于工人阶级的增长——在鲍威尔的“积累过剩”阶段里——那么，它可以通过在下一个“积累不足”的阶段里落后于可以获得的工人人口来对此给予补偿。这样，一般来说，在鲍威尔的“机能”里就没有能够超越他的

“限度”的剩余资本了。然而，大家看到，这个理论出于同样的理由排除储备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突然扩大的能力。剩余资本只是作为一个短暂阶段而出现，它必定周期性地为一个相反的极端即资本短缺所代替；在鲍威尔的“机能”说里，随着新月和全月的学究式的经常变化，这两个阶段相互更替。不存在对于资本积累的其他“限度”，只存在一个超越这些限度的趋势；鲍威尔自己十分清楚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机能”^①，积累总是主动地回到这个限度之内。因此，在资本的扩大能力和一个所谓的限度之内不存在任何矛盾。鲍威尔之所以费心地把这些概念塞进他的“机能”说里，只是为了能够在它和帝国主义之间架设某种人造桥梁。他不得不从他的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帝国主义作出解释，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立论是迫于无奈的。

按照鲍威尔的观点，既然工人阶级是资本环绕旋转的轴心，扩大对于积累的限度就意味着工人人口的增加！这是写在《新时代》上的白纸黑字。^②

“积累先是受到工人人口增长的限制。帝国主义增加了工人的数量，他们被迫向资本出卖劳动力。它完成这一点，是通过摧毁殖民地里旧的生产方式并从而迫使千百万人或者移居到资本主义地区或者在本国——资本已在那里投资——为欧洲或者美国的资本服务。既然积累的数量在资本的特定有机组成下取决于可供使用的工人人口的增长，帝国主义事实上是为了扩大积累限度的一种手段。”

那么，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主要职能和主要关心的事情；或者通过从殖民地移民或者就在他们本国内去“大大”增加工人的数量。尽管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在帝国主义资本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②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3页。

的本国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不断存在一支完整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而在殖民地里资本却总是埋怨劳力短缺！这样，帝国主义资本在追逐新的雇佣无产者的过程中逃出了那些国家，在那里，技术的迅速进步、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的猛烈进程和无产者家庭的摧毁，正在不断地充实劳力后备队伍。资本喜欢流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那里，传统的财产形式，牢固的社会关系，十分顽强地束缚着劳动力，以致需要资本统治几十年的粉碎性的冲击才能产生出作为这个统治的最终结果的半顶用的 (Semiusable) 无产阶级来！

鲍威尔想象出一个从殖民地流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古老中心的工人“洪”流，而任何有眼者都能够看到，恰恰相反，工人随着资本从古老中心输往殖民地而迁往殖民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实际上只是在资本输出之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请看看欧洲人十九世纪定居北美、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洪”流吧。请看看欧洲和北美资本为了在非洲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南美和南海诸岛里获得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而使用的“温和”奴隶制和强制劳动的不同方式吧。

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英国资本同中国打了半个世纪的长期血腥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个中国苦力的“洪”流，来弥补英国工人的奇缺。引起本世纪初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远征，必然是同样的迫切需要。很明显，法国资本在摩洛哥追逐柏柏尔人，主要是为了补偿法国无产者的不足。很自然，奥地利帝国主义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猎取新的劳力。德国资本目前正在高举火炬，洗刷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为了搜罗土耳其的产业工人，更是由于战前德国的各个部门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劳力短缺！很清楚，被“称作富于想象的人”的奥·鲍威尔又一次忘记了我们平凡的地球。他无情地把现代帝国主义解释为寻找

新劳动的资本主义。据说，这是问题的核心，推动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原理。他提到需要海外原料，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它与他的积累理论没有经济关系，它是来自晴天的一个霹雳。如果在这个特定的“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能象鲍威尔所表明的那样兴旺发达，那末，它在这个奇迹般的岛上必然握有一切必要的自然财富和从天而降的礼物——这与资本主义的可怜的严酷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它从一开始就一直把它的生存依赖于世界的生产资料。最后，鲍威尔十分偶然地在两句话中提到获取新市场的问题，把它放在第三位，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动机，并把它看作是缓和危机的另一手段。当然，这又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妙事”：在我们的地球上谁都知道，这个市场的任何大规模的扩大之后，紧接着是危机的极大激化。

这是奥·鲍威尔最后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能的。”^①这是他的关于“单独”积累的理论的绝妙之处，它使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信念，即不管它是以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不管它是“通过扩张或是不通过扩张，资本主义将要为自己造成垮台……”

那就是“专家”实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样，资本主义甚至不用通过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要突然扩张的强烈要求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形成了现代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实际上，扩张已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及其现在的最终的帝国主义阶段，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放荡不羁的特性，以致整个人类文明都置于它的威胁之下。实际上，这个资本主义要扩张的不可驾驭的冲劲已经逐步建造了一个世界市场，把现代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从而为社会主义

① 《新时代》1913年第24期第874页。

奠定了历史基础。实际上，旨在结束资本主义的无产者的第一国际本身，只不过是资本全球扩张的一个产物。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个不同的历史进程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对于一个权威的思想家来说，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想象的”呢？“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认为，现代发展甚至在没有发现美洲和环绕非洲航行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一个人思考这个问题时间长了，他甚至能够想象到人类历史里没有资本主义。最后，太阳系在没有我们的地球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想象的。德国哲学也许在没有“笨拙的形而上学”的情况下是可以想象的。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有一件事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就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里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先驱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能够取得某些成果，而不致于造成我们今天在世界大战中不得不正视的社会民主党的惨败。

当然，在实际斗争中的战略战术，不是直接依赖于一个人是否认为《资本论》第二卷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或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个人是否相信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积累的可能性，一个人是否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来解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成千上万的无产者虽不懂得这些理论问题，但他们是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样的英勇战士——因为他们对于阶级斗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了解，有一个不易败坏的阶级本性以及运动的革命传统。但是，长期以来，在理解和处理理论问题同政党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里，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理论生活的中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里都表现出完全的和谐一致；在这两个领域里，出现了同样的犹豫不决和思想僵化，而且，作为大众生活的绝对统治的表现形式的同一个帝国主义，击败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治

总参谋部。官方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座雄伟的坚如磐石的大厦，在它的第一次历史尝试中暴露出它是一个波将金村庄^①。同样，那个使运动的每一次实践都神圣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引人注目的“高深学识”和一贯正确，证明是一个富丽堂皇的门面，在不容人说的傲慢的教条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和行动上的无能。沿着所谓“久经考验的战术”即议会主义的老路开展的可悲的日常活动，是符合那些死抱住导师的公式不放而又抛弃他的学说的活的精神的信徒理论家们的情况的。我们已经顺便注意到了“专家”的“最高法院”里的这种毫无头脑的某些证据。

但是，我们的情况与实践的关系，比第一眼所看见的甚至更为明显。从根本上说，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马克思对于积累的分析，是在帝国主义尚未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作出的。资本对于世界的最后的绝对统治——马克思把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他的分析的基础——需要预先排除帝国主义的进程。但是——在这里，马克思的误失和他的信徒的大错之间，是有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小小的误失也会导致某种恶果。《资本论》第二卷里提出的但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要表明积累在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之下如何发生——是无法解决的。在这些条件下，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十分明显的僵化的理论矛盾，只好用历史辩证法来解释，这种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和思想方法的精神一致，而且马克思的模式里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野心及其好运和垮台的活生生的写照。

积累在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环境里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发

^① 波将金村庄。格·亚·波将金（1724—1791）是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最杰出的人物，据说是叶卡捷琳娜的情人，他被女王授权在南部组织“新俄罗斯”。他把旧港口变成新式港口，建立了新的村庄，并建成了“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意为叶卡捷琳娜的光荣）。批评他的人说，他的村庄的前面都是用硬纸板建的，以便欺骗前来参观的女王。

现，资本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进行扩张，毁坏手工业者和农民，使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这是殖民主义政治，“开发”政治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发展只有通过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才成为可能。但是，全球扩张的态势导致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引起暴力行动、战争、革命；简言之，自始至终的大灾大难——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因素。

资本积累是在牺牲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和扩大的，它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它们挤掉。这个进程的总趋势和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的绝对统治。一旦达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模式就变得有效了：积累，即资本的进一步扩大，就变得不可能了。资本主义进入一条死胡同，它再也不能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工具行使职能了，它到达了它的客观的经济限度。马克思的积累模式里的矛盾，辩证地看，只是无限的扩张态势与资本通过不断毁坏其他所有生产形式而制造的限度之间的活生生的矛盾；这是积累进程期间资本在全世界换来的巨大生产力与资本被积累规律所限制的狭小基础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积累模式——当被正确理解的时候——它的不可解决正是准确地预示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可避免的垮台，其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进程，而扩张的特殊任务是要实现马克思的假设：资本的普遍的集中的统治。

这真地能够发生吗？当然，那是理论虚构，这恰恰因为资本积累不仅是一个经济进程，而且是一个政治进程。

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

期。①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和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②

这里，正如历史上其他地方一样，理论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它向我们显示发展的趋势，显示发展在客观地走向符合逻辑的结论的话。作出这个结论的机会甚微，就象以前任何其他社会发展时期要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甚微一样。作出结论的需要变得更少了，因为这次体现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身上的社会觉悟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更多地卷入各种力量的盲目竞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会给这种觉悟提供最富有成效的建议和最强有力的刺激。

现代帝国主义并不象鲍威尔的模式里所说的，是资本扩张的序幕；恰恰相反，它只是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篇章；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攫取地球上最后剩下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的世界性竞争普遍激化的时期。这个最后阶段里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就象资本在“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其内在的正常的生存方式所经受的灾难一样深重。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发现，不仅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成就，而且也伴随着一系列对这个新世界里的原始人民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同非洲和亚洲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奴隶买卖。同样，资本在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里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59 页。

② 同上，第 376 页。

的经济扩张，是与我们现在经历着的一系列殖民征服和世界战争分不开的。作为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帝国主义的特点，不仅仅是这个扩张的非凡能量和普遍性，而且——这是发展的循环开始结束的具体迹象——这场为扩张而进行的决定性的斗争，从那些正在被争夺的地区又回到本国里来。这样，作为一个生存方式的帝国主义把灾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围地区带回到它的出发点。四个世纪以来，这个资本扩张已经把亚洲、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非资本主义民族的生存和文明带向不断的动乱和全面的彻底的衰落，而今正在把欧洲自己的文明民族投向一系列的灾难之中，其最后结果只能是文明的衰败或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点上看，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导致同资本统治的全面对抗。它的特定的行动规律是由那个历史抉择规定的。

按照官方马克思主义“专家”的观点，这些规律是完全不同的。相信“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积累的可能性，相信资本主义甚至不用扩张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战术趋势的理论公式。这种思想的符合逻辑的结论，不是把帝国主义阶段看作一种历史的必然，不是看作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发生的决定性冲突，而是看作从中渔利的一小撮人的存心不良的捏造。这使资产阶级确信，甚至从他们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是有害的，从而孤立这所谓一小部分帝国主义的受益者并组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集团，以便“节制”帝国主义，通过“部分裁军”把它饿死，并“抽回它的魔爪”！就象自由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得到学识渊博的君主政体和没有头脑的君主政体的赏识一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既受到它将要开导的资产阶级的欢迎又受到那个头脑简单的阶级的欢迎，既对国际裁军条约有利又对帝国主义的灾难进程有利，既有利于民主国家的和

平联合又有利于大国为武装统治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为解决它们的世界历史矛盾而进行的最后对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实行的历史性妥协的乌托邦。^①

奥托·鲍威尔用下述言语来结束他对我的书的批评：

“资本主义将不会从实现剩余价值的机械的不可能性上崩溃。它将被它驱使的群众暴动所击败。并不是只有当最后的一个农民和最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变为雇佣工人，从而不再提供一个剩余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瓦解：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教育、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愈来愈甚的反抗，将会早得多地把它砍倒。”

为了特地对我进行开导，抽象大师鲍威尔不得不从我对积累的见解的全部含义和意向以及从我的清楚的说明原文中进行抽象。但是，他的豪言壮语充其量又只不过是“行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抽象，即“纯真思想”的无害的但转瞬即逝的闪烁。这伙理论家对待这场世界战争爆发的立场就是明证。日益壮大，受到教育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在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抉择问题上一反常态，采取“弃权”的政策并且保持“沉默”，直至和平的钟声

^① 埃克什坦曾经在1913年1月《前进报》的评论里为了这个“灾难理论”而谴责我，他使用的语言完全是从科尔布——海涅——大卫那里借来的（“卢森堡同志根据非资本主义消费者必不可少的理论尤其是那个灾难理论作出的实际结论，同那个理论假设一起失败了”）——而今又在谴责我，因为这伙草包理论家已经向“左”转，犯了一个支持和怂恿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相反罪过。他气急败坏地指出，连施，就是在世界大战中倾向于科尔布——海涅——大卫的同一个连施，对我的书表示赞同，并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它作了好的评论。其中的联系不是很明显了吗？疑心啊，极度的疑心啊：“就是为了那个缘故”，埃克什坦觉得非要亲自在《前进报》上完全彻底地摧毁我的书不可。然而，就是那个同样的连施，甚至更加赞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战争之前。对了，一个被称作马克斯·格伦沃尔德的人，多年来在柏林工人教育学校一直热情地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不是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直接引导一个人为英国的毁灭而欢呼并为兴登堡的寿辰而撰写文章吗？但是，那个大错发生在埃克什坦身上，毁坏了他的意图。大家知道，俾斯麦已经常常埋怨他的新闻业的爬虫们的盲目热心。

敲响为止。当树梢静悄悄的时候，^①在一片宁静的和平时期被详尽地描绘得天花乱坠的“夺取政权的征途”改变了方向，在现实的第一个波涛中，径直通向“软弱无能的道路”。十年来把持工人运动的官方理论领导权的信徒们在世界危机的第一次爆发中便使自己破了产，并把领导权交给了帝国主义。清楚地了解这些关系，这是重建将能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无产阶级政策极其重要的条件之一。

那些自感悲伤的人对这个事实又将发出哀叹，即“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正在进行争论”，久经考验的“权威们”正在引起人们的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相互吹捧、垄断获取“专门知识”的权利的十几个人，广大虔诚的穆斯林必须盲目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的世界观，它必须努力挖掘新的发现，它完全鄙视曾经一度正确的论点的僵化，它的活力在自我批评的论争和历史的波涛中得到最好的保存。因此，我同意莱辛的说法，他对年轻的雷马拉斯写道：

“但是，一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呢！让每一个人说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并把真理本身留给上帝吧。”

^① 《树梢静悄悄》(“IN ALLEN WIPPELM RUH”),引自歌德。——原译者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尼古拉·布哈林著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and activities. It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2.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绪 言

帝国主义问题既是实际问题，又是理论问题。所以，很自然，无产阶级政治家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所遇到的。对近代资本主义动力的认识，它本身特有的扩张方法，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构成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性批评的不可避免的前提——在无产阶级手中，它就由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同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紧密相连的。同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也是如此，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而且不得不用代数来表达。它将表明，同这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相联系的所有问题，对于今天和将来的无产阶级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利害关系。

第一章 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扩大再生产

众所周知，为了使问题简单化，马克思从一系列前提出发，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例如，他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两个阶级，没有海外市场，价值同价格相等，等等。在日益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是怎么可能的？——马克思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大体上说，最抽象的（最理论性的）答案如下：

社会总资本是 $C + V$ ，剩余价值是 S 。

那么总产品的价值是 $C + V + S$ （假定在一次周转过程中，不变资本全部用完，或者 C 只代表不变资本中用掉的部分——这同上面一个假定是一样的）。

这个产品被分成两大部分（而且社会生产总过程也相应地被分成两大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符号，我们就得出：

I、（生产资料的生产）…… $C_1 + V_1 + S_1$ 。

II、（消费资料的生产）…… $C_2 + V_2 + S_2$ 。

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简单再生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即 $S_1 + S_2$ 都花光的话，正常的再生产过程的条件就要出现下述情况：

1. 由于第一部类的全部产品只包括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这是不能用作个人消费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更不能送给‘美女’），所以这些都必须用来代替不变资本 $C = (C_1 + C_2)$ 。

因此， $C_1 + V_1 + S_1 = C_1 + C_2$

2. 由于第二部类的全部产品只包括消费资料，这是一点也不能被用作原料或机器的。所以，它必须完全被两个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消费”掉。所以， $C_2 + V_2 + S_2 = V_1 + V_2 + S_1 + S_2$ 。

3. 由于第一部类再生产了它自己的不变资本(C_1)，而且必须用“可以消费”的形式来代替物质形式($V_1 + S_1$)；另一方面，第二部类以自然的形式再生产了它的可变资本的要素以及第二部类本身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而且必须替换物质形式 C_2 ，所以，要进行交换的各个部分相等，这对于确保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说 C_2 必须等于 $V_1 + S_1$ 。

显而易见，我们这三个方程式基本上可以被简化为单独一个方程式。如果我们从第一个方程式的两边都减去 C_1 ，从第二个方程式的两边减去 $V_2 + S_2$ ，我们就可得出上述的第三个方程式，即 $C_2 = V_1 + S_1$ 。

那么，恰恰在这里表示出了顺利地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第一部类的收入数额必须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相等。如果这个条件适合的话，我们在第一部类得到：实际上生产出来的留在本部类的一份不变资本，以及用不适当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一份可变资本，它新的外衣下出现并且可以同不变资本有利地结合在一起而发挥作用；最后是一份剩余价值，它在为本部类的有生命的职员和指挥人员的再生产而改头换面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为第二部类得到：用适当的形式生产出来的一份剩余价值，它在没有超出本部类范围的情况下，满足了它的所有者，并且被花光用光；此外，一份可变资本，它采取了一种方式，也能使自己转化为劳动力而不必超越本部类的范围；最后是一份不变资本，它的物质的柔软的消费外皮转化为坚硬的机器盔甲之后，同可变资本相结合。从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也能够再一次地完成同样

的周而复始的循环。

扩大再生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且开始发挥资本的作用，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是“螺旋形地而不是循环式地”继续进行（马克思）。

假定我们用 α_1 表示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而 β_1 表示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因而，假定我们认为 $S_1 = \alpha_1 + \beta_1$ ，而与此相应的 $S_2 = \alpha_2 + \beta_2$ ；假定我们进一步用 β_{1c} 表示要被积累起来作为一部分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而 β_{1v} 表示要被积累起来作为一部分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从而断定 $\beta_1 = \beta_{1c} + \beta_{1v}$ ，同样， $\beta_2 = \beta_{2c} + \beta_{2v}$ 。因而两个部类的产品的总公式是：

$$\frac{\text{I } [C_1 + V_1 + \alpha_1]}{\text{II } [C_2 + V_2 + \alpha_2]} + \frac{\overbrace{\beta_{1c} + \beta_{1v}}^{\beta_1}}{\underbrace{\beta_{2c} + \beta_{2v}}_{\beta_2}}$$

显然，简单再生产的问题已包括在那些数量里，我们把这些数量放在一个共同的框框内，而答案已在上面提供了。（说了这些之后，就有必要提出 $C_2 = (V_1 + \alpha_1)$ 。）由于上面长方形外面的新数量的出现才有了困难。

那么，这些代表什么呢？

根据 β_1 的价值， β_1 代表要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它的物质形式，即它的使用价值， β_1 代表大量的花色最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机器、原料、物力等等。

但是，这一部分通常不是以一种形式即只以不变资本或只以可变资本的形式依附于资本，而是根据一定的比例，按照资本的有机组成分成两部分。

β_{1c} ，即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是按相应的物质形式生产的，从而留存在第一部类内部，再也不脱离第一部类。另一方面，

β_{1v} 则不能倒过来作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外衣所掩盖着的，其结果是，它必须同第二部类的相应的产品进行交换。因而， β_{1v} 只能脱离其出生地。

β_{2v} 的生产是以某种形式进行的，这种形式可以使它成为第二部类的追加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从而，它在实际上留在家中，即留在同一部类里。另一方面， β_{2c} 具有物质形式，它从技术上使这一部分剩余价值不可能起追加的不变资本的作用。这样， β_{2c} 必须穿上 β_{1v} 的外衣来进行交换。所以，就价值而言， β_{2c} 必须等于 β_{1v} 。

因而，只要我们扩大再生产，就必须用一种关系把要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吸收到第一和第二部类中去，撇开从简单再生产的观点来看所需要的平衡条件不管，这种关系是：第一部类的追加的可变资本必须同第二部类的追加的不变资本相等。

总之，我们可以给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得出三个模式，这三个模式可以简化成一个模式。而且，这三个模式同简单再生产的三个模式相似。

1. 第一部类的总产品（生产资料）绝不能被直接当作收益。所以它必须同两个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总数相等（包括追加的不变资本）。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下面把一个数量放在另一个数量之下：

生产资料的总数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的总产品)} = C_1 + \boxed{V_1 + \alpha_1} + \beta_{1c} + \boxed{\beta_{1v}} \\ \text{所有不变资本的总数} = C_1 + \boxed{C_2} + \beta_{1c} + \boxed{\beta_{2c}} \quad \text{①} \end{array}$$

① 斯威齐批评布哈林用这种方法来列成公式。他说，应该列出被资本家阶级消费掉的剩余价值的增加部分。但是，布哈林特别指出，在下一个周期里，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将第一次得到增长。所以，布哈林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整个问题将在附录二中讨论。

马上就可看出，这一模式是以方框内的量的相等为前提的；左边的方框内表示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右边的方框内表示扩大再生产的追加条件。两者可以归结成这个方程式：

$$V_1 + \alpha_1 + \beta_{1v} = C_2 + \beta_{2c}$$

2. 第二部类的总产品绝不能直接地即以其自然形式被用作不变资本。因此，它必须同全部收入的总额相等（包括追加的可变资本，它转化成追加工人的收入）。①

$$\begin{array}{l} \text{全部消费资料额} \\ \text{(第二部类的总产品)} = \end{array} \boxed{C_2} + V_2 + \alpha_2 + \boxed{\beta_{2c}} + \beta_{2v}$$

$$\begin{array}{l} \text{总收入额(所有工资和} \\ \text{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 = \end{array} \boxed{V_1 + \alpha_1} + V_2 + \alpha_2 + \boxed{\beta_{1v}} + \beta_{2v}$$

人们可以立刻看出这个模式可以追溯到上面已被演算出来的模式： $C_2 + \beta_{2c} = V_1 + \alpha_1 + \beta_{1v}$

3. 也可以直接得出这个方程式。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模式：

$$\begin{array}{l} \text{I} \quad \boxed{C_1 + V_1 + \alpha_1} + \beta_{1c} + \boxed{\beta_{1v}} \\ \text{II} \quad \boxed{C_2} + V_2 + \alpha_2 + \boxed{\beta_{2c}} + \beta_{2v} \end{array}$$

上排里的 $(C_1 + \beta_{1c})$ ，由于它的物质形式——它同必要的经济职能相一致——可以维持原状；另一方面，必须交换 $((V_1 + \alpha_1) + \beta_{1v})$ 。同什么来交换呢？同由于它的内在的物质形式而在第二部类中不能执行职能的那部分来交换。这是 $(C_2 + \beta_{2c})$ 。结果产生了下列方程式：

$$(C_2 + \beta_{2c}) = (V_1 + \alpha_1 + \beta_{1v})$$

或者更好地写成：

$$(V_1 + \beta_{1v} + \alpha_1) = (C_2 + \beta_{2c})$$

换句话说：第一部类的全部新的可变资本以及同一部类中用

① 或者转化成原有工人的追加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时，提高工人本身和劳动的质量标准，来维持更大量的简单劳动。

于非生产性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必须和第二部类中新的不变资本相等。

这样，第一部类的情况就具有下列形式：

新的追加量 β_{1c} 直接加入了不变资本 C_1 ，即没有越出第一部类的范围。结果，不变资本增殖了。它原来是 C_1 ，而现在是 $(C_1 + \beta_{1c})$ 。通过再生产原有的可变资本 V_1 就产生了可变资本；它在剥去了物质外壳后才能起作用；它同“可以消费”的剩余价值一起发挥作用，而 $(V_1 + \alpha_1)$ 同 C_2 交换位置。

此外，通过同第二部类的交换，产生了追加的可变资本。这样可变资本从 V_1 上升到 $(V_1 + \beta_{1v})$ 。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采取相应的形式后，即遍历了第二部类中各个领域后，被排除出再生产过程；它所做的一切只是再生产第一部类中的资本家（即，使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编者）。因而，在第一部类中，随着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扩大，开始了新的流通。

同样的过程在第二部类中进行。这里不变资本确实按照它的价值再生产了它本身，但仍然必须改变它的外形。此外，追加价值 β_{2c} 同样在完成其物质形态的改变之后同它结合起来了。这样不变资本从 C_2 增长到 $(C_2 + \beta_{2c})$ ，可变资本从 V_2 增长到 $(V_2 + \beta_{2v})$ ，在那个过程中，新的可变资本的任何一部分都不需要伪装。①进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最终被排除在再生产过程之外，而不改变其外形，使其局限于第二部类中资本的官员的再生产。这样，随着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提高也从这里开始了新的流通。

在下一个循环里，开始阶段的资本又得到再生产，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得到增长——第一次②——要积累

① 基本上要伪装，但它是在第二部类交换行动的范围内发生的。

② 布哈林在此处指的是 $\Delta\beta_{1c} > \Delta\alpha_1$ 和 $\Delta\beta_{1v} > \Delta\alpha_1$ 。

的后一部分将增长得更多，等等。

换言之，下列各方面得到增长：社会的不变资本，工人的消费，资本家的消费（一切都是以价值来计算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将不对以上所列各种价值的增长关系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单独论述。这里我们必须那怕是简要地提一下下面的情况：随着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市场也在发展，生产资料的市场扩大，而且消费者的需求也增长（因为绝对地说，资本家的消费同工人的消费一样增长）。换句话说，一方面在此提出了社会总生产的各个部分的平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本身是以生产的平衡为条件的（即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各个部分和它的各个分支之间的平衡）。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起初忽略了极为重要的特殊的资本主义要素，如货币流通等。如果我们还继续停留在最抽象的分析水平上，那是绝不能允许的。李嘉图学派的错误和萨伊学派的错误，恰恰是他们把他们的论点上升为教条，认为产品同产品相交换，而货币在这一交易中起的是媒介作用，而且仅仅是‘媒介’作用，而不被看作是“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即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商品的一个本质的、必然的存在形式。”^①

这引起了一系列最严重的错误，进而否认在资本主义内存在着矛盾，最后，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种辩护旨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为危机，生产过剩和群众的痛苦等等“开脱”。“决不要忘记，在资本主义生产上，直接成为问题的事情，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增加。”^②但是，既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80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72页。

然资本的运动也显示出这一运动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作为货币资本出现，那么，当然就绝不能忽视它。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允许暂时把货币问题搁置一边，如同我们在前面的说明中所做的一样，从价值的更替和增加的观点出发，以及从资本要素的物质形式的更替和变化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再生产过程。如果这一分析证明了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在引进了货币要素之后，它就是完完全全地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一分析表明，如同在我们说明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扩大再生产可以用什么方法产生，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分析应该体现出更具体的理论抽象的水平。我们也要利用这一方法，因为罗莎·卢森堡现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另一个论点是在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积累理论中提出的，她的“评论”有时同货币要素有关，有时无关，而有时把两者惊人地“有机地混杂在一起”。

首先，让我们看看罗莎·卢森堡的最抽象的辩论方法。当我们读完下面她自己写的一段话后，我们就显得更有道理了。

“根据我们的观点，马克思分析中的缺陷，在我们看来，是错误地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一个简单的‘货币来源’问题，而实际的争端是在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物品所投入的用途，而不是用来支付这些物品的货币的来源。至于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当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应该假设资本主义社会所安排的货币或其代替物，在数量上总是刚刚相当于在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所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现实经济需要所引起的大的社会交换行为。尽管要记住的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在能被积累之前，总是要经历货币阶段，但我们还必须追溯到剩余生产物的经济需求，这与货币从那里来的疑团是毫不相干的。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另外一段中说的：

‘……一方面的货币能够唤起别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那是因

为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没有货币也已经存在；货币本身并不是现实再生产的要素。’”^①

因而，在“评论家”的同意下，我们将暂时把货币问题放在一边。

卢森堡同志在她的评论的框框之内提出了如下论点：模式纯粹是纸上谈兵。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即积累对谁有利，谁去消费那些必将积累的剩余价值，多余部分可以存放在哪里。她本人认为，这样的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她就此得出结论：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民粹派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及其一伙的“第三者”，不得不在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任务中支援“抽象的资本主义”，而对于具体的资本主义来说，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的主根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并不期望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倒要仔细地看一看卢森堡同志的批评性的分析。

此处我们将把下面《资本积累论》的段落毫不删减地抄录如下，这一段是作品中最重要段落之一，它把作者的基本的重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聚集成一个焦点（这里罗莎·卢森堡考察的目标是《资本论》第二卷的模式^②）。让我们听一听《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吧：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假定，一开始就是追加的生产资料与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形态出现（我们的公式是 $\beta_{1c} + \beta_{1v}$ 和 $\beta_{2c} + \beta_{2v}$ ——尼·布）。这两者都是用来使第一部类及第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109 页。

② 我们用代数例式替换算术例式，因为算术例式具有算术例式的逻辑，它常常使问题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决不是由于问题的本身引起的，而且只能使基本的问题模糊不清。

二部类的生产增大。从马克思模式的诸前提看，不可能发现（1——尼·布）生产中这种累进的增长是为谁而发生（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当然，（这个“当然”确实十分可笑！——尼·布）生产增大了，社会消费也会同时增大。资本家的消费增大了……，劳动者的消费也会增大，……如果其它一切都不加考虑的话（？——尼·布），资本家阶级所增大的消费，决不能看作是积累的目的。事实刚刚相反，当这种消费进行而且增大的时候，就没有积累可言；资本家个人的消费只能看作简单再生产。问题毋宁在于：如果资本家自己不消费而“禁欲”，即在积累的情况下，资本家是为着谁而生产呢？更不用说，日益增大的劳动大军的维持，并不是继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目的。工人的消费，在资本家看来，乃是积累的一个结果，如果不颠倒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那既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它的前提。无论在怎样的场合，工人常常只能消费相当于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物。此外，一文也不能多消费。倘若是这样，那么，那些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靠谁人去实现呢？模式告诉我们：是资本家本身，只有他们才能实现。那么他们怎样处置这些日益增大的剩余价值呢？模式答复我们：他们为了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使用它。从而，这些资本家们就成为一种为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糊涂虫了。他们为了要用来制造新机器，所以反复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新机器。于是，结局就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了。只有象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般的胆大妄为，象他那样对怪论的爱好，我们才能认为这种不知疲倦的凭空乱舞，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在理论上的一个忠实反映，是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推断。”^①

这一段包含着和“积累了”这么多的错误和矛盾（从辩证的角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1—262页。

度来看，也有不少错误和矛盾)，以致必须立即加以分析。

第一点：首先，从主观目的（即使它是一个阶级的主观目的）的观点出发有没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这种目的论在社会科学中起什么作用？很清楚，即使是这个问题的阐述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阐述而不是比喻性的陈词滥调。事实上，让我们看一看其中的一条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的经济规律，这也是罗莎·卢森堡同志承认的。利润率下降是为“谁”即为谁的利益服务的？这个问题显然很可笑，甚至都不应该提出来，因为目的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把它排除掉了。单个资本家确实试图赚取差额利润（并且时常能得到它），其他人接受它，结果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利润率下降。卢森堡同志因放弃了马克思分析中的精确概念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轨道。

第二点：罗莎·卢森堡同志提出“为谁”的问题并给以否定的回答后（“不为谁”），立刻加以评论，而且仅仅是顺便地说的，好象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似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的消费同工人的消费都在增长。罗莎·卢森堡没有注意到，这个声明事实上答复了谁从扩大生产中得益这个问题；因为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联系的角度出发，她的问题——主观地提出来的，所以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客观地提出来时才能变得有意义。但是如果象这样地提出问题，它就成为：每一个正在上升的社会制度——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历史——经济外衣出现，不管它产生什么样的矛盾，也不管它的领导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有什么样的动机——包含着消费和生产之间完全客观的（即使是间接的）联系，由于生产增长的结果而出现消费的增长——作为生产增长的另一个方面——构成了整个社会制度发展的基本前提。罗莎·卢森堡正是通过指出社会消费的增长而不自觉地证实了她提出的问题。

第三点：但是那一点也不能阻止她在所引用的段落的结尾处宣判马克思的模式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主义，而这个主义的实质是把生产同消费分开，并且把前者完全分离开（“毫无目的地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

第四点：卢森堡同志在承认由于积累而出现的“整体资本家”的消费增长之后，立即试图缩小这一事实在理论上的价值。她写道：“即便消费发生和增长了，积累也没有发生”，等等。这类诡辩事实上已大大地离开了辩证法，因为每个人马上就会清楚没有相应的积累，消费的增长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现象。卢森堡同志的错误是非常根本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把统计上的数量同一个过程相混淆而产生的。实际上，假设我们有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 S ； S_1 相当于已被消费掉的 S ， S_2 相当于积累的部分，结果 $S = S_1 + S_2$ 。由此而得出，就我们所讨论的特定的不变的 S 而言，如果 S_1 增大， S_2 就必须变小，反过来也是如此。 S 是 S_1 增长的极限，而零则是 S_2 下降的相对的极限。在这种暂时的即特定的和不变量 S 的“有利”情况下，我们回到了简单再生产，并且没有移动过一步。（由于不可能在竞争的斗争中达到这点，我们实际上所得到的是倒退的运动，所以是衰退。）另一方面，如果积累的比例增长了，资本逐步地增长了，新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就随着每一次周转而增长，而每一次周转仅仅为消费部分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创造了可能性，如果那部分剩余价值是按比例增长的话；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是积累的一个函数。把这两种东西彼此分开是没有意义的，考虑到再生产过程就更是如此了。

但是，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面来说明。因为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积累的客观结果，而是推动资本家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推动力不总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面前就出现积累的另外一

面：资本家积累，为的是能够继续不断地得到越来越多的积累。因为资本家的“动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积累是资本家的目的本身。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积累的目的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资本家的消费不能被看成是积累的目的”），简直是多余的了。

第五点：罗莎·卢森堡关于工人的消费增长的说明同样是不成功的。“维持一支日益扩大的工人大军，更不可能是资本不断积累的目的。”多么正确啊！然而（从资本主义的动力观点来看），“维持一支日益扩大的工人大军”确实可以成为积累的目的，而且常常的确是积累的目的。这点绝非难于理解。资本主义为进一步积累而积累。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把在一次周转中积累起来的部分资本转化成下一次周转中的可变资本，转化成追加的起作用的活的劳动力。结果是日益增殖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消费是积累的结果，从来不是它的前提，”否则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就被颠倒了。这是卢森堡同志提出的可怕的前景。但是它“从来不是”真实的。工人的消费只能是劳动能力的生产，而那是《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来就已解决了的。毫无疑问，劳动能力的生产是物化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生产的前提，而且追加劳动能力的生产是积累增殖的先决条件。因而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误解”。

卢森堡同志以绝望的口气疾呼道：“无论怎样，工人只能消费与他们的可变资本相适应的那一部分产品（这个“他们的资本”指的是什么呢？应读成：“他们的收入”，这一收入同可变资本相等。——尼·布），多一点也不行。”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清清楚楚地考虑到原来的劳动力，劳动能力的原来价值，因而考虑到原来的可变资本量。但是接受这一假设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把扩大再生产排除在外。可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合乎逻辑的论证中把扩大再生产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让它在结束时消失自然就变得容易

了，因为这至涉及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的简单再生产。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是极端的简单。雇佣追加工人就产生了追加的需求，这正好实现要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确切地说，就是有必要把自己转化为起作用的追加的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就是为什么罗莎·卢森堡同志的评论在这点上也是错误的，而马克思则是完全绝对的正确。

第六点：但是——可怕的名言——这样，资本家就要“为扩大生产而疯狂地扩大生产”，而且整个“旋转木马”就“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论点，尽管肤浅的考虑已经把这些论点的虚浮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了。

关于罗莎·卢森堡的最后的“批评性”攻击，让我们在这儿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一段话：

“但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产业资本家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发财而发财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在他不过是资本的职能的执行者，因而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的限度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量的增加。重要的是抽象财富的增加，只是别人劳动的更大的占有。他和贮藏货币的守财虏一样为绝对的致富冲动所支配，不过不以金银贮藏的幻想形式为满足，而致力于同时就是现实生产的资本的形成。如果劳动者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的生产，一个模范资本家即理应如此的产业资本家的生产，便是为生产而生产。……不管怎样挥霍浪费，他在本质上总是和贮藏货币的守财虏一样贪婪吝啬的。……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受财富的代表，一旦追求乐趣的积累，而不是追求积累的乐趣，他也就或多或少不再适于完成他的职能。……所以，他也是一个剩余生产即为别人的

生产的生产者。”^①

如果罗莎·卢森堡同志被“生产的狂人”吓唬住，并同他们一起去吓唬别人，而且全神贯注地惊呼：“那还被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实际推断哩！”，我们的回答是，那绝不是什么推断，而是事实上代表了那个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细节。这位大师的巧手早已对此有所描绘。一般来说，对资本家的动机的分析有三种可能性，即资本家或者把消费作为自己的目标，或者把货币的“虚幻形式”的致富作为他自己的目标，或者最后被对于“实际生产的资本积累”形式的致富的强烈要求所推动。既然罗莎·卢森堡把第一和第三种可能性排除掉了，她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虚幻的形式”。但是，罗莎·卢森堡这样就把“一般的资本家”转化为中世纪的货币兑换者和高利贷者，转化为普希金式的“贪婪的骑士”，至多把他转化为一个货币资本家。

毫无疑问，罗莎·卢森堡的论点导致这种结果，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她所运用的这些论点根本不符合客观现实，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罗莎·卢森堡说：“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盲目地不断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那么，首先，这里存在着对论题的某种错误解释，因为整个消费资料的生产突然地、令人不解地消失了，这个消费，归根到底也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所依赖的东西；换句话说，罗莎·卢森堡同志首先把马克思打扮一下，修剪了他的胡子，并把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和部长的眼镜给他戴上，以便她后来能够容易得多地把马克思的词句扣上图冈—巴拉诺夫斯基主义的帽子。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偷偷地把马克思和图冈之间的分歧抛开，然后强调说明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分歧，那末他就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303—304页。

一定能成功地使某些人上当。其次，罗莎·卢森堡有什么理由把积累同扩大再生产对立起来？看来只有《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才能理解这种神秘主义。

扩大再生产的主观意义，即从资本主义生产钜子的角度上看的意义，在于致富的生产形式；但是那一点也不意味着要否认这些主观倾向的客观后果，这些客观后果在于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问后者的对抗性质如何。因为正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是独立于具体的历史外表的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社会得到表现。马克思写道：

“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二卷第三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①

这一段话使罗莎·卢森堡同志得意洋洋地解释说：“这一段话表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格格不入。”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和人不尽相同。留给罗莎·卢森堡去做的，是在马克思身上再制造出一个新的“矛盾”，即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之间的矛盾，正如她已经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发现了矛盾一样，而且，在她之前很久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们，已经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发现了“更为重要的矛盾”。那末，我们就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事实上会把可怜的马克思吓得不知所措。但是幸运得很，对他来说，这个“积累”比卢森堡设想的资本积累具有甚至更多的“虚幻形式”的色彩。但愿我们已经把罗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341页。

莎·卢森堡同志在《资本积累论》中发挥的基本论点都论述到了。

在她的《反批评》中，罗莎·卢森堡同志以同样的或者最好把它说成是以几乎同样的理论抽象水平谈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将在这里评论一下她的论证。让我们听一听我们的“评论家”怎么说的吧：

“让我们假定，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在某个地方堆积在一起，供整个社会使用。那末，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大堆货物是如何自然地划分为几个种类不同和目的地不同的大的部分的。”^①

紧接着卢森堡同志把她的“大堆货物”分成下面两部分：首先是“广义的生活资料”，其次是“用来更新那些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新的生产资料”。（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只讨论“更新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任何“追加的不变资本”的来源都将消失。但那只是顺便提一下。）

在此基础上，罗莎·卢森堡现在可以进一步将上述一大堆货物明确地区分成三部分：

1. 一部分用来更新不变资本；
2. 一部分一方面用来更新可变资本，而另一方面包含着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剩余价值率；最后，
3. 一部分剩余价值隶属于积累。（顺便提一下，非常显然，后者的分法是十分不妥的，而且只能适用于理想的“大的堆积”，即通过抽象的过程。）

罗莎·卢森堡进而提出了谁是这三个部分中各个部分的购买者这一问题。至于她的“大的堆积”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罗莎·卢森堡非常简单地解答了这个问题，然后立即转到第三部分的问题，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59页。

即转到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率。这里我们不得不重复她的独特的论证，尽可能地保持其原文：

“在我们假设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总存货中，我们必须相应地找出第三部分，它既不是用于更新消耗掉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生产资料，也不是用于维持工人（?!!——尼·布）和资本家的生活。它将是这样一份商品，它……（包含）用于资本化和积累的利润。它们是什么样的商品呢？社会中又是谁需要它们呢？（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又说：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积累问题的核心，而且我们必须考察所有的解决尝试。那些享用后一部分社会商品存货的人，真的可能是工人吗？然而，工人除了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得来的……工资之外，并无其他手段……①

“也许可能是资本家自己为增加自己的个人消费而成为那后一部分商品的顾客吧？……但是，如果资本家自己象流水似地花掉全部剩余价值，那就不会有什么积累……”②

因而结论是：

“那么，谁可能是那部分商品——它的出售仅是积累的开始——的买主和消费者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那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资本家。”③

所以另外的可能是：

“然而，社会上不是存在着如公务员、军界人士、牧师、学者和艺术家等各种阶层，他们既不能算做工人也不能算作雇主吗？”④

①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3页（这里和下面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② 同上，见本书，第64页。

③ 同上，见本书第64页。

④ 同上，见本书第64页。

但是，这些阶层“没有任何独立的购买力来源，但可算作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消费中的寄生虫。”^①

在列举了所有这些可能性后，《资本积累论》的作者突然产生了一个有理智的想法，但是她又尽快地把它抛弃掉了：

“总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也许我们就象那个骑着毛驴的人，还在拼命地寻找他骑着的毛驴哩。也许资本家互为其余那部分商品的顾客——他们没有乱用它们，而是用它们来扩大生产，进行积累。那末，积累若不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它还能是什么别的呢？只是（这个“只是”有什么必要？——尼·布）完成这个目的的那些货物一定不能由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奢侈品来组成，而必须由各种生产资料（新的不变资本）和工人的生活用品来组成。

好，但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在我们假定积累已经开始和增加的生产在下一年里向市场投放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着重点是作者加的）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到顾客来购买这一批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呢？我们是否这样回答：这批数量增大的商品将再次在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以再次扩大生产，等等，每年如此，这是不是可以呢？那末，我们就有一个旋转木马，它在天空中自我旋转。那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资本的积聚，而是相反：（!!!——尼·布）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是全部商品的唯一顾客，除去他们必须拿出来维持工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总是必须用自己的货币（哎呀！——尼·布）去购买商品，实现剩余价值，那末，利润的积聚，为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②

①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5页（这里和下面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尼·布）。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5页。

这一切导致了一个高潮，一个决定性的结论，这个结论早就预示着向新的主题转移：

因此，“他们必须寻求许多其他的买主，这些人从一个独立的来源那里获得他们的购买手段，而不是……从资本家的钱袋里获得购买手段。他们必然是在商品交换亦即货物生产的基础上获得购买手段的消费者，这种商品交换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外发生罢了。”^①

现在也让我们一条一条地考察一下卢森堡同志的这一逻辑推理：

1. “商品堆积”中第三部分的特点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下面初看上去不很重要的事实：在她给臭名昭著的“第三部分”所下的定义中，罗莎·卢森堡同志认为它“既不是用于更新消费掉的生产资料，也不是用于维持工人的生活”，等等。为什么在这儿提到消费掉的，而且只是消费掉的生产资料，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资料呢？因为，只要用于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包括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就是追加的生产资料。并不是因为它们代替了旧的生产资料，而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商品堆积的第一部分完成了这一职能），而是因为他们起了新的追加资本的作用，是在原有的数量上增加的部分。但是，工人的情况如何呢？真是像罗莎·卢森堡所声称的那样，“第三部分”一点也没有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吗？不是这样的。不过，说价值的一个分子也没有代替“消费掉”的可变资本，这是正确的。但是，难道不可能像存在着追加的不变资本那样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新的”即追加的可变资本吗？只要人们承认追加的不变资本，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56页。

他就必须也承认可变资本的增殖（不管它少到什么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追加的可变资本的成分，偷偷地，从一开始就从商品堆积里面消失掉了。卢森堡同志利用这一情况来迅速获得资本，而不顾她对积累的否认。

2. 工人作为可能的消费者

卢森堡同志正是在对工人作为可能的消费者的问题所作的分析中获得这个资本的。按照罗莎·卢森堡同志的观点，不存在工人成为“剩余”的消费者的问题，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他们的购买力受到他们的工资的限制。对此的答复可在意释一个著名的轶事时找到：我明白工人的生活条件很坏，我也明白他们的购买力受到他们工资的限制，但是只有卢森堡同志的信徒们才能明白，甚至连包含着将要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那些东西的一个分子都不是工人消费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工人？“首先”，“工人”一词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原来的工人，原来的劳动能力以及偿付他们的劳动的旧工资，那么，这样的前提事先就包含了否定的答案。可变资本的恒久性是以工人的需求的恒久性为前提的，是以缺乏追加工人为前提的，一句话，是以为维持以前的活的劳动能力的全部条件为前提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除非将要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全部转化为不变资本，那也是以积累不足为前提的。因而，在这点上卢森堡同志的错误完全同前面那点上的错误相一致，基本上是一种赘述。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资本家雇佣追加的工人，而追加的工人然后生产出追加的需求。

3. 资本家作为可能的消费者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这点上的论证必定会使人完全目瞪口呆

呆。她自己完全离开了平衡来分析社会平衡的条件。她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呢？

她问道（我们再一次擅自引用有关的段落）：

“也许可能是资本家自己为增加他们自己的个人消费而成为顾客的吧？”

她答复道：“如果资本家象流水似地去花掉全部剩余价值，就不会有什么积累。”

换句话说，她问道：如果单个资本家把一切都消费掉的话，而且毫无积累，那么，积累怎么会是可能的呢？

答复是：因为如果要积累的话，人们就必须积累；否则积累是不可能的。

当然，卢森堡同志不是不知道，在我们的情况下资本家的需求必然是一种生产性的需求。但是，她近乎天真地满足于最乏味的和单调的重复，纯粹避免正确地提出问题。这里她也是从一开始就把实际问题同不能接受的前提混为一谈。难怪这个答案也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资本家的需求是追加的，正因为他们确实积累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包括追加资本的价值要素在内的物质要素一开始就部分地属于资本家。因此，我们讨论的是资本家对他们已经占有的东西的需求，这样，我们所讨论的是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交换。只有当人们懂得这点以后，他才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是什么意思了。至于资本家阶级，购买只意味着在这个阶级内部的相互交易。

但是，我们绝没有把这个问题讨论透彻。追加资本（不变的和可变的）的价值要素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那么，物质要素呢？又是，又不是。生产的过程一方面造成资本家在手中握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握有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可能实际上在下次生产循环中出现——如同在人们进行的任何生产过程中出现

——但是对消费资料就不能这么说了。生产过程包含了生产资料 and 活的劳动能力之间但不是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之间的有生的关系,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生产是工人阶级的消费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在工厂外面发生的,是在资本家控制范围以外发生的,而且其特点包括了单纯的已有的价值(消费资料价值)的易手。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一个简单的基本的和初步的事实上,即进行再生产所必需的交换行动不仅包括两大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当资本家作为直接的购买者和销售者出现时——而且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

例如,假使我们拿实现供积累用的剩余价值的问题来看,我们得到:

$$I \cdots \cdots \beta_{1c} + \beta_{1v}$$

$$II \cdots \cdots \beta_{2c} + \beta_{2v}$$

具体情况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看到,等式 $\beta_{2c} = \beta_{1v}$ 提供了主要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等式的某些部分必须交换位置。那么,我们将得出第一部类中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总和,而后者的总和应根据它的价值与必要的追加的可变资本相等。我们在第二部类中也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人们不应把社会产品及其物化形式同社会的生产资本及其物化形式混淆起来。这个产品包括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这个生产形式的资本包括生产资料 and 活的劳动能力。

“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①(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439页。

结果，必须要有交换行动，在这个行动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占有）转化为活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此处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论点提前一点），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资本家不能直接处理物质的生产资料。这就引起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进一步的交换行动。

从而我们得到：

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 β_{1v} 的货币额预先付给第一部类中追加的工人（雇佣追加的工人）。

第一部类中追加的工人利用这笔款项，全部款项从第二部类中的资本家那里购买生活资料。因为 $\beta_{1v} = \beta_{2c}$ ， β_{2c} 的整个部分消失在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中。但是出现了价值与此相等量的货币。^①

第二部类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从第一部类的资本家那里购买生产资料。于是，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占有了适当的生产资料形式的追加的不变资本，而另一方面，对于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来说， β_{1v} 消失在生产资料中，然而他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开始时预付的货币额又回到他们手中。

让我们把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标为 KI，把第一部类的工人标为 PI；第二部类中相应的标记则为 K II 和 P II。从有关的契约各方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价值观点来看，一连串的和销售的全部行动采取了下列公式：

$K I \rightarrow P I \rightarrow K II \rightarrow K I$ （这条链子上的环节是 $K I \rightarrow P I$ ， $P I \rightarrow K II$ ， $K II \rightarrow K I$ ）。

这样，所有物化要素都有了自己的归宿，而货币在完成了流

^① 确切地说，这里需要少得多的数量的货币，因为同样数量的货币促成了一系列的购买活动。在特定的逻辑范围内，这是无足轻重的。在另一种逻辑范围内这种内容就极为重要。后面还将继续。

通手段的作用和调节了资本的物化形式的正确分工之后，回到了它的所有者手中。

我们假定第一部类中的资本家预付了货币。但是，我们也可以假定货币来自第二部类中的资本家的钱袋。这样，我们就得出下面的系列： K_{II} 从 K_{I} 那里购买生产资料，为此预付了 $\beta_{2c} = \beta_{1v}$ 的款项； K_{I} 雇佣了追加的工人 P_{I} ；追加的工人 P_{I} 从 K_{II} 那里购买消费资料；货币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资本的物化要素在相应的关系中得到。

这一系列购买和销售行动就将是： $K_{II} - K_{I} - P_{I} - K_{II}$ （这个链条的环节是： $K_{II} - K_{I}$ ， $K_{I} - P_{I}$ ， $P_{I} - K_{II}$ ）。

让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很清楚，资本家能够——而且也确实——显示出追加的需求，部分是直接提出的（对于生产资料），部分是象征性地通过工人（对于使用物品的需求），通过预付货币给工人表现出来的。

结果是明显的。资本家自己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追加工人，工人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货币，而资本家购买这些追加的工人的劳动能力，购买追加的消费资料。然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搬出了可怜的赘述而得出结论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那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资本家。”^①

4. 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罗莎·卢森堡着重考察了一系列表面的可能性并得意洋洋地“驳斥了”这些可能性之后，对问题的提法非常接近于正确。她提出了（刚好在结尾处！）是否资本家而且确实不是单个资本家可能有需求，而是一个生产性的需求这样一个问题。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她是从一个十分正确的前提出发，即需求的对象必须由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4页。

费资料所组成。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当她即将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突然发出惊呼（这已被我们引述过）：“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种解决办法把困难从这个因素推向下一个因素。”卢森堡同志，请原谅，如果这“一切都很好”（这个“一切都很好”是被迫承认的，因为她提不出一个反对这个“一切都很好”的事实论点），就是说，找到了购买者，我们要问：必须被“推到下一个因素”的“困难”在哪儿呢？

也许在于这个事实，即在下一个时刻里，销售以购买作为前提，从而又将找到购买者？困难就在于购买者突然在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当购买者又一次被幸运地找到，困难被证明是虚构的“想像的”困难，即罗莎在分析再生产时的一种困难，而不是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困难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还需要什么呢？罗莎·卢森堡试图敏捷地爬上旋转木马使自己摆脱这件难办的事情。这个旋转玩意儿应该能使她逃跑得很得体。

显然，旋转木马的论点取决于两个要素：（1）这个“困难”的重复；（2）“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它〕是毫无意义的。”

就这个“困难”的重复而言，我们已经作了解答。但是，不论是资本家的观点或是从其他观点来看，都不会反对这一点，即这个过程显现出循环的性质。“旋转木马”一词以及类似的美妙的比喻，都绝不可能证明什么东西。

然而，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毫无意义”这个论点，因为它在这里提得更为愚蠢，并且有点躲躲闪闪。

一个“旋转木马”。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写道：“那么，这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资本的积聚，而是其相反，即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在我们的面前又一次出现了实实在在的一大堆错误和矛盾。

首先，众所周知，货币与商品相对；货币的商品形式与货币资本相对。结果，按照罗莎的观点，我们正在讨论的只是一则犹太轶事中的简单再生产。“你伤了你自己吗？”“喔，没有，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工业资本——它“体现了实在的再生产”——在其流通过程中，把这一流通中的所有三个阶段统一了起来。（“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实际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①

其次，罗莎·卢森堡自己既然承认这“一切都很好”，就是说，买主找到了，生产又能开始了，她就承认它已经过了货币阶段，不管她将把这一实在的，扩大的（而且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称作什么。（我们已在上面具体说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

再次，卢森堡同志绝不满足于此。她是不满足的，因为她把资本主义积累看得坏透了。因为她把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和货币资本的积累等同起来。要是人们能够怀疑从她的第一部著作《资本积累论》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如同我们上面所做的一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现在在《反批评》中已作出了这个结论，而且的确是直率地说的。她认为，资本家的目标体现在作为目的本身的货币上。如果货币仅仅是“实际生产”运动的一个阶段，那就根本谈不上资本的积累。

马克思更确切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②

在另一个地方他写道：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11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0页。

“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① 这些过程作为扩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模式是否有效呢？

最后，我们将再引一段，这一段彻底摧毁了罗莎·卢森堡的论点：

“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听着，听着，你们卢森堡的同志们——尼·布）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愚蠢行为。”^②

以及“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③

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支持者会回答说：放心好了，《资本积累论》的作者绝没有把货币额的积累同资本积累混淆起来。现在，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我们认为在积累过程中增加到原先的资本中去的追加资本只能是货币形式，因而这一形式可以立即被生产资本的形式所替代；要么我们不顾普通常识而否认这点。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下面的也就立即清楚了。在每个特定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45—646页。

③ 同上书，第652页。

时刻内，用于积累的全部剩余价值以各种形式出现：商品形式，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形式和劳动力形式。所以绝不应该把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和总剩余价值等同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个资本家阶级能够在规定的条件下实现总的利润，但这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过程。因而，任何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任何生产部门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以及由此而得到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在发展过程中都经过货币阶段。另一方面，根据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就必须作这样的推断：如果剥去货币外衣，用于积累的利润就不再是积累起来的有效利润。然后，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支持者还企图对这部分资本的单性生殖的办法和途径作出解释哩！

但是，在整个犹太教法典的诡辩中最可笑的东西是下面有趣的情况。让我们假定根据罗莎·卢森堡同志的部分晦涩的，部分极其模棱两可的愿望，供积累用的全部利润是由黄金构成的。每个单个资本家，如同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一样，将会同时实现各自的产品（即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存在海外市场的可能性，这使罗莎·卢森堡多么高兴啊。很好！下一步是什么呢？除非我们坚持要把我们的资本家变成囤积者和守财奴等等，否则我们就必须让他们把黄金转换成生产资本。他们现在想要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但是从哪儿弄到呢（既然他们自己已经把它们卖掉）？所以，他们从国外买回它们。另外，他们想要雇佣工人。他们成功了。但是没有生活用品给工人。那么，他们从国外为自己购买消费资料。所以整个过程又重复一遍：资本家先把他们的商品卖到国外，然后他们又买回同样的商品。^①因而“积累”的问题，每次都是以同样的方法解决。

① 我们顺便指出，在第二种情况中的国外是指不同的国外。

如果这不是兜圈子和闹剧，又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讨论了积累问题的最抽象的公式。我们看到罗莎·卢森堡开始时把货币问题排除在外，然而在后退时却不得不完全求救于她最初拒绝的要素。在这点上，我们也揭露了《资本积累论》的作者的错误实质。但是，为了完备论证，为了使卢森堡派满意——这是我们希望给予的——我们将专用一章来讨论再生产过程中货币的作用问题。

第二章 货币和扩大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指出，在分析社会总生产方面，卢森堡同志开始时对货币及其重要性表示哀悼，但当她打算论证她的概念的好处而感到理屈词穷时，最后她又对货币表示欢呼。

原来真正的原因在这里，马克思的模式之所以是“实在的”和“定论性的”，只是因为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这些模式里很少得到考虑。《资本积累论》的作者嘲笑这些模式，“在那些模式里，我们任意写进了一行又一行的数字，用这些数字所进行的数学运算分毫不差，而其中的货币资本却被完全漠视了。”^①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能有多大决心来丧失“主权”，如果我们给货币资本以应有的尊重的话——当然要借助于笔和纸。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单个资本，它的每一个分子，以及由此而得到的社会总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须经过货币阶段，即周期性地呈现出货币资本形式，它尽管具有“虚幻性质”，但它对于工业资本的运动以及对于体现出“实在的生产”的后者生产形式都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提出和答复下列的问题：

1. 货币来源问题；
2. 在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系方面，货币流通量的问题以及
3. 货币资本的积累问题。

关于1，如同任何一种商品，货币也是一种劳动产品，就是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83—84页。

说，它必须被生产出来。如果我们为了简化分析过程而不问黄金货币同货币的黄金物质之间的区别，货币生产同生产的一个部分即黄金工业便相一致。货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在人世间生产出来；货币本身如同矿山工业生产铁矿石，农业生产裸麦以及机械工业生产机器一样，毫无神秘之处。照此来看，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货币财产来源问题同生产资料财产来源问题之间原则上没有区别。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货币的社会性质，一点也没有否定货币是生产的产品。

“金要执行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这个地点就在金的产地，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现了的商品价格。”^①

因此，如果我们从物质形式的角度，即从对于物质要素的相互更换十分重要的物质比例的角度（从“社会生产机体”内部的“物质变化”的角度）以及从调整这一更换的物质联系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我们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即资本主义制度遭到货币生产的社会需求的压力，同它在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的生产上所面临的压力完全一样。因此，作为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的货币再生产，从资本的特定的历史形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单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它不属于“实在的生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忘记，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先于货币而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在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好象表现为一种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一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第 128 页。

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态(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①

黄金的纯商品作用同它的货币作用的区别主要地和根本上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金矿工业的产品一方面作为工业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转化为货币,并且以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十分特殊的形式发生作用。

所以,货币物质的生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而且黄金生产者的形象并不比铸造工厂主的形象或亮油制造商或“鸡肉大王”的形象更神秘些。对于“货币从哪里来到这个国家?”这一问题(读者们知道,我们现在考虑的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简单的答复是:来自黄金开采工业。

关于2,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的货币②是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社会要素,那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十分特殊的作用。这一特殊作用存在于这个事实里,即它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它相应地继续地留在流通范围内。货币不停地从一个钱袋流向另一个钱袋,过着同在欧洲的文明人中的吉卜赛人相类似的流浪生活。认为商品价值的每一次新的增殖都必须伴之以相似的隐藏在神秘的金子幕罩下的价值增殖,这是十分荒谬的。正像在巫术组织内,同一种媒介可以连续为几百个愚人“服务”一样,黄金单元的媒介也可以连续为许多次商品交易服务。

“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流通,——无论它在两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11页。

② “金可以是货币,也可以不是货币,正象纸可以是银行券,也可以不是银行券一样。”马克思引自奥维尔斯顿。(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490页。)

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内流通，也不管它的职能是实现收入还是实现资本，——对于它的流通总量来说，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b中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所阐明的各个规律都是适用的。通货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这样执行职能的货币对支付者或接受者来说，究竟是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是没有关系的，决不会使情况有任何变化。货币的总量是简单地由它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决定的。”①

人们必须把流通货币量的增殖（然而这种增殖决不等于再生产的增长）和作为资本的特殊形式的货币资本的积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和自己的运动）加以区别开来。反复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量绝不应该和新增殖的货币总数等同起来，因为实现的过程不需要有这一笔货币；同样，资本的积累绝不应该和货币资本的积累混同起来。

“至于利润的……部分，即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那末，它只有在不能直接用来扩大它由以获得的那个生产部门的营业的情况下，才会转化为货币资本。”（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②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二部分（30、31和32章：“货币资本和实际资本”）中，马克思也详细地分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实际资本的积累之间的关系。他得出了下面总的结论：

“这个过程，（借贷资本的积累——尼·布）和货币实际转化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04—50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74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技术上的不可能性问题，而是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饱和或不充分的那部分可以自由使用的资本的饱和问题。

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①

因此：追加货币，供积累用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货币资本的积累——所有这些量彼此之间绝不重迭。

事先叙述了这点之后，让我们现在着手考察一下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思想过程。我们先不涉及她的论点的实质，因为它们是极端混乱的，她的错误的根由，只有在分析她的个别论点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揭示。因此，我们开始予以反击，打算从各个方向来反击她四面出击的战线。而在我们方面，我们将把所有的基本的反对意见归纳起来。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指责布尔加科夫^②是“盲从”马克思（多大的罪名啊！），她在同布尔加科夫的论战中，把布尔加科夫的立场阐述如下：

“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没有比马克思的分析前进一步。它可以被归纳为下面三个极为简单的句子：（1）问题：需要多少货币来实现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答案：根据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所需要的数量。（2）问题：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这笔货币来实现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呢？答案：他们必须要有这笔货币。（3）问题：货币是从哪里进入国家的？答案：从黄金生产者那里。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75页。

^② 谢尔盖·尼古拉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在神学院学习过，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同教会决裂。以后在莫斯科、柏林、伦敦和巴黎学习。在基辅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经济学。晚年重又皈依教会。1918年任神父。1924年被驱逐出苏联并居住在巴黎直到1944年7月逝世。

接着就是挖苦评论：

“这种解释方法如此简单，与其说它具有诱惑能力，不如说它令人怀疑不已。”^①

但是，由于仅仅挖苦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罗莎·卢森堡同志企图运用论据，在布尔加科夫的章节上胡乱地加进插话和惊叹号。她把可怜的“黄金生产者”当成她攻击的中心。

罗莎·卢森堡援引说：“布尔加科夫这么写着，难道黄金生产者不可能购买第二部类的全部（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并用黄金来支付，而第二部类立即就用它来从第一部类处购买生产资料并且扩大可变资本，即购买追加的劳动力？这样，黄金生产者就成为实际的国外市场。

“然而这个假定是十分荒谬的。接受这个假定将意味着社会生产的扩大，依存于黄金生产的扩大。（妙啊！）这样又以黄金生产的增加为前提，完全同现实不相符合。…全部黄金生产必须立即占有很大的比例。（妙啊！）…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足够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粉碎这个前提。这个事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贷制度也发展起来了（好啊！）…这样，这个假设就同事实发生直接和公开的矛盾，因而必须被驳斥。”^②

于是罗莎说：

“妙极了！好极了！因此，布尔加科夫在说这句话时，他自己也就驳斥了他以前对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以及被谁来实现的问题，所作的唯一的解释。而且，马克思对黄金生产者吞没全部（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社会剩余价值的假定时，只加了一个字的按语：“荒谬”。布尔加科夫在驳斥他自己的论点时，不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4页。

② 斯·布尔加科夫，《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莫斯科，1897年）第132页。引自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5页。

过用较多的篇幅来说明马克思所用“荒谬”一语的意义罢了。”^①

那么，马克思认为“荒谬”的东西是什么呢？布尔加科夫真正“抛弃”的又是什么呢？（在这点上布尔加科夫又‘盲目地’跟从了马克思）。答案是：这个假设是黄金生产者直接购买第二部类的全部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这正是布尔加科夫所系统地阐述的，是与罗莎·卢森堡截然不同的）。这一假设必须被抛弃吗？当然要抛弃，因为即使在假设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制度里，想象出有如此大量的黄金生产，这种假设也是不能允许的。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不得不在其运动中经过货币阶段，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而是一点一点地实现的；不是作为和一整堆货币相对立的一整堆的商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无数的商业交易来实现的，在这些交易中同一个货币单位连续地从商品总数中一个部分又一个部分地实现。每一个单独的部分，根据它的价值，同这个货币单位相等。

如果每个货币单位只转化一次；如果没有借贷；如果不可能加快转化的速度；如果不取消相互承担的义务；如果黄金的生产同货币的生产完全相一致；如果不存在历史上造成的货币的贮存；如果鼓励金币生产是不可想像的；以及如果由于这一切需要采用纯黄金流通，那么这一“荒谬”的假设就会同现实相符合；生产和扩大生产就要依赖于黄金的生产，并将大规模地生产黄金。在罗莎·卢森堡的商品堆的边上将升起一座巨大的金山，越升越高。

因而荒谬性存在于这个事实内，即转化的速度被忽视了，信贷的存在被忽视了，等等；换句话说：荒谬的东西是一堆金子这个概念，而这堆金子应该是足以购买一堆商品的。另外一方面，再也没有比这个前提更荒谬的了，即追加货币来自黄金生产者，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5页。

同样荒谬的是这个货币作为引起新的交换行为的媒介，只要流通手段的节约和转化速度的增加不能补偿并满足对于货币的增長的需求。

从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未能用一致的讽刺性的惊叹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在这点上，真理不在她的一边。因此，她“批驳”了布尔加科夫之后立即改变了问题，并提出了“为谁”这个臭名昭著的谜语（我们已在第一章中提供了谜底）来取代货币问题，这是不奇怪的。

然而，在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武库中，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论点。她确实在另一个地方提出过这个论点，但是它的逻辑关系几乎是一样的。罗莎·卢森堡写道：

“不是这个，便是那个！我们或许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总生产物简单地看作一堆混杂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而在积累条件下，把这个没有区别的商品混杂堆以及它的全部价值看作单纯的增大。这样，我们所要说的是：为了流通这一价值总量，相应数量的货币是必要的，并随着这价值总量的加大，货币数量也必然增加，除非这个价值的增长被交易的加速和节约所抵销了。而最后的问题：所有这些货币原来是从那里来的，于是可以用马克思的处方来回答：从金矿中来。当然，这是对事情的一种看法，即简单商品流通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引用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简单商品流通中是没有地位的，它们基本上是属于资本流通和社会再生产的；也没有必要探讨起初在简单再生产，后来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来源问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状态下，这种疑问是没有意义或没有内容的。但一旦这些问题提出来了，一旦确定了方向，要考察资本流通和社会再生产时，我们不能再求助于简单商品流通的范围了，因为在简单商品流通范围

内，根本没有这样问题，因而也没有解决这样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在那里找寻一个答案，然后胜利地宣称这个问题老早就解决了，并且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①

这篇激烈的政论看上去似乎有很强的说服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里面却存在着一个莫大的理论错误，即罗莎·卢森堡同志总是喜欢谈论具体“历史的”，“特别的”“独特的”东西等等，但她恰恰忽视了货币的特殊性及其作用。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扩大规模上的社会再生产的公式：

$$I \cdots c_1 + v_1 + a_1 + \beta_{1c} + \beta_{1v}$$

$$II \cdots c_2 + v_2 + a_2 + \beta_{2c} + \beta_{2v}$$

从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什么规律呢？我们得出一系列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归结为一个方程式：

$$v_1 + a_1 + \beta_{1v} = c_2 + \beta_{2c}$$

就我们讨论的“实际再生产”的要素和预想的经济平衡来说，生产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表现在两边生产出来的商品量（以及价值）的相对地位。上面的方程式由此而来。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第三”排，它同黄金的生产，货币物质的生产或货币的生产相适应。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方程式呢？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如果前提是“这堆”黄金同“这堆”商品相对立，或者反之。然而，这一前提并不奏效，因为货币的运动不同于商品的运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和社会对商品的需求是不同性质的而且在“物质变化”过程中货币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再生产的公式——它是以“实际再生产”为基础的——中， $(v_1 + a_1)$ 表示对 c_2 的需求，而反过来 c_2 表示对 $(v_1 + a_1)$ 的需求； β_{1v} 表示对 β_{2c} 的需求以及 β_{2c} 对 β_{1v} 的需求；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117—118 页。

因而，合在一起 $(v_1 + \alpha_1 + \beta_{1v})$ 表示对 $(c_2 + \beta_{2c})$ 的需求，而 $(c_2 + \beta_{2c})$ 转过来对 $(v_1 + \alpha_1 + \beta_{1v})$ 的需求；对货币的需求具有不同的形式。说人家在这里已经完成向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的转变，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这种观点同资本运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特殊因素，它把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运动同任何物质决定的商品形式的运动加以区别开来。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马克思——能够对这个事实负责，即货币的社会必然性，（从而对它的需求）不是由这个事实即货币必须替换生产领域内的某种东西的增长来决定的，而是由货币在十分特殊的范围内即流通范围内^①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其它一切都随货币这一特殊的作用接踵而来。因而，我们读到：

“因此，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图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他单纯站在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家的立场上。……他的银行券……无须他花费分文。……它们（银行券——尼·布）会把货币带给他，……然而它们和他的资本有区别，……因此，对他来说，在通货和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同概念规定本身毫无关系，至少和图克所提出的那些概念规定毫无关系。

这种不同的规定性——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还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首先不会改变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不管货币在完成这个职能还是在完成那个职能，它都会

^① 罗莎·卢森堡在这里对马克思提出的指责（她说，既然人们期待得到一个相对简单的答复，为什么还提出复杂的问题来？），如同在别的场合一样，常常是由于对第二卷中的论点的性质的误解而引起的。首先，马克思写东西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他作出各种声明，写下各种临时笔记和草稿，是为了帮助他弄懂各种问题等等。这是罗莎·卢森堡所完全忽视的，尤其是在她开始玩弄词藻的时候。

保持这个性质。”（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①

因而罗莎·卢森堡同志的这一“格言式”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罗莎·卢森堡的论证的要点，这些要点再也不是在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为谁”生产的问题方面，而是在新的方面：积累——按照罗莎·卢森堡同志的理论，它是指货币资本的积累——怎么是可能的呢？

为了精确和明晰起见，为了避免在将来被指责我把谬论栽在罗莎·卢森堡同志头上，让我们先从她的书中引述有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段落。

我们请读者能容忍这些必要的稍为长了些的摘录。

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一段话。其内容是：

“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是全部商品的唯一顾客，除去他们必须拿出来维持工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总是必须用自己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实现剩余价值，那末，利润的积聚，为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②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在下边的段落中对这一题目描述得最清楚、最集中：

“积累资本不是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堆积如山的商品，而是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转化为货币资本。在商品中剩余价值的积累同用剩余价值来扩大生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商品生产的惊险的跳跃；正如马克思所称谓的：为货币而卖。这也许只是对单个资本家适用而不适用于整个阶级和整个社会吧？绝对不是。……作为货币利润的利润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和十分基本的特性，对于这个阶级和个体顾主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03—504页。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5页。

都是一样适用的。马克思自己就在观察总体资本的积累时也强调……随着总体资本的积累……‘对于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573页。着重点是罗莎·卢森堡加的。）……资本家A^①向B出售他的商品，因此，从B那里获得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后者向A出售他的商品并从A——它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那里收回那部分货币。A、B都向C出售他们的商品，因此，也从同一个C那里为他们的剩余价值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后者从哪里获得他的货币呢？从A和B那里。根据我们的前提，没有其它实现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说，没有其他商品消费者。但是，新的货币资本能够这样形成，使A、B、C致富吗？剥削实现了，致富和积累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以增加的新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的那部分增加的剩余价值的交换和实现必须发生，以便把可能性变为现实。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不问，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经常问的那样（1）：为流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从何而来？最后答道：从金矿主那里来。我们却问（1）：既然（除工人外）资本家是唯一能够消费彼此的商品的人，那末，新货币资本是怎样进入资本家钱袋的呢？在这里，货币资本不停顿地游荡，从一个钱袋出来，从另一个钱袋进去。

但是，且慢：这种问题也许把我们推向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也许，利润积累在这个不停顿地从一个资本家的钱袋进入另一个资本家的钱袋的游荡中，在私人利润的连续不断的实现中已经的确发生，而货币资本的总量甚至不必增加，因为（？——尼·布）全体资本家的‘总利润’这样的事情在模糊理论之外并不存在？

① 在罗莎·卢森堡的例子中，资本家A生产煤，B生产机器，C生产生活用品，让“这三个资本家组成资本家雇佣者整体”。

但是——呵，亲爱的——这样一个假设将会完全引导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扔进火里。因为，平均利润的理论（着重点是罗莎·卢森堡加的。）……总资本利润事实上是一个比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具体得多的物质经济数量。……

这样，问题仍然是：社会总资本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实现着总利润，为了实现总积累，总利润必须不断增殖。那末，如果这个数额的组成部分总是从一个钱袋流向另一个钱袋，它怎能增殖呢？

它会是这样——象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假设的那样——包含利润的商品总额至少能够这样增长，唯一的困难在于提供货币，这也许只是货币流通的一个技术问题吧。但这只是貌似（着重点是罗莎·卢森堡加的），表面而已。商品总额将增加不了，扩大生产不可能发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里最重要的前提是转换成货币，是利润的普遍实现。从A到B，从B到C，再从C到A和B，出售不断增加的商品和实现利润，只有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最后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之外找到一个市场的时候才能发生。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旋转木马转上几圈后就要停止。”①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的论证。尽管这些论点含混不清，但它们有一种固定的，合乎逻辑的轴心。它是：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是整体资本家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而马克思的模式假定货币不断地由一个钱袋游荡到另一个钱袋，这就不可能为实现全部剩余价值提供一个基础。

在这里也让我们一步一步地随着她的思路并仔细地考虑她的论点来检验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推理。而且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考虑这一链条中的每一个有点重要的合乎逻辑的环节。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80—83页。

I 积累的定义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看法，积累并不存在于日益增高的商品山的生产里，而是包含在数量日益扩大的商品量向“货币资本”的转变中，即包含在日益增高的“金山”的生产里。但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决不否认这个事实，即扩大生产意味着日益扩大的商品价值量（因而也是更大的使用价值量，即实际的产品），所以照她看来，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具有一方面为商品山，另一方面为金山的平行生产的性质，以金山的积累精确地代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真正的实质。这一概念是她下面全部考虑的基础，而且连同其他东西一起，作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出现在积累的定义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把资本的积累同后者（资本流通的货币阶段）的纯职能作用混淆起来。更不应该——如同我们已在上面看到的那样——混淆资本积累和分离出来的职能形式的积累，即真正的货币资本的积累，生息资本的积累（“英国人称之为金融资本”）。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伴随着货币资本的积累这一事实，（象马克思正确地强调的那样）绝不意味着资本的积累等于货币资本的积累，绝不意味着它同后者是相同的。这个惊险的跳跃对每一个资本家都是适用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要用某种方法出售他的商品，以便把收回来货币转化成生产资本的物质形式。但是，如果惊险的跳跃真是对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是极为重要的事——确实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它就是对所有资本家——对总体资本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总体资本家在一次交易中，通过用相等价值的黄金堆积与商品堆积进行一次交换，来实现剩余价值。这种（罗莎主义者的）思想是荒谬的。

II 资本家 A、B 和 C 的圈套

罗莎·卢森堡在此处讨论了生产的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应该象征着社会总生产，特别讨论了煤(A)机器(B)消费资料(C)的生产。进而假设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资本家把它交替地投入流通，然后再从流通中把“它捞出来”。那么，积累，即形成他们（资本家们）手中的新货币资本，在这里是怎么可能的呢？——罗莎·卢森堡系统地阐述了她的问题。她答道：它是不可能的。因此，积累也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因而批驳这种天真的诡辩就容易了。

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把黄金的生产排除在外——以（绝对必要地）脱离海外市场为条件——那么追加的黄金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连小孩都能懂得。资本周转之后可以得到同资本周转之前完全相同数量的货币。这种黄金货币“有助于”生产资本把要素按新的方向进行物质的区分，这一方向又使新的流通在新的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它得出：在没有货币的“虚幻形式”的积累，即象罗莎·卢森堡所说，在没有“新的货币资本的形成”的情况下，实际积累是可能的。注意：这里，每一个资本家都恰恰完成了罗莎·卢森堡所说的那个惊险的跳跃。因此这个惊险的跳跃，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是由所有资本家来完成的，也是由整体资本家，即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阶级来完成的。

但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同志显然不满足于此，（从她的整个论点中得出这一看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必须假定：她认为货币资本不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运动中表现为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的货币资本。当然，它作为货币而且仅仅作为货币被积累起来的。但是那就意味着对她的整个立场的否定。

当然，流通的货币量保持不变，这肯定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当商品量的增长根据商品的价值从流通手段的积蓄（周转速度，贷款等等）那里得到补偿时，后者才是可能的。如果那种补偿不适合的话，那么追加货币恰恰就是来自那个黄金生产——对此，罗莎·卢森堡同志怀有毫无道理的仇恨。所以，她的问题——“新的货币资本是怎么跑到资本家的钱袋里去的？”——是不难解答的。它所以能到达他们的手中，是因为黄金生产者的 C，V 和 S 必须换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通过工人，换成消费资料）。无论怎样，“新的货币资本”从一开始就在她的“整个钱袋”里，因为我们的黄金生产者由于先天和后天所赐的原因而变成了资本家阶级的一员。（我们顺便注意一下，根据卢森堡同志的观点，黄金生产者是愚蠢的，同时又是奇怪的人，因为他一直拒绝他的产品成为黄金形式。）也许我们在此可以找到罗莎·卢森堡同志对他反感的理由吧？这里“新的货币资本”来源于黄金的生产，不管《资本积累论》的作者多么不喜欢它。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黄金生产，那么罗莎·卢森堡提出的问题（不是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而是：“我们倒要问：新的货币资本是如何进入到资本家的钱袋里的？”）简直是毫无意义，因为不存在“新的”“货币资本”，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进入”。

III 资本积累和“平均利润”

在这里卢森堡同志确实几乎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象一个橡皮球反弹一样又吓得跳开了。我们在上面已熟悉了她对部分实现这个问题的提法。这个问题不仅提得很可笑，而且回答得更可笑。事实上，让我们再一次介绍那段关键的段落，在这一段里，罗莎·卢森堡完成了她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惊险的跳跃。

问：“也许在连续实现私人利润时产生了利润的积累，而货币资本的总的数量甚至都不需要增长，因为所有资本家的‘总利润’这种东西并不存在于含糊的理论之外？”

答：“不。由于‘平均利润’构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平均利润的……理论’使第一卷中的价值理论有了具体的意义。”

这里充满了不确切和错误之处，使人真正地难堪。

首先，罗莎·卢森堡把实现和积累混淆起来了。实现就是指商品形式转化成货币形式，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因而实现是积累的先决条件。

第二，人们不能说实现利润，因为利润本身是实现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剩余价值经历了实现。

第三，把积累同货币资本的增殖混淆起来。实际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它早已以生产资本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再也不能被看成积累的要素，虽然它恰恰是实际积累的组成部分。

第四，关于“货币资本总数”的问题提得很含糊。可能有下列情况：

货币数量减少了（如果积蓄流通手段比增加商品价值更为重要的话，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货币数量保持原状（商品价值量的增长因流通手段的积蓄而得到补偿）；货币数量增长了，但同商品总量的价值的增长程度绝不相同（‘正常’情况）；货币量增长和商品量价值增长的程度完全相同。最后一种情况表明卢森堡的理论基础是荒谬的。如果罗莎·卢森堡曾确切地阐明这一点的话，她的例证的荒谬程度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了。

第五，罗莎·卢森堡十分武断地把实现的渐进特点这个绝对正确的观点同否认资本家的总利润的现实这个绝对愚蠢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罗莎·卢森堡“认为”或“发现”，这样的联系可以更容易地对付未来的对手的新的论点。但是，正因为她这么做了，她

就把通向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堵死了。

“资本家的总利润”是客观存在的实际的量。但是那绝不意味着人们必须把它看成是同时存在的一堆金子。罗莎·卢森堡同志根本没有弄懂这点。实质上，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它不只是包括黄金、甚至不是主要由黄金所构成，因为积累恰恰表现在把利润追加到资本中去，而它必须穿一件实际的工作服，即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单用这种方法，事物的实质，即价值增殖的过程就有了保证。在单纯的形式时，即被看作计算单位时，它作为货币的量而存在。但是，它的量对于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

我们将举例说明这一点，而这个例子是罗莎·卢森堡同志企图笨拙地用来为自己服务的。根据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平均利润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的核心。妙极了！但是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平均利润本身是引伸出来的数字，因为它是由平均利润率来决定的。（让我们顺便指出：这是上述发现的“核心”，而不是平均利润。这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的经济理论的精确性的特征。）“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①但是利润率是抽象的数量，它是这样一个分数 $\frac{S}{C+V}$ ，其中S是指社会剩余价值（和利润额），C+V指社会总资本。那么，这个利润率在哪种意义上是有客观性的呢？就社会规律来说，它是客观的，但不是指人的脑壳碰撞铁钱柜就会破裂这种客观。总利润也是同样的道理。它肯定不需要在任何时候（可以这么说在其各个部分）都采取货币形式，以使它体现在这个形式上，或者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起到客观的作用。但罗莎·卢森堡同志完全不能理解那一点。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77页。

IV 社会总资本和总利润

在罗莎·卢森堡介绍了我们在这里已考察过的实质性的论点后，她最后作了总结。她写道：

“问题仍然是：社会总资本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实现着总利润，为了实现总积累，总利润必须不断增殖。那末，如果这个数额的组成部分总是从一个钱袋流向另一个钱袋，它怎能增殖呢？”^①

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全面地衡量一下总的积累起来的错误。确实，它不断地随着罗莎·卢森堡从一边摆向另外一边，但是它的数量仍然持续地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新增加的不确之处，拐弯抹角之处，确实明显的错误，亦随之增多。

的确，社会总资本继续不断地产生总利润。总利润只以货币形式存在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按照特定时刻的先后顺序来论述实际存在的形式。

的确，资本家获得作为实现了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利润。但说这一实现是总的剩余价值的独特行动，那是不正确的。

的确，货币流通量通常在增长。但说资本积累必须以货币的增长为前提，那是不正确的。

的确，积累经过资本的货币形式阶段。但说资本的积累就是货币资本的积累，那是不正确的。

的确，资本积累通常伴随着货币资本的积累。但说资本积累等于货币资本的积累或者两者等值，那是不正确的。

如此等等。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82页。

V 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最后的旋转木马

最后，《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求救于臭名昭著的旋转木马（它必须“嘎的一声刹住”），正如她在前面证明“为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时偶而所做的那样。为什么必须刹住呢？不仅由于获得货币有困难，而且由于商品量将停止增长，因为商品量增长本身包含着“归纳出来的利润（应读为‘剩余价值’。——尼·布）的实现”。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引用有关的段落，因为她在攻击的同时，表现出溃退的全部迹象。罗莎·卢森堡写道：

“从 A 到 B，从 B 到 C，再从 C 到 A 和 B，出售不断增加的商品和实现利润，只有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最后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之外找到一个市场的时候才能发生。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旋转木马转上几圈后就要停止。”^①

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信贷增长的周转速度同商品量的增长速度相同，肯定就不会停止。同量的货币将促进必要的实现。货币将周转得更快些。就这样。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罗莎·卢森堡设想——就她个人而言——如果一个资本家在“圈子”之外实现了他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这又怎么样呢？

事实上，我们假定我们有资本家 A、B、C、D、E、F 等等，供实现用的剩余价值就将分别是 a, b, c, d, e, f, 等等。

我们就得出这一组：

A……a

B……b

C……c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 83 页。

D.....d

E.....e

F.....f

那末，总的剩余价值就是 $a+b+c+d+e+f$ 等等。

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其中一个资本家——譬如说资本家F——离开了这个“圈子”，“在另外一边”实现了这个量f。但是，供实现用的剩余价值的总数是 $(a+b+c+d+e+f+\dots)$ 等等。那么资本家是如何实现这个总数的呢？（因为罗莎说，只要一个资本家离开这个圈子，他们就能够实现。）

如果罗莎回答说它是可能的，因为f是从一个钱袋游荡到另一个钱袋的话，她就放弃了她的主要立场。不可能作出不同的回答——不存在别的答案。这里我们面临着一条撤退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溃窜。根据这种解决办法，就找到了卢森堡同志的整个论证脉络——单个资本家可以实现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不可能实现，如此等等。

但是那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如果转换率同商品数目的增长不相等的话，追加货币便通过黄金生产者到达流通渠道，而产品（包括追加的产品）具有黄金的物化形式，因而圈子就被打破了，如果这种突破真正成为必需的话。但是正象我们已在上面看到的那样，并且根据上述理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设想追加的货币量必须同将要生产出来的追加的商品量相等，那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此，罗莎·卢森堡的基本错误是，她把总体资本家看作单个资本家。她低估了这个总体资本家。所以，她不懂得实现的过程是逐步发生的。由于同样的理由，她把资本的积累描述成货币资本的积累。

我们相信，由此产生了她解释帝国主义的方法。的确，如果

总体资本家等于典型的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当然就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消费者。此外，如果增加的黄金数量同增加的商品数的价值相等，这个黄金只能来自国外（因为设想生产相应的黄金显然是无稽之谈）。最后，假如所有的资本家必须立即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从一个钱袋游荡到另一个钱袋，这是严格禁止的），他们需要“第三者”，等等。

我们在第一章内用最抽象的提问形式讨论了卢森堡的理论。在那一章里我们还未涉及货币问题。罗莎·卢森堡的关键的问题是：“为谁？”我们已经表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十分满意的答复。

在第二章内，通过分析货币问题，我们向着具体的现实跨进了一步。在这一章里，罗莎·卢森堡已经提出谁来支付和通过支付可能会产生什么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抽象分析的第二阶段里，我们又揭示了她的基本的错误和个别的谬误，从而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下一章的意图，是要通过分析平衡失调来使我们朝现实更跨进一步。平衡失调是运动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结果，这点我们暂时从略。

第三章 市场的一般理论 和危机

在我们转到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前，我们必须从市场理论的角度，简略地讨论一下我们分析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考察了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和作为再生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总之，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马克思极为清晰地阐述如下：“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①

人们必须知道，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对问题的提法的全部不同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积累是可能的，实现剩余价值是可能的，扩大生产是可能的。但是，这些过程不是进行得很顺利的，而是在矛盾中完成的，既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持久的变化中暴露出来的矛盾，也有在激烈的骚动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本身，代表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根据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事情是截然不同的。根据她的说法，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从一开始（从推论而言）就是不可能的，只要人们讨论的是纯资本主义社会。罗莎认为，马克思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546页。读者们应注意：这段引言是摘自《资本论》第3卷。根据罗莎·卢森堡，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的意见，它应包含着同第2卷中的公式相对立的成分。

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飞跃”和痉挛形式的东西，矛盾剧变形式（生产过剩的危机）的东西，在实质上是工业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内的永久的现象。

这个观点早就遭到马克思的批驳。

“这里必须做出一个区别。（马克思写道）当亚当·斯密由资本过剩，由资本积累说明利润率下降时，他所说的是一种永久的影响，并且这是错误的。但资本的暂时过剩、生产过剩、危机，是一种不同的事情。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①

让我们顺便提一下这一有趣的事实：列宁同志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前几年，就已经阐述过完全相同的观点：“在任何地方我也没有说过，这个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尼·布）应当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在对此所作的脚注中他说得更确切：“我强调经常，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②

因而，从方法论上来看，在考察这个问题时，首先把危机排除在外，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这些危机也必须加以分析。

从而，我们看到“消费的界限”已被生产本身所扩展，这增加了（1）资本家的收入；（2）工人阶级（追加工人）的收入；以及（3）社会的不变资本（执行资本职能的生产资料）。我们已经有机会使我们自己相信，罗莎·卢森堡拒绝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符合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现在，这个论点本身并不很有说服力。总之，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马克思确实说过，常常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私设的酒店可以找到橡子。”^③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74页注。（最后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② 答普·涅日达诺夫先生。《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41页。

③ 橡子：栎树的果实，长圆形，含淀粉，可以酿酒。——译者

然而，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这点上具有和罗莎·卢森堡同样的观点，再则，我们还没有对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市场理论进行明确的批评，所以现在该是我们对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考察的时候了。我们似乎更有必要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中，卢森堡同志的谬误就会表现得更为清楚；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可以得到更精确的阐明。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澄清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彻底地摧毁和撕碎了这样的教条，即产品的（交换）价值转化成收入，而且仅仅是收入（即工资、利润和租金）；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它就是占主导地位的。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生产一起构成了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部分。此外，这一点是同市场理论直接相关联的，因为同消费者市场一起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生产资料市场，它同生产性消费相适应，而同私人消费不相适应。同样，这种情形对资本积累的理论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资本积累以不变资本的增长为前提，同可变资本相比，处于渐进的关系，如此等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理所当然地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主题，而这是罗莎·卢森堡同志完全没有弄懂的。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把这个完全正确的理论作为他的出发点，并且开始使之变得更为“深刻”。

“从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所作的图解式的分析（他写道），不可避免地推定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范围，当然决不由社会消费程度来决定。如果机器代替了工人，当然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就会倒退。但是，这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同样，从私人消费基金中得到的资本家的收入转化为资本，导致对消费资料需求的减退；而这由于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而得到补偿。一般来说：按比例地分配社会生产不可能引起消

费者需求的任何倒退，以致产品在市场上的总的供应超过了他们的需求。”^①（着重号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加的。——尼·布）

单单这一段就明白无误地包含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的所有逻辑上的矛盾，它的全部的“独创性”和“似是而非”，这一理论的实质表现在这一论断中，即在消费者市场同社会生产之间不需要有联系。

但是，上面这段引言，初看上去象是无关的“琐事”而不被注意，但是它却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作出了下面一系列的断言：机器替代了工人，机器的消费替代了人的消费——问题就解决了。一个补偿了另一个，从而取得了平衡；第四等级的解放，被生产资料的生产的解放所替代，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已永远地脱离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即使它完全无助于提高这位已故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声誉，但还要指出，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简直是太随便了，因为他避开了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使用一台机器，结果是产品的生产得到扩大，这些产品是用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又将怎么样呢？被使用的这台机器的价值同这些产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换句话说，从市场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市场之间是什么关系？图冈没有对前两个问题作出答复。他只是把这个基本问题压了下去；结果，他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这是毫不奇怪的，注意，他对这个结论感到过份地自豪：^②既然有生产资料市场，生产就独立于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著《周期性工业危机》第4版第205页（俄文版）（1923年斯摩棱斯基，斯摩棱斯基政府委员会的文学合作社出版）。此外，这个版本有史沫斯科夫同志的序言，它表明了普遍的无知，而且马克思主义者据此拒绝了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的论点，和马克思没有提供“合法的（?）和详细而透彻的危机论”的论点，等等。我们似乎正在亲眼目睹一批业余理论家开始泛滥。他们认为他们只需这样一种信念的指引便能取得成就，即单是勇气就能移掉大山。

^② 此句的德文是 nicht wenigst stolz als der Neger auf sein Nasenring——原译者

消费市场之外。

让我们来考察问题的核心。市场的结构完全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考察。

首先，让我们把社会资本看作商品形式的资本，即卢森堡同志的“商品堆积”。客观上讲，这个商品堆积分成两大部类，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消费资料。

因此，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各种商品及其各自生产部门的共存。在这样考虑时，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必要的技术——经济联系是隐蔽着的、掩盖着的和看不见的。其原因十分明显。因为，这里的生产资料不是指用来生产同时存在的消费资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料。我们的生产资料将仅仅在下次资本周转时用于消费资料的生产。消费资料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们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已被使用掉，因而在市场上没有了；它们的价值（在这点上，价值指的是全部价值，或仅是部分价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已转到消费资料，并与之相结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商品堆积和市场，不但不能澄清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必要联系问题，而且只能使它变得含糊不清。

其次，第二个观点产生于对各生产部门的相互关系的调查。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讨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每个部门为其它部门提供原料，直到我们经过一系列阶段生产出供直接消费的成品为止。

这里，社会的整个生产机器——完全同现实相一致——基本上只是一部用来生产人类消费资料的机器。不管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有多大，它们都是以生产消费资料的初级阶段出现。发达的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使这个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早已准确地证实的那样，个别生产部门之间暂时的衔接（作为消费资料生产过程的阶段，这个过程必须是统一的），被

空间的安排所替代。产品同时存在于制造的不同阶段。所以我们讨论的，不是可以找出其起源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不是从卵开始。这个过程并不是这样的，例如，首先只获得矿石、煤或棉花，然后，只制造机器，然后只生产棉纱，而最后只生产布匹。不是的，所有这些部门同时生产。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依赖关系，即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各部门的相互依赖。

因此，在市场问题上，满足于第一个观点，即不问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去调查市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尽管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搞了许多“模式”，但他基本上正是按第一种方法来阐述这个问题的。我们将更加详细地努力说明这一点，尽管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愚蠢地把这个问题搞得糊里糊涂，以致需要一篇专门的论文来系统地批驳它。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市场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就它们的价值而言，生产资料部分相对增长，而消费资料部分则相对减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日益增多的社会总劳动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当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装腔作势地谈论这些真理时，他只是在剽窃马克思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深化”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就是它显示出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原来”的意见。

因而，就其价值而言，生产资料部分出现了相对的增长。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体现在产品上——消费资料有巨大的增长。资本的有机组成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投放到市场上去的消费产品量就越大。此外，产品的个别单位价值下降了。让我们回到上面引用的图冈的一段话（以机器的使用为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讨论的不仅是这个事实，即吃肉的工人消失了，

而代之以耗煤的机器，而且是这样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不很重要，而是更为重要），即用新机器生产出来的那些产品的巨大的商品量被投放到市场上去。无论如何，那已把我们引出了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图冈并不懂得这点。他写道：

“然而，不存在剩余产品，因为在这点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完全替代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事实是，为了能够进行工作，这个机器，同工人一样，需要一定的经济上的开支。例如，假定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机器取代了工人的话，工人阶级对消费资料的社会需求就减少了；另一方面，对机器本身的需求和对为使机器运转而必须的一切东西（例如燃料、润滑油等等）的需求就增长了。总的结果是，商品市场没有收缩。已经变换的一切，是市场需要的商品种类。这样，有可能使社会财富（体现在由社会掌握的产品量上面）在社会收入下降时得到增长。”①（着重点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加的。——尼·布）

我们已经提到，采用机器生产“某种产品”，必定使“这种产品”量增长。但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不想了解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东西。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提到。我们的马克思的批评家承认，对燃料、润滑油等等的需求增长了。但是我们要问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增加出来的燃料和润滑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福分！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明白无误地料想到在这一生产部门中生产的扩大（在这点上和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从而就有追加的工人，即对包括“某种产品”在内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加了，只要这个“某种产品”背后隐藏着某种属于工人阶级的消费资料的东西。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结果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 205 页。

完全不同。经过仔细地分析之后证明：(1) 生产资料的增长引起消费资料量的增长；(2) 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的增长促使对这些消费资料产生新的需求，其结果(3) 生产资料生产的特殊水平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十分特殊的水平相适应，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市场同消费资料的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得出了同图冈先生如此自信地称之为“最新”政治经济学上最惊人的发现相反的结论。从最初表述的观点来看，各工业部门在以后的资本周转中发生的事，同市场分析是无关的。至多对那些同特定的部门直接有关的资金的周转进行考察(然而是非常片面的)，结果人们就不可能理解生产过程的“客观含义”。

事实上，如果人们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的话，而且只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只能得出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式的结论。假定我们在铸铁工业内部建造一个宏伟的机器制造厂。煤和铁的消费就大大地增长了。事情是否到此为止了呢？根本不是。只要我们朝着只分析过程的最初阶段的方向走下去，我们实际上就会陷入这种幻觉：机器工业消费煤和铁，而矿山工业消费机器，结果全部“工作”是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圈圈内进行的。一旦当我们知道个别生产部门之间的生产关系时，情形就不同了。机器工业制造出数量越来越多的机器。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例如在纺织品工业中，即使少量的工人也可以加工数量“大得多”的棉花和其它原材料，从而生产出相当大量的成品，即亚麻布，一种直接消费的物品。随着商品量的极大地增长而来的，是它们的价值的增长(尽管绝对不成比例)，因为消费资料的成品的价值不仅仅反映出生产消费资料的那些工业部门所花掉的劳动，而且也反映出自动转化到这些部门的原料、机器等的价值。

因此，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认为可以把任何数量的劳动和资料塞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好象它是一个无底的桶一样，

并且认为一切事物然后都发展很顺利，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市场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没有依赖关系，这是十分荒谬的。

（“消费者的需求的减退，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不能够造成总的供应的剩余。”）

图冈的荒谬的信念达到了疯狂的乌托邦的极点，他十分厚颜无耻地把这种乌托邦向他的尊敬的读者们说得娓娓动听。很明显，他的确为此感到骄傲。下面就是那段臭名昭著的引文：

“但是，会不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相对地取代了人的消费而造成在市场上没有它的地位的剩余产品？当然不会。设想出一个新的模式是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明确地证明最广泛地用机器代替工人本身不可能造成任何机器过剩或者毫无价值，这也是件简单的事。即使除去一个工人外其他的工人全被机器所代替，这一个工人也能使整个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而且在这些机器的帮助下，生产出新的机器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资料。工人阶级就将消失。但是那一点也不会阻碍实现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资本家将掌握大量的消费资料，而一年的全部社会产品将在下一年里被生产和资本家的消费所吞掉。但是，如果资本家出于积累的愿望而约束自己的消费，就没有东西可以制止它。在这种情况下，为资本家生产的消费资料将得到限制，结果社会产品的更大的部分将是供进一步扩大生产用的生产资料。例如，煤和铁将被生产出来，并被用来进一步扩大煤和铁的生产。第二年，煤和铁的生产的扩大就会消费掉前一年生产出来的煤和铁的数量，等等，如此循环不已，直到这种矿物的自然资源最终消耗殆尽为止。”^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一位圣人和超人，用下面振奋人心的演说来装饰起他那迷人的幻想：“所有这一切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的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12页。

确它甚至看上去完全是废话。很可能是这样。真理不总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真理终究还是真理。”^①

让我们把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这个“真理”连同它的不合逻辑的推理一起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图冈所举的事例中，我们讨论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想象的，高得无法估量的资本的有机组成。但是让我们暂时接受图冈的假设。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消费资料（表现在产品上）的生产越来越庞大，大到“资本家”自然而然地不能够把消费资料的勃朗峰^②全部消费掉。

这点正是图冈天真地忽略掉的，因为他看不到整个生产过程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逻辑。照他的看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主的、独立的领域，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桥梁。事实上，两者必居其一：要么煤和铁的生产只是为了生产煤或铁，要么生产煤和铁也是为了制造机器，维修铁路，纺织工厂，酿酒厂和电力等等。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分，这部分从其性质上来讲同社会消费毫无联系。在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说）和下列情况之间一点区别也没有；这个情况是指根据布尔加科夫的著作：《经济的哲学》（“世界是经济的世界”），疯子西米昂·史多尔泼涅克认为他自己是一位拥有世界的资本家，因为这个世界属于他的经济范畴。那么宇宙的“新陈代谢”就是同时生产。愚蠢的西米昂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限制，以实现自动的“积累”，因而整个过程和人类消费的关系将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例子中的煤和铁“生产过程”和人类消费的关系一样。图冈仍然保留“一个工人”以完成这篇鬼话，这对问题是毫无影响的，因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12页。

② 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译者

为如果这“一个工人”受命于他的聪敏的老板为生产煤铁去生产煤铁的话，其经济意义将同他被迫整天对着天花板吐唾沫一样，也许他，或者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如果生产煤和铁不仅是为了扩大煤和铁的生产，而且也是为了给机器工业和投放到消费市场上去的半成品或制成品工业各部门，提供原料和燃料，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极大的扩张将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投入市场的消费资料的巨大增长。如果对这些消费资料没有需求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灾难性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遭到了我们的“自相矛盾的”图冈的否认——就一定会伴随着原始暴力而出现。

图冈在这一混乱的基点上进一步建立起了一整套论点，这些论点只能增加混乱。

例如，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最重要的论点之一：“一般说来，按比例地分配社会生产不可能造成消费者需求的任何衰退，以致于产品对市场的总的供应超过了他们的需求。”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按比例地分配社会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它包括不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呢？

如果所需要的比例也是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如果这种比例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存在同消费市场的联系。但是，认为任何“消费需求的衰退”都不可能引起生产过剩和造成剩余产品，这是荒诞无稽的，因为消费需求的衰退，关系到消费资料的供应的减少，意味着比例关系的破坏。（我们回忆一下列宁说的话，“但是某种状态的消费，是比例的要素之一。”）但是，如果这种比例关系不包括在内的话，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仍然是个谜。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由于它的市场和生产的无政府性质，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

其本质上来讲，通过一整系列的生产环节，同消费资料的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必须被包括在内。

因此，“按比例地分配社会生产”，是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中读到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他说：生产煤铁是为了进一步生产煤和铁。那么机器工厂靠什么来维持呢？他们从哪儿弄到煤和铁呢？很自然，他们通过后者的生产得到煤和铁。因而在煤和铁的生产同机器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完全相同的联系，也存在于机器的生产和纺织品、化学产品等等的生产之间。因为，所生产的不是抽象的机器，不是机器“本身”，不是柏拉图式的对机器的“想法”，而是极为具体的机器，它们必须用于十分具体的生产目的。换句话说，这里价值关系，正象马克思说的那样，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要不然，社会生产的比例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沿着生产全过程的整个战线，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递交足够数量的产品。从这一观点来看，很显然，原材料的生产，机器的生产，半成品的生产以及消费资料的生产均能破坏比例关系。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写道：

“由于按比例地划分社会生产，任何社会消费的衰退都不能造成剩余产品。我认为，社会产品的人民消费部分的持续衰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倾向；然而，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矛盾的，它一点也不会妨碍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①

显而易见，这篇文章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生产资料部分（价值）的增长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我们将立刻分析这个确实幼稚的混乱状态。但是首先将再引用一段文章，这段引言意外地将图冈的全部理论概念显露出来：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13页。

“资本主义经济（过于聪敏的图冈，那个商品经济的鉴赏家解释说）——马克思对其本质并不完全清楚——同和谐的经济相比，资本家阶级可能把大得多的一部分社会产品（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尼·布）转换成生产资料。由于生产者协会的存在，生产目的就将是最广泛地满足社会可能的需要，它将彻底地排除这种状态，即生产的扩大也并不伴之以社会消费的扩大。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进步倾向于用生产资料（的消费？）替代人类的消费，这是不利于社会消费的。”^①

所有那一切全是废话。生产资料部分在资本主义经济里，要比在“生产者协会里”增长得快，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客观上限制了这“部分”的增长，因为当劳动力价格低廉时，就没有足够的刺激因素，促使资本家引进新机器。那是经济学科学的起码知识。同所有以前的社会结构相比，当然资本主义无与伦比地刺激了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部分的增长。但是，同“生产者协会”相比，资本主义是经济上反动的制度，就是因为它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部分”（价值形式）的增长，不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表现。因而，上述的那个部分（转化成劳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增长得更快，而且正由于这个原因，将保证使用价值的巨大的增殖和多样化。

如果积累进行得更慢些，消费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将不会因为生产力发展得太快和用机器替代人力劳动而受到“责备”，但将因下列各点而受到责备（当然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只是同我们的主题直接有关的那些问题）：

1. 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结果，生产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12页。

资料部分也得不到足够的增长。

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分配是“不妥当”的（非生产性消费）。

3. 资本主义存在着消费的双重预算制度（奢侈品生产和资本家的浪费等）。

因而，图冈断言，资本主义的“罪过”在于这一事实，即人的消费被机器的消费所取代，这是荒诞无稽的。问题的实质是十分不同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基本论点。

经过我们的评论之后，就不难揭露图冈先生的天真的混乱状态。和生产资料部分相比，社会消费部分的下降是一个事实。但是，资本主义的“困难”并不寓于这个事实（社会主义甚至更具有这个“特性”）。困难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结构——在这个结构内，生产是不受控制的（即整个社会的比例失调），在这个结构内，推动积累的刺激物促进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朝着生产（被迫超出了应有的比例范围）同社会消费发生冲突的状态发展。但是，把消费缩减到一定的水平以下，确实反映了均衡的破坏，不管社会消费下降了多少。

在这儿我们遇到危机的理论。但是在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将首先试图总结一下我们对图冈所作的评论，这将在理论上加以描述。由于图冈先生仍然有一定的名望——尽管确实很难找到一个作家，请原谅我所说的，象这位先生一样完全没有理论修养——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这位先生以同无产阶级调情开始了他的事业，而又以拜倒在将军们的皮靴下结束了他的事业。

图冈先生理论上的抱负的“总的格言”表现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赤裸裸的辩护及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斗争。其它一切都是从属于这些格言的。因而这位尊敬的教授的全部“作品”中充

满了绝对不能容忍的折衷主义。

事实上，他在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作斗争时马上采取了同波姆·巴沃尔克^①的边际效用论“调和”的立场，这就是：“新理论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它有可能从一个基本原则出发，对定价过程的所有方面作出完全而彻底的解释，并一劳永逸地结束对价值的争端。”^②

众所周知，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消费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而这些是由边际效用来决定的。^③图冈也知道那一点。在《基本特点》一文中他写道：

“生产资料的价值取决于这一生产资料的边际效用，而这个生产资料少于用体现为最低边际效用的一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全部物品。”^④

但是，现在图冈又接受了一项新的进行辩解的“委任”。他必须证明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毫无矛盾，证明消费的减少也不能够瓦解资本主义生产。“为煤、铁而生产煤铁”。

但是对不起：在那种情况下，价值理论又怎样了呢？全部价值理论建立在使用物的效用^⑤上。按照波姆·巴沃尔克的见解，煤和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成熟的麻布、皮靴和粮食！这就是“有可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对于价值的争端”的理论的真相！试着解释一下煤和铁的价值，它们不会长成任何种类的使用物！一个襁褓

① 尤金·范·波姆·巴沃尔克(1851—1914)奥地利人，十九世纪末奥地利学派领袖，三度出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以后在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教。两部主要作品是《资本和利息》以及《资本的实证论》。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结束》一文中，批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②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第2版（1911年彼得堡）第45页。

③ 奥地利学派。发展了价值的边际效用论。魏瑟和门格尔是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布哈林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对这一学派作了分析。

④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第45页。

中的婴儿也能看出图冈在发挥相互直接矛盾的两种“系统”的观点。如果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逻辑的话，它只是理论上的骗局的逻辑，它欢迎一切能够使陛下的资本合理化的手段。

为了继续下去，图冈先生需要“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他不仅可以承认马克思的关于社会消费部分缩减的理论，而且同时使马克思变得更“深邃”，并且用介绍生产资料的生产独立于社会消费的论点来篡改马克思。他写道：

“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里的市场规模由社会消费程度所决定——只能扎根于科学，因为经济学家从来不使用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考察的方法。”^①

但是，现在图冈先生突然又接受另一项“委任”。他要证明，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事情绝非象讨厌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糟糕。图冈先生刹那间又制造了一个相对立的理论，这就是：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起社会总产品额的增长（注意：按劳动价值）。这个剩余产品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因而社会全部收入可以在生产资料部分缩减的同时得到增长。”^②

因而，生产资料部分下降，收入部分上升。这个道理并未被理解，因为“对于近代政治经济来说，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产品的份额同时增长——但不是以缩减其它阶级的社会产品的份额为代价——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点上它没有超出李嘉图的范围。产生这种明显的不可能性的唯一原因是近代科学认为总产品只包括消费资料。”^③

^① 《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05页。“我认为人民消费部分的逐步减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倾向”，第213页。

^②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第441页。文字内容和附加的图解表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劳动价值。读者将会在我们对分配理论的研究中找到有关这个题目的更详细的材料“没有价值的经济”，《新时代》1913年第14期（第1卷）。

^③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第440-441页。

但图冈实际上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1)，收入（按劳动单位）以生产资料部分为代价任意增殖！所以现成的解释总是可以信手拈来。一切都可以任意发表。一会儿说生产资料部分增长了，因为这是劳动生产率的表现。一会儿又说，这一部分的“减少”出于同一个原因。

当然，图冈的这种笨拙的辩解性的摇摆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幸的是，罗莎·卢森堡同志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马克思本人的概念（《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均有论述），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辩护性立场混为一谈。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批评（以及十分荒谬的歪曲）是错误的；但是，这毫不意味着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就没有过错。图冈的错误不在于他认为实现是可能的，而在于他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联系分割开了。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不在于她坚持这种联系，而在于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实现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必须转到一般地论述危机问题。

我们已经看出图冈关于市场和实现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有如天壤之别。但是，罗莎·卢森堡同志不断地指责《资本论》第二卷的模式导出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是同《资本论》第三卷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

他写道：

“……最后，这个模式又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表述的资本主义总过程及其经过的见解相矛盾。提出这个见解的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的生产力的无限膨胀能力与社会消费的有限膨胀能力之间的内在的矛盾。”①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9页。

在另一个地方她又写道：“社会消费能力，就表式上所说明的那种再生产过程来看，丝毫没有限制生产。”^①

最后，在第三段引言中她写道：

“模式是承认危机的存在的，可是，那完全是因为生产内部比例失调之故，即缺乏社会对生产过程的统制之故。另一方面（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它排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由资本积累而生，它爆发为周期性危机，并且驱使资本向不断扩大市场迈进。”^②

如同我们早已提到过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谈到了危机问题。我们打算在介绍过程中——它将使问题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初步的理论性的意见。

众所周知，我们在这儿谈到的危机问题是指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这方面，出现了下列问题，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明确地作出了答复：

1. 局部或普遍的生产过剩

问题是，商品的生产过剩可能是普遍的呢，或仅是局部的。李嘉图和萨伊学派，从商品同商品的简单的交换这一前提出发，否认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克思很有说服力地证实了（在《资本论》第二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里）普遍的生产过剩是可能的。例如，如果我们有最重要的消费资料生产过剩，那么必然也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

“因为铁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煤炭的生产过剩，正如织物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纱的生产过剩一样。……所以说不上这类商品的生产不足，因为这类会当作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生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71 页。

^② 同上书，第 273 页。

产资料加入到那些正好有生产过剩待我们说明的商品中去的商品，已经包含生产过剩了。”^①

因此，只要存在着生产过剩，（在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说煤对于铁等等有生产过剩，即不能说一个生产部门有相对生产过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生产部门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预备阶段”。人们更不能说煤对于铁有生产不足，即认为铁生产得过多是因为煤生产得太少了，因为没有煤的相应的生产过剩，铁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就使我们刚好又回到在批评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时早已阐明过的那些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摆脱了消费的市场，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此循环中，一个生产部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或者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图冈在他的激烈的幻想中所描写的那种奇怪的生产制度的话，那么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面前就会只有一种摆动：铁的生产过剩意味着煤的生产不足；反过来，普遍的生产过剩，即煤和铁同时生产过剩，就如同要一个秋千的两端同时升起那样的不可能。如果我们遵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一正确的理论，而不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我们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那末，我们就有了一连串的有联系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彼此相互提供市场，它们遵守着由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经济的连续性决定的某种秩序。但是，这根链条到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就截止了，因为它再也不以物质形式，即作为使用价值，直接进入任何生产过程而是进入个人的消费过程。（我们暂时先不管这一事实，即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消费过程是劳动能力的生产过程，这点将在以后讨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613页。

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马克思的模式中所讨论的生产过程的两大部类。)结果，人们确实可以设想到一种情形，即在我们面前存在着这根链条的各个环节上的生产过剩，它表现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过剩，即表现为同消费市场有关的生产过剩，这恰恰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表现。

马克思在批评萨伊——他说需求只受到生产的限制——时评论道：

“聪明极了。当然受限制（生产方面的）。对那种不能适应需要生产出来的东西或不能现成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东西，是不能有需要的。但不能因为需要受限制于生产，便得到结论说，生产受限制或曾受限制于需要，并且永远不会超过需要，尤其不能超过那个适应于市场价格的需要。”^①

2. 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绝对过剩

此外，人们必须知道，人们只能说生产的相对过剩，即只能说生产对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而不是对于社会绝对需求的生产过剩。这点在我们面前的复杂的问题中完全没有加以分析。

“生产过剩和绝对需要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和那种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问题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和绝对需要或占有商品欲相关来说的生产过剩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局部的生产过剩和全面的生产过剩，都是不存在的。它们相互间也没有任何对立的地方。”^②

马克思在另一处同样精确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不过按一定的价格是过剩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128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86页。

的。这时候，商品能被市场吸收的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引起破产的价格。”^①

3. 商品的生产过剩，还是资本的生产过剩

李嘉图的追随者们，不同于李嘉图本人，肯定地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坚决地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但是，很显然，如果没有商品的生产过剩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生产过剩。因为资本的生产是指什么呢？资本的生产过程明白无误地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而不是在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的生产过程。所以资本的生产是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生产。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也是商品的生产过剩。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只是证明：“一种轻率的胡涂思想，以至在同一现象叫做a时被认为是存在的和必然的，在叫做b时又被否定。”^②

4. 暂时的生产过剩和永恒的生产过剩

从我们对于卢森堡的立场，民粹派们和西斯蒙第们以及其他混淆主义者的全部批评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也是毫不含糊的。我们在这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这点（也谈到了列宁在这点上的立场）。所以，我们最后再引一段也就够了。马克思在讨论普遍的生产过剩问题时说，仅仅的局部的生产过剩的观点只是“一个可怜的遁词。首先，如果我们只考察商品的性质，其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妨碍所有商品在市场上出现过剩……在这里，问题正好只是危机的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84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77页。

素。”①

换句话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或者——同这是一回事——普遍的生产过剩，只是一场危机而已。这一立场同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按照罗莎的观点，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过剩必须随时表现自己，因为扩大再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而，只能说生产相对过剩。但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满足需要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涉及到生产不足。不仅局部的生产过剩是可能的，而且普遍的生产过剩也是可能的，这恰恰包含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个生产过剩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也是商品的生产过剩。但是，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可以经常观察到的永久现象，而是危机的表现。“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马克思）

如果我们把同我们有关的最重要之点分开，我们就得出下面理论上的结构：

I 调和论者（萨伊及其一伙）和辩护士：从来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

II 西斯蒙第们、民粹派们、罗莎·卢森堡：必需始终有普遍的生产过剩。

III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生产过剩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

或者在不同情况下：

I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希法亭等等：由于单个生产部门之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83页。（后面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间的比例失调而产生危机。消费的因素在此不起作用。^①

II 马克思，列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生产比例失调造成危机。但是消费的因素是这种不平衡性的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必须更详细地分析这些基本概念。

我们已经引述了罗莎·卢森堡反对马克思的模式的一个论点，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的观点。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模式“肯定地承认危机(1)，但是，把其原因完全归结于缺乏生产的均衡性，即（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缺乏社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她紧接着又写道：“另一方面（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它排除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的能力和社会消费的能力之间的深刻而基本的矛盾……”（参看上面的引言）很容易看出，罗莎·卢森堡同志在这里把控制生产同生产和消费的联系对立起来，因此也把生产的不均衡性同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均衡性对立起来。这个概念促使她造成无数的错误和难以想象的混乱。

让我们设想三种社会经济结构：集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秩序下，资本家阶级联合在一个统一的托拉斯内，而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有组织的，虽然同时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又是对抗的经济；然后，马克思所分析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

^① “然而这些模式（马克思的模式——尼·布）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里，再生产可以在简单的和扩大的水平上没有障碍地进行下去，如果这些比例关系得以保持的话。另一方面，如果比例遭到破坏，简单再生产也会出现危机。……因而，这不等于说，在资本主义生产里，群众的内在的消费不足必须产生危机。……同样，商品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并非产生于模式本身；而是每次扩大生产——它无论如何产生于现有的生产力——看来都是可能的。”（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版（1920年维也纳）第339页。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公平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是图冈先生也承认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尽管只是“作为局部的生产过剩的特殊表现和在货币经济关系下社会劳动分配不平衡的特殊表现。”（《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65页。）

会，最后社会主义社会。让我们进一步探索(1) 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方法，从而，使“积累”成为可能的因素（我们在“积累”一词上加了引号，因为“积累”的定义就其本质来看只是以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的）；(2) 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从哪儿产生的以及何时产生的。

1. 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积累是否可能呢？当然可能。不变资本因资本家消费的增长而增长。适应于新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出现。尽管存在某种限制，工人的消费在增长。尽管存在群众的“消费不足”，危机不可能产生，因为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所有生产部门的相互的需求，同样也提出了消费者的需求，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从《资本论》的角度来看）合理的计划取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如果生产资料“计算错误”，就会有剩余，而在下一期生产中将作出相应的更改。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消费资料“计算错误”，多余部分将作为“饲料”在工人中分发，或者产品的相应部分将被销毁。即使在奢侈品生产计算错误时，“出路”也是清楚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家的消费为生产和生产的计划提供了刺激。因此，生产的发展不会特别快（资本家的数量小）。

2. “典型的”资本主义。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积累是怎么可能的。同我们刚才谈到的情况相对照，这里存在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通过市场的货币联系，工资形式等等。如果我们取“理想的平均数”，这个任务的解决方法就会和第一种情况相同。（不变资本的增殖，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的增长——按价值计算）同第一种情况相反，“理想的平均数”在这里仅仅是某种倾向，它表现在经济过程的矛盾和盲目的道路。另一方面，购买和销售的形式以及购销分离（同产品和产品的交换相对照），本身就是干扰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条件。其结果如下：

第一，根据经验，生产部门间的均衡性不可能存在。它仅仅作为一种倾向在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均衡性以不断地受到破坏的方式在发生作用。

第二，这种干扰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因为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货币和市场来实现的。

第三，由于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有效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同社会消费之间可以存在比例失调。（这里的需求不是作为有计划的需求而事先提出，整个关系只能是事后的结果。）

第四，由于货币和市场联系，比例失调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干扰。（这里，剩余不能够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被当作“饲料”用于工人身上。）

第五，这种资本主义一方面不断地推动迅速发展生产的倾向（存在着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没有的竞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推动压低工资（后备军的压力）的倾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倾向是使生产超出消费的范围。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的生产出现过剩并从外表上表现为消费资料生产过剩时，这种比例失调才会出现。在这一现象发生之前一切均可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剩余”的膨胀波浪绕过了生产的中间环节，在这些环节上还不可能发生个人消费上的冲突。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而且是没有按有关比例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罗莎·卢森堡的断言相反，实现剩余价值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它确实不可能；那末，我们就触及到一种危机“……所以，是再生产的规模过大，和单纯说生产过剩本来是一样的。”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616页。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我们现在谈谈社会主义社会。

3. 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采取“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危机；然而，生产资料部分将比资本主义统治下增长得更快，因为在这里机器是在某种关系下引进的，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意义的。

但是，恰恰由于那个原因，整个社会的广大群众的需要比在前面提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情况得到好得多的满足。

由此，不难估计出罗莎·卢森堡同志脱离真理有多么远呀！马克思在评论一本反马尔萨斯的小册子时写道：

“所以，这里假定，(1) 资本主义生产，在其中，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及其增加，不是直接由社会的需要调节和统制，而是由每个资本家所支配的生产力，在与社会需要独立无关的情况下去调节。(2) 又假定，尽管如此，生产还是按比例进行，好象资本本来就是直接由社会，适应于它的需要而被用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一样。”

“按照这个假设——假设资本主义生产绝对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生产，不过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设——实际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发生。”^①

换句话说，如果存在计划经济，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的思想在这点上是十分明确的：克服无政府状态即制定计划，同消灭作为一个特殊因素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的；它被描写成包含着消灭这种矛盾。但是，在罗莎·卢森堡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方面“缺乏生产的平衡性，即缺乏社会对于生产过程的控制，”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能力和它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卷第127页。

的消费能力之间的深刻而基本的矛盾”——这点可以在上面引述的论述《资本论》第二卷的模式段落中看到。而罗莎·卢森堡声称第二卷中的模式承认危机完全是由于缺乏生产的平衡性，即缺乏社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罗莎·卢森堡直接地把这个因素同另外一个因素对立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的思想是很精确地阐明的。在引述的这句话下面她写道：“另一方面，它（指第二卷中的模式——尼·布）排除了深刻而基本的矛盾……”等。对明显的错误立场，再也没有比这阐述得更确切，表达得更清楚了。

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可以得出：在计划经济里，假定存在“群众的消费不足”，也会产生危机。也就是说，按照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在我们假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危机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表明不可能有危机。^①但是那不是那么难理解的。实际上，经济的无计划性，它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生产的单个部门之间没有比例，生产规模和个人消费规模之间没有比例。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谈到要把资本按比例地用于（1）“生产的各种范围内”，并且（2）“根据它的（社会的）需要”来使用。两个因素都属于社会生产的均衡性的概念。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假定在每个生产部门，我们完全都有比例，即指朝一个方向的单向联系：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让整个社会生产用这个系列来表示：煤、铁、机器、布匹；因而煤的生产量恰好和铁的生产所能够消费的量相适应，而铁的生产量又是机器生产所需要的数量，如此等等，贯穿于整个生产部门的链条。那么，我们能否保证不发生危机呢？不能。因为布匹的生产多于消费这种现象可能发生，结果，机器、铁和煤也都

^① 当然聪敏的读者不会忘记，我们讨论的是抽象的“理想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秩序。

超过需要。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不仅包括生产部门之间的失调，而且包括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失调。或者用列宁的话说：

“‘社会消费能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地，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害之一。实际上，对实现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产品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制造）能够而且应当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制造）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①

让我们从另一个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我们假定在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象我们表达的那样，是从煤到布一个方向的。但是从布到煤的相反的方向对于社会生产过程也是同样重要的。即使是布匹，也是要出售的，因而它可以被机器所取代。让我们再一次提出社会再生产的公式：当整个社会生产被分成两个部分，即分成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时，产品的具体的物质部分必须以特殊的关系相互交换位置。但是程序并不局限于仅仅把产品从上一层（生产资料的生产）移到下一层（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还必须把下一层的移到上一层来，而且必须按照特殊的严格规定的关系进行。

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提到我们的公式：

$$\begin{array}{l}
 \text{I} \\
 \text{II}
 \end{array}
 \left[\begin{array}{l}
 \overline{C_1 + V_1 + \alpha_1} \\
 \overline{C_2} + V_2 + \alpha_2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 \beta_{1c} + \overline{\beta_{1v}} \\
 + \overline{\beta_{2c}} + \beta_{2v}
 \end{array}$$

^① 《市场理论问题评论》，《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44 页。

我们知道，由此可以得出再生产过程的基本条件，它在这个方程式里得到表现：

$$C_2 + \beta_{2c} = V_1 + \alpha_1 + \beta_{1v}$$

或者，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

$$V_1 + \beta_{1v} = C_2 + \beta_{2c} - \alpha_1$$

因而，换句话说，如果 $C_2 + \beta_{2c} - \alpha_1 > V_1 + \beta_{1v}$ 将比生产资料生产中未来的可变资本大的话，我们就涉及到消费资料的生产过剩。但是，整个再生产的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同我们目前的问题有更直接的关系。它是：我们从分析社会再生产时看到，具体物质要素以各种方法进行更替。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行动实现更替，另一方面，只要消费资料代表了可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它就通过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通过工人购买消费资料的行为来实现更替。没有这点，再生产是不可能的。没有工人出卖劳动力和购买消费资料那些行为，再生产是难以想象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模式没有排除这些购买行为（看上去象是被排除了，如果人们注意到罗莎·卢森堡的解释的话）；相反，它们明白无误地以它们为前提。

所以：

首先，工人的消费资料和社会总产品的其它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是顺利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要求。

其次，全部劳动力价值量，或者付给全体工人包括新的生产循环的追加工人的工资总额，必须同工人的消费资料的价值相等。我们用 V 这个符号表示这个量，我们就得出：

$$V = (V_1 + \beta_{1v}) + (V_2 + \beta_{2v})$$

但是这个等式并不反映先前确立的协调。在现实里不存在这种协调，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自发产生的矛盾的倾向（增加生产而减少工资的倾向）。因而，资本主义的动力引起；

$$V < (V_1 + \beta_{1v}) + (V_2 + \beta_{2v})$$

也就是说，引起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显然，例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工资的水平不是由价值的计算来确定的，这个价值将在工人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中生产出来。同样，生产的范围是由需求水平来决定，而需求水平根本无法计算。因而，人们不应该把群众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同生产过程的总的平衡加以区分开来。

必须在这里指出：如果人们从整体上看再生产过程的整个机构的话，这个结论变得更为重要。

辩护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还否认危机，其理由是“在买主和卖主之间”，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抽象的平衡”。马克思评论道：

“所以，再没有什么主张，还比这种主张——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消费者（购买者）和生产者（售卖者）互相同一，并且用此来否定危机——更为可笑了。二者是截然有别的。在再生产过程进行的限度内，这种同一性，在三千个生产者中，只对一个生产者即资本家说，可以说得过去。另一方面，消费者即生产者的主张，也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地租）不生产什么，但他还是要消费。全部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形。”^①

换句话说，马克思指出了工人在流通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尽管工人们生产时要消费生产资料，但他们并不购买生产资料，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消费生产资料。工人们出卖一种商品，但不是他们在工厂里生产的商品。这一切同再生产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资本主义流通同简单的商品流通是不同的，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劳动力和其它东西一样，包含着使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600页。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但是那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即从社会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的。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资本的“实际”形式，它的生产形式——从具体的物质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它的价值的观点来看——代表了生产资料同活的劳动力而不是同消费资料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方面，消费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中间环节出现。它们不可能以其物质状态，来构成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价值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其物化形式同生产资料的物化形式相一致。因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时，在流通过程中，这同商品市场上的劳动力的运动相一致。但是，在特定的商品的生产领域里它同什么是一致的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是劳动力的间接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一生产的先决条件。然而，个人的消费过程构成了劳动力生产的直接过程。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阶级消费的过程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无需多说就可得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也以更直接和确切的形式反映了生产的不平衡，即消费资料生产和劳动力生产之间的不平衡。

在分析危机时，人们通常不花时间去考察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个事实。尽管我们已经解释过，我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交换的特殊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人们还是这样。劳动力一旦进入商品流通，商品生产所固有的矛盾必将在这里以复杂的形式出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它要争取无限的扩大），同群众（他们要实现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的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形式出现的。这个矛盾通过危机得到解决。

让我们回到争论的主题上来。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

他的关于危机的论文的理论部分的结尾中写道：

“如果按计划组织生产，市场就会完全了解需求，市场就有能力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自由地将劳动和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而，不论消费下降了多少，商品的供应绝不会超出需求。”^①

这一提法是绝对正确的，尽管人们必须对措词（在有组织的生产中的“市场”，“商品”等等）加以批评。不幸的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这一正确提法同他的全部理论是完全矛盾的。看来批评性地分析他是有益的，因为这样的分析对解决这个问题会产生更具体的概念。

根据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看法，了解需求属于计划生产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

需求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括对于煤的需求，对机器的需求，对铁的需求等等，一句话，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它也包括对面包的需求，对纺织品的需求，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只要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对抗的（阶级的）社会秩序，“了解需求”不仅包含了了解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且也包含了了解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的需求。将不存在危机。不会产生危机的理由还包括这一点，即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依赖是大家知道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当这位学识渊博的人凭借着生吞活剥马克思分析中的片纸只字创立市场理论时，就产生了正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理论上所否认的东西。然而图冈的错误使这一提法——“消费水平”是产品均衡的一个要素——得到更为卓越的阐明。事实上，让我们稍为更仔细地看一看生产各部门的相互关系的结构。

^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81—282页。

在一系列生产部门的下面，“粮食、衣服和住房”的生产最接近于消费。而这些分部中的每一个部门又可进一步分成一大批独立的生产部门。同这一系列生产部门有关的是，存在着一系列的生产资料工业，而这些工业又根据它们制造产品时同各种消费资料的关系以及根据生产资料的相互联系从纵横两个方面形成数不清的生产部门。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得出了这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生产是独立于消费的”，仅仅因为他只从一个方面（生产资料生产范围内各种工业的相互联系方面）来分析这种联系。首先，他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我们已论述过这点）；其次，他完全避开消费资料生产中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问题，这对于一个边际效用论的追随者来说，显得特别的奇怪。当把所有这些联系都考虑进去后，完全可能产生下列结果：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改变(1)消费资料生产中单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和(2)生产资料生产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这种比例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门之间的联系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消费预算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劳动的不同方面的重新组织。生产中的变化引起的这一变化并未改变事物本身。

那证明了“消费要素”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是图冈和罗莎·卢森堡共犯的一个错误，尽管他们得出了绝然相反的结论），而是社会生产的总平衡或失调的一个要素。

说了这些之后，就再也不难揭露罗莎·卢森堡的错误的方法论上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是“矛盾的统一”。辩护士们只看到统一。马克思写道：“所以他们的辩护就是把那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予以伪造，特别是在对立性面前硬说统一性。”^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78页。

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对这些同危机的理论有关的辩护士的做法作出了光辉的总结。他写道：

“买和卖分离着，（现实中如此——尼·布）商品和货币分离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学者们——尼·布）又假定这种分离是不存在的，而只有直接的物物交换。消费和生产也分离着；有不消费的生产者，也有不生产的消费者。但又假设生产和消费是同一的。资本家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以便增加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享受。但又假设，他是直接为并且只为享受的原故，才从事生产，假设资产阶级生产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那些矛盾当然会归于平衡，但这个平衡过程，同时会表现为危机，表现为互相分裂，漠不相关地互相对立、但又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要素的强制结合——是不存在的，当然也能发挥什么作用。在每个产业部门内，每个资本家都比例于他的资本来进行生产，而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但又假设，他的生产好象是奉社会的命令进行的。”^①

罗莎·卢森堡同志非常清楚地看到辩护士们的这一错误。但是还有其它的错误。不仅要看到矛盾，而且还要看到统一。这种统一在危机期间表现得最充分，而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这种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罗莎·卢森堡寻找资本主义的外表的、形式逻辑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有生气的，相互不能适应，不是矛盾统一的要素，而是清清楚楚地否认这个统一。而在实际上，我们见到了一个整体的辩证的矛盾，这些周期性地使彼此得到适应，不停地再生产，以致到了某个发展阶段，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把前面的统一连同制度本身一起摧毁掉。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129页。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批评已证明，卢森堡同志在分析再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都是错误的，不仅在她对待抽象的前提条件上是错误的（即从货币因素抽象出来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在把这个问题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中也是错误的（甚至在一般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即把货币因素和对危机的分析考虑进去。因而我们不得不转向甚至更具体的考察，即超出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并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圈子同它的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先注意一下罗莎·卢森堡的断言所得出的方法论的推论。对这些“推论”进行分析将会简化我们刚刚指出的问题。我们听一听罗莎·卢森堡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然而，如果一个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是唯一的形式，全体人民只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所组成——作出的假设不提出疑问，那怎么可能呢？”

不管你如何解释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结构，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也是常识，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那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但是，正如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看到的，马克思假定整个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其它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

都已经消失了。如果帝国主义在一个社会里不再有立足之地，我们又怎能解释这个社会里的帝国主义呢？

我想，我要在这一点上开始我的评论（不是对这个问题而是对马克思——尼·布）。关于一个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个理论假设——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这是允许的（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某个工厂的单个资本和剥削手法所作的分析）——似乎不再适宜了，因为我们论述的是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着重是我加的。——尼·布）由于这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历史进程，所以，如果把一切（？！——尼·布）历史现实条件都抽象到一点，那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理解的。作为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在一个具有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结构的环境中，在一个经常性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经济互惠关系中发展的。我们怎能在一个不流血的理论虚构——它宣称这场斗争和各种关系的整个现实是不存在的——中实现这个进程呢？”①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引言一方面代表了某种理论性的梗概，另一方面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锁钥；它更多地表现为道义上的义愤，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说服力。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在这儿遇到的是对于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的方法——它的含义，局限性以及（同时）它的正确性——缺乏某种基本的了解的例子。但是，现在对这一点作更周密的分析将使我们能更容易地理解她的下面的一些论点。因而，让我们考察一下引自罗莎·卢森堡的句子。

第一，首先，罗莎·卢森堡的假设是错误的。按照这种假设，《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了“单个资本”（1），即资本的个别单位，个别工厂和个别资本家。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那类东西。如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69—70页。

果他确实用了这样的例子，这个资本家是作为资本的化身出现的。实质上，《资本论》第一卷和其它各卷一样，具有用客观的“社会”方法来观察经济现象的特点。第一卷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的生产，第二卷是关于社会资本的流通，第三卷是关于“总过程”即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第二，从上述一点得出，罗莎·卢森堡建议的调查法的特性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的确，罗莎·卢森堡本人把再生产问题作为中心问题。但是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问题也就提了出来，因为生产以外或脱离生产的再生产是荒谬的。如果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范围以外不能分析积累的过程，继而也不能分析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的话，那么认为人们可以在分析资本生产过程时不去考虑这一范围，这是荒谬的。如果从生产过程中取消整个非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而在流通过程中却又考虑到价值——它产生于这个经济范围——那么，这个“总过程”就有好看的了。这种生产脱离流通的情况同再生产的概念是根本矛盾的。

第三，以上各点从《资本积累论》作者的进一步的结论中得到证实。她说，积累是一个实在的历史过程，人们不应该脱离这一过程的全部历史条件。但是没有人建议脱离全部历史条件。不考虑全部历史条件也就意味着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脱离非资本主义的“第三者”又是另外一回事。让我们假设资本主义的纺织工业将其货物销售给小生产者。如果这些小生产者购买的话，他们就得出售。让我们进一步假设，他们把棉花，即原料出售给纺织工业。那么，如果我们象罗莎·卢森堡建议的那样不能够脱离小生产者，我们就不能在考察生产时利用这种脱离状态，难道这还不明显吗？如果人们不得不在“实际过程”中把织布卖给小生产者，他们也就不得不从他们那儿购买棉花来生产织布。所以或者人们不能够脱离

“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也不能脱离他们，或者人们可以脱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在分析积累过程时这样做。如同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这种方法上的二元性导致了荒唐的结果。

第四，这种脱离是完全合理的。当然不仅脱离生产的资本主义积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发生，而且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结构经常地，具体地，以许多不同的方法同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绝不是反对这种脱离^①的一个论点。人们必须懂得抽象的理论是了解现实的“锁钥”，而且人们必须懂得如何来掌握它。“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价值和价格从不相等，供和求也不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得到的也不是它的全部劳动力的价值，等等。然而理论的抽象使我们能够更接近于解决最具体的问题，只要那些运用这些抽象的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即在抽象和实际经验的运用之间存在着很多逻辑的步骤，这些步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省略。

第五，刚才谈到的内容已包含了对罗莎·卢森堡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棘手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解释在没有殖民地存在的社会里殖民地的掠夺。换句话说：人们怎么能解释早已不被包括在分析范围内的事物呢？这一做法等于试图解答“没有香味”的玫瑰的香味这个著名的“哲学”问题。

我们的评论家至少在这点上的论证是否有说服力呢？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① 顺便提一句，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一文中声称，马克思从未论述过“孤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指出了资本主义趋向全面统治的实际倾向。这种对抗在逻辑上是不能被接受的。说马克思从未论述过“孤立的”社会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想起了下面的这句话：“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且把对外贸易丢开不说，考察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罢。”（《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553页。）

的确，要解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当然要在考察中包括这个非资本主义环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更具体些。对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分析都必须要比《资本论》的理论性解释更具体些。

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也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这种提法同上述提法一点也不矛盾。（我们将在后面来看一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此外，对具体现实和资本家同“第三者”经常的实实在在的共存所作解释的可靠性，它不是有利的论证；对借助于错误的理论性的论点——如没有非资本主义环境就不可能积累的提法——进行资本主义扩张，它也不是有利的论证。

这儿我们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是首先卢森堡同志出乎意料地使我们大吃一惊。她声称，如果人们拒绝她的在纯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可能积累的理论的话，他们就不能够谈论资本主义和第三者之间的任何关系。她使用了对外贸不那么合适的观察形式来证明了这点（我们说不合适，是因为外贸一词不一定表明生产方式的区别）。

罗莎·卢森堡同志写道：

“在上述的再生产的图景中（她谈的是布尔加科夫。——尼·布），本来没有国外贸易立足的余地。如果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最初发展时，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尼·布），如果象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它能够为自己的生产物创造无限的市场并且能够自己刺激自己走上日趋扩张的道路，那么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只有在一种场合，国外贸易看来好象是合理的，那就是，通过国外的输入来弥补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所产生的某些缺陷，也就是，由于绝对的必须输入原料和食物……国际间的商品交易在这里不是

被看作从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而是从各有关国家的自然条件产生的。无论如何，这个理论不是从马克思，而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专家那里抄袭来的。”^①

如果人们因此不考虑国际分工的自然条件（如果不冒犯一下“具体历史过程”这个“圣灵”这怎么可能呢？），“国外贸易”（最好说：同非资本主义环境相交换）仍然是费解的。这是罗莎·卢森堡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应该具有摧毁力。但是，谁都知道，任何东西都不是一烧出来就熟吃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卢森堡的“有份量的”例证。对抽象的理论和具体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方法论的问题，《资本积累论》的作者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造成了混乱。我们首先应廓清这种混乱。谁都知道，从来不存在，也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孤立的”、“抽象的”、“纯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当罗莎·卢森堡在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它在每个国家内形成了这一“封闭的圆圈”的时候，她完全没有切中要害，因为谁也没有声称过资本主义在任何地方或在“每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曾自作自受，实行禁欲，而且没有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进行过罪恶的交往。相反，它到处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把其影响扩展到非资本主义的疆界以内，并且为使它自身更加繁荣而不断地掠夺他们。

为什么这样小题大作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如果”呢？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些“如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膨胀的真正原因呢？

首先，是由于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是绝对而经常的生产过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8—239页。脚注：就最后一句话来说，它包含了错误的论证，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引用马克思的话：“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剩所造成的，那么就是危机，包括危机引起的全部后果所造成的。

其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因素）是由于存在从外界攫取更大利润的可能性。

关于第一个原因，无需赘述。譬如说，假如我们有暂时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又同时存在一个“追加的”市场，商品当然流向后者，在新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自然会出现市场的新膨胀。显然，这一点也不会动摇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的可能性的论点。如果没有追加的市场，单是那个事实是不能够摧毁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的。同样的情况仍然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市场，具体的发展必需把阻力引导到最小的程度，不这样做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第二个原因，情况就更为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考察这个问题——尽管马克思已经明确地论述过这一点。人们对罗莎·卢森堡忽视那一点有疑问。

“萨伊在康斯丹西阿所译的里嘉图著作中，不过关于对外贸易，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注解。利润也能由欺诈生出，也就是，能由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损失的方法生出。损失和利得在一国之内会互相抵销。但不同国家之间不是如此。甚至里嘉图的理论也认为——这是萨伊没有指出的——（从理论观点来看——尼·布）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重要的修正。不同国家劳动日的关系，能够象一国之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关系一样。在这个场合，富国会剥削贫国，纵然象穆勒在《未决问题》内已经讲过的一样，贫国也会由交换得到利益。”^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111页。（最后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尼·布）

所以，即使“较穷”的国家从交换中得益，“较富”的国家仍然得到剩余利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确切地阐明了同样的思想：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为什么投在某些部门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并且送回本国的较高的利润率，在没有垄断的妨碍时，不应当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而不应当相应地提高一般利润率呢，这是不能理解的。”^①

最后，引用罗莎·卢森堡也提到的一段文章，奇怪的是，她不明白这段引言同她的理论是根本矛盾的。但这一段不是关于商品，而是关于资本；不是关于商品输出，而是关于资本输出。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再生产时已经证明的那样，这种差异是不重要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64—265页。

的，特别是从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角度来看。（从其它的观点来看它是重要的，但是目前这不重要。）

关于资本输出，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①

因而：（1）如果它是偶然的交换，贸易资本通过使用包括欺骗、暴力和掠夺在内的一切手段获得剩余利润；（2）如果对外交换成为经常的活动，有着更高级结构的国家势必获得剩余利润（因为生产率的差异——编者）；（3）如果资本输出是为了获取追加利润，那也是会发生的。

人们不得不感到吃惊，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如此确切地提出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范畴这一问题后，竟在她的著作的其它地方，特别是在那些应该强调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视而不见。难道这个说法——利润、利润、还是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的“目标”和“动力”——不是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了吗？人们在分析商品和资本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时，怎么能忽略利润量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严厉批评马克思的人忽略了马克思的一个最根本的句子。因此，罗莎·卢森堡错误地宣称已按照马克思体系的精神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她的答案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矛盾。在这点上，她已经——她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滑到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概念上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有趣的一般性问题，但从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85页。（在我的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也引用过，在那本书中，这个问题得到明确的论述。——尼·布）

判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它是十分重要的。

读者会注意到罗莎·卢森堡多么奇怪地提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经济根源问题。由于她忽略了寻求更大利润这个因素，她就把一切都归之为实现的可能性这个简单的公式。资本为什么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呢？是为了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实现不了的剩余价值。这样，实现问题就同更大的利润问题分开了，从而同剥削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问题也分开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上的矛盾：罗莎·卢森堡想要成为极端革命派，而且对殖民剥削作了卓越的精彩的描绘，却提出了一个理论，从问题的理论核心来看，这个理论又使资本主义的现实模糊起来，并使之美化。卢森堡同志把这个现实描述得很好。她把对“第三者”的无情的摧毁以增进资本主义文明的繁荣勾划得极为清晰。她用下面几句话总结了积累的这一方面：

“它的主要的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利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气力的。”^①

多精彩！然而多么可惜呀，罗莎·卢森堡同志没有在可以找到“严密的经济过程的规律”的地方去寻求。

确实，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抽象的高度降下来，并把“第三者”在我们的分析中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方面之间的交换关系上会出现哪种基本倾向呢？只能有一个答案：合并非资本主义方面并使它们消失的倾向。

这一过程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当然同资本对这些形式的剥削联系在一起。剥削又是同获取日益增多的利润——那是资本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364 页。

主义经济的灵魂和动力——联系在一起的。就我们希望强调这个关系的基本的、必要的和普通的过程而言，日益增多的利润、剥削、破坏和衰退构成了资本主义领域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实际关系的联系。“严密的经济过程的规律”寓于其中。

对罗莎·卢森堡呢？

那么，“严密的规律”——不幸得很——不适用于这个暴风雨般的强有力的现实。罗莎·卢森堡不是去强调剥削、剩余利润及其它方面，而是强调实现的单调的公式。当然，没有实现，追加利润是不可能的。获取额外利润就是实现。但是根本的经济事实是，我们面临的是额外利润的实现，而不是其他任何实现。那是资本扩张现象的特点。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掩盖了现实中的弊病。所以他就不能够解释真正的事实，不管他在描述这个问题时如何强调这些事实。罗莎·卢森堡表现得如此自相矛盾。

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个问题。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是如何描写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的结构的呢？如下：资本家不能够实现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积累的剩余价值，因为它既不能被工人，也不能被资本家所购买。这部分价值是销售给“第三者”的。资本家交付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而得到货币，用它从“第三者”那里购买原料。所以资本家可以积累和生产，“第三者”也可以生产。他们交换了等价物。实现就产生了——即转化某个价值量的自然的物质形式。现在发生了什么呢？使我们吃惊的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资本家在工人的协助下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第三者”在获得等价物后，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生产并增加需求。他们又一次自愿地为资本主义尽了自己的职责。双方都十分满意。“狼也吃饱了，羊也未受伤。”实现者和“第三者”均感到很好。所以这种情

况永远存在下去，一种极其和平的游戏，即非常奇怪的相互交换“服务”，这同协调论的宣传家如巴斯蒂亚特及其一伙的观点^①，是一致的：资本家通过交付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方式给对方提供服务，而“第三者”则通过有力地支持这种略为“带风险”的实现事业来偿还等价物。用罗莎·卢森堡特别喜欢的词汇来说，这种田园诗般的“旋转木马”，不停顿地旋转。然而，这幅惹人喜爱的画面，既未激怒那个批评马克思的公式的学问渊博的人，也未引起她的怀疑。^②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罗莎·卢森堡在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实际的历史过程”方面，陷入多么深的矛盾之中。

大家知道，资本早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执行了贪婪的殖民政策。它掌握了任何数量的“第三者”：农民，小手工艺者等等。有什么需要要徘徊到遥远的地方去呢？罗莎·卢森堡本人否定了这个物质的“理由”（不同性质的海外产品等等）。或者也许为了实现？但是在国内，他们掌握的第三者之多有如浩瀚的海洋。再来问一下，是什么把那些怪癖的资本主义狂人驱赶到国外呢？罗莎·卢森堡根据自己的理论，是不可能解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从马克思及其正统的学生的观点来看，国外贸易不是莫明其妙的，而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来看仍然是费解的。

《资本积累论》的作者，在另一个题目上，也犯了相似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市场问题和追求新市场的动力问题，是如何被错误地提出来的，就象劳动市场的问题如何被她错误地提出来

^① 弗雷德里希·巴斯蒂亚特（1801—1851），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出生于巴约尼，著有各种反对保护主义的作品，被认为一生都是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发言人。还著有反社会主义的作品。

^② 克里兹曼同志在《论资本积累和第三者》一文中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趣并且写得很好。详见社会科学院通讯第五期，莫斯科1923年出版（俄文）。

的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追猎殖民地劳动力这个“严酷的”实际经历的事实。这种追猎的基础是什么呢？为什么资本要“黄色劳动力”？也许它缺乏其它劳动力，或者它没有追加的殖民地劳动力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国内”的劳动力不够用？

根本不是！原因很简单：在猎取最高利润时，它寻求更廉价的劳动，而同时寻找最高的剥削率。劳动报酬的差额——它在职能上同利润有关——是追猎的真正原因。

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完全不同。让我们再引用她的话，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证明，任何想在理论方面继续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人去“批评”马克思是多么的“危险”：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剩余价值及不变资本的角度上来考察了资本积累。而积累的第三个要素是可变资本。积累进展了，可变资本也随着增大。……因此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劳动的供应……在有利条件下，这个供应量是可以增加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但只能达到某种限度。但是这些增加供应量的方法并没有增加可变资本，或者，只增加少许（例如作为加班的工资）。而且，这两种方法，只限于一定的狭隘范围内，由于自然和社会原因，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伴随积累而来的可变资本的不断增大，就必定表现被雇佣的劳动数量的不断增大。那么，这种追加的劳动从哪里来呢？”^①

在提出这个问题并考察了马克思的答案之后（马克思在这里也是设想了一种抽象的答案），罗莎·卢森堡得出了这个结论：答案显然不是令人满意的……

“如果（工人阶级的）自然繁殖是资本发展的唯一基础，那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84 页。

么，积累周期地在紧张与疲劳间摇摆中，是不可能持续的，生产领域的飞跃扩张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积累的进程也成为不可能了。”^①

“但是，马克思漠视了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的崩溃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不断地从非资本主义情况过渡到资本主义情况的过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欧洲农民和手工业的没落，欧洲以外国家的种种原始的生产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崩溃，亦是如此。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温带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上，它也不能只使用白种人的劳动力。”^②

“……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其它社会结构的劳动力，就一步也走不通。”^③

这些意见，乍看上去是隐晦的，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最基本要点的否认，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机会主义的结论。

让我们再一次澄清包含在引言中的这一大堆矛盾。

首先我们要顺便指出一个混乱状态，这是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整本书的特点。这里她也把具体同抽象混为一谈。具体地说：大量的追加的劳动力来自乡村，来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但是那确实不应该成为罗莎·卢森堡抄袭资产阶级分子弗朗茨·奥本海姆^④的论点的理由，奥本海姆认为自己通过指出这个事实正在给严厉的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问题在于：在抽象的资本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85 页。

② 同上书，第 286 页。

③ 同上书，第 287 页。

④ 弗朗茨·奥本海姆（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行医开始了他的事业，1885年在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以后改变职业并在凯尔求学。1919年成为法兰克福经济学教授。1933年离开德国。

主义社会里，积累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答道：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相对地增长较快，这就必然发展了后备军，它随着工业形势的波动而时多时少。因为资本主义机构知道怎样保证市场（尽管没有那种可爱的“调和”），所以它可以一方面通过保证增殖，另一方面通过形成后备军来处理大量的劳动力。

这就是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在具体的社会里，当然情形不是那样的简单。非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特殊意义越重要，对这一分析所作的“更正”就更应该充实些。因而试图通过指出从非资本主义环境引进追加的劳动力这一个事实来批驳马克思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另一个断言，罗莎的主要的假设。它基本上引向这一提法，即没有来自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一劳动力，积累也就不可能，如同没有“第三者”也就不可能实现一样。这个实现中的“第三者”，从前一个被剥削的“第三者”——他们在失去了这样的身份后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那里得到理论上的支持。

所以，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的过剩（后备军）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以及群众的生产 and 群众的消费之间的矛盾等，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照罗莎的看法，不可避免的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的匮乏。劳动的匮乏成了主要问题，以致积累本身都变得不可能。

我们不谈在这种情况下积累不可能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必须注意下述情况：如果劳动力的短缺持续下去，工资显然要上升。短缺越严重，工资就越高。那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十分

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提一个“刁钻”的问题：日益增长的痛苦的理论又会怎样了呢？或者甚至伯恩斯坦在他断言它早就是多余时也是正确的吗？而且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又怎样呢？难道它在完成支持实现的理论的任务（顺便说一下，不是十分清楚的）之后就被消灭，抑或因“再也无关”而消亡？

罗莎·卢森堡同志如此天真，以致她甚至不了解她关于资本主义没有非资本主义劳动力就不可能存在的论点，摧毁了她自己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个论点否认了“群众的痛苦”，没有群众，寸步难行。更有甚者。这个论点不仅摧毁罗莎自己的理论，而且它同马克思的正确的革命理论是根本矛盾的。她的理论美化了资本主义。它否认了资本主义的痼疾，这些痼疾表现为群众的贫困化，表现为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等等。

罗莎·卢森堡想在理论上表现得比马克思还革命。但是我们的断言已经证明，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态度使她美化了资本主义。剥削被温和的实现所替代。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她想要证实这个“极端革命的”结论：资本主义没有殖民地的劳动力就会衰退；但事与愿违，它已经把她推向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对立面。

这是马克思学说的报复行为，它不会原谅对其统一性的批评性的攻击。

至此，我们主要探讨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一般性问题，包括它的经济根源。现在该是考察一下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问题的时候了。

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她的著作的序言中表示了这种愿望，即希望《资本积累论》“除去仅仅理论性的意义外，还应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具有某种重要性。”卢森堡同志认为，她的考察同帝国主义问题密切相关。当然，那是对的。作者的意图以及

她在以后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毫不含糊的。然而，她的著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在关于资本扩张的一般性意见（我们已经看到，即便这些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后面消失了。

罗莎·卢森堡的特点是，她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脚注里提到“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处理（伦敦版第457页）。

罗莎·卢森堡不仅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她对问题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因而得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理论性结论。例如，她给帝国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①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大堆各种错误，这是绝非偶然的；相反，所有错误同出一辙。首先，资本始终为“残余”（一个最不准确的用语）进行斗争。其次，从同一定义可以得出，争夺那些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领土的，不是帝国主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再次，从同一定义还可得出，争夺“被占领的”领土的，也不是帝国主义。这条定义的这个因素也是完全错误的。整个定义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即它在涉及问题时毫不考虑把资本专门说明是金融资本的必要性。贸易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产业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消失了或融化到“这样的资本主义”里去。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这个具体问题消失了；由银行统在一起的垄断的生产条件消失了。但是，如果不懂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能不能懂得资本主义的特殊“政治表现”呢？政治毕竟仅仅是扩大现有生产条件的手段。罗莎·卢森堡就是不懂得，不分析或甚至不注意这一点。她喜欢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谈论事物的“普遍性”，而不考虑我们时代的实在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特点，这样的时代需要加以特殊的分析。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指的是法国（1923—1924）对鲁尔区的占领。

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来看，这不是帝国主义，因为（1）没有了“残余”，（2）不存在“非资本主义环境”；（3）鲁尔区在被占领前已属帝国主义所有。总之，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所有症状都不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例子。

另一方面，例如葡萄牙的贸易战争，或者西班牙在发现美洲以后立即在美洲实行的政策，都属于帝国主义范畴。某种生产条件的标准（这是使我们懂得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的唯一标准）不见了。我们现在要问：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的一般性假设和她对帝国主义的荒谬定义之间有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相信肯定有。

的确，为什么要吞并资本主义的领土呢？它无助于实现，只有“第三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可以帮着实现，支持资本主义完成实现的困难任务。吞并被外国资本所统治的领土看来同这个观点是相反的。

罗莎·卢森堡只强调了帝国主义行动目标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在论军国主义时她写道：“军国主义……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争夺非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工具。”^①

所以，“非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领域简直就不合常理地被消灭掉了。消灭是因为罗莎·卢森堡误解了实现问题，而不去讨论利润水平和数量的问题。奇怪得很，卡尔·考茨基其人也对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5页。

帝国主义作了同样的解释。照考茨基的说法，帝国主义是争夺新的农业国家（尽管考茨基只把农业国看成是原材料的供应者）。考茨基，以及罗莎无法理解大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斗争不可能满足于这一目的。帝国主义行动的破坏性影响不仅扩及到依附性的“第三者”，而且扩及到资本主义领土；是的，甚至扩及到外国的金融资本的领域。争斗已经从单纯地争夺农业国家的分配变成瓜分世界。

因而，我们得出这个结果：罗莎·卢森堡不能解释这样的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同非资本主义范围的关系所产生的过程仍未得到解释，这意味着罗莎·卢森堡不能够恰当地解释资本的扩张。她更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特殊症状。

最后，应该简单地描述一下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答复下列问题：

1. 资本扩张的条件是什么？它的经济根源是什么？
2. 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
3. 如何解释斗争的特殊形式（使用暴力和战争）？

我们试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答复。

1. 利润运动，它的数量和比率构成了资本扩张的条件——量依赖于此。商品和资本的运动遵守利润率平均法则。无疑这个过程必须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再生产的公式是

$$M - C \left\{ \frac{L}{mP} \dots P \dots C' - M' \right.$$

我们遇到了过程的三个部分。资本的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本起着将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作用（具体的生产过程——以字母P为标志——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最后，增殖的商品量转化为货币，即资本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显然，利润量可

以根据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情况上下波动；这三个阶段一起构成了资本的全部循环。

如果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生产资料和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利润率就相应地上涨，资本试图利用这种形势。如果存在其它的同工业地位有关的条件，即地理位置，能使利润率增殖的条件，那么资本就朝那个方向运动。最后，如果我们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实现商品量，那么利润率又将上涨，而资本就不断地朝着那个方向调整。结果，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源就存在于购买的条件，生产过程本身以及最后销售条件。一般来讲有三个问题与此有关：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问题；资本投资的新的范围问题；最后市场问题。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那些远离已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形态，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它们确保了最高利润（即使包括高额的运输费用）。殖民地“剩余利润”的获得说明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向。那不意味着斗争只朝着或只能朝着那个方向进行。相反，斗争越深入（当然，在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它也就越成为争夺资本主义中心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运动也还是主要的原因（例如，法国的铁同鲁尔的煤的联结就保证了利润的巨大增殖）。

2. 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严重激化可以从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对象在三个方向上的适应得到解释，这三个方向同再生产的一般公式的三个部分相一致。这里，量变转为质变。这个问题，已被现有的文献所充分说明。

3. 竞争性斗争（着重点从使用低价手段进行斗争转变为增加压力的方法，直至战争）的特殊形式，首先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所造成；其次，是由于在这些国家内，财产已被垄断，因此，为争夺原材料和争夺作为资本输出对象的国家（在那儿，用降低价格的手段来竞争已不可能）而进行斗争变得越来越重要。

再次，由于今日的市场问题不同了，因为它再也不是平等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得到国家权力支持的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斗争。

如果不同企业间相互争斗（例如煤业托拉斯和铁托拉斯），降低价格的策略就失去意义。如果联合企业进行争斗，他们的方法必然是联合起来。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术语来说——只不过是巨大的联合经济托拉斯。此外，在垄断资本统治下，为一种相似的产品争夺市场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垄断资本不得不争取垄断某个市场，通过关税壁垒划分它的界限，和使它的国家机构屈从。

因而，资本扩张的客观内容，在某种范围内也在变化。我们看到扩张的形式向着斗争方法的尖锐化变化。我们进而又看到这也是由资本形式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因为战争只不过是“其它政治手段的继续”，所以政治也不过是某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方法。所以近代资本扩张同过去的不同，表现在它再生产出了在扩大的水平上的生产的新的历史环境，即金融资本主义环境。帝国主义的基本要点就寓于此，而罗莎·卢森堡完全忽略了这点。如果人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特定的历史特点，谈论帝国主义又有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要求的误解，也是对“具体历史过程”的误解——这一过程常常被用作一个证据，来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那些“没有灵魂的公式”。

第五章 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

正如我们上边已解释过的一样，罗莎·卢森堡的关于积累的
错误理论也导致了关于帝国主义的错误理论。而后者导致了关于
资本主义崩溃的错误理论。因而罗莎·卢森堡试图以相对的论证
来证明她是对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充足的市场，资本主义
积累就（在客观上）变成无限的了。因为生产将仍然增长，就是
说，生产力将无限地发展，甚至当人类被划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
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
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基础就崩溃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
造反，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需要的思想反映，是资
本主义在某一经济阶段上的客观不可能性导致的结果。当然，那不
意味着（似乎仍然需要向‘专家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要
素）这个历史进程必须或者甚至能够耗尽到这个经济不可能性的
极限。远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在这个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足以使
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达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以致它们
必须结束。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
经济不可防御性的产物。当这个不可防御性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
候，形势继续激化下去。“如果我们同‘专家们’一起假定资本主
义积累在经济上是无穷无尽的，那末，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极端重
要的基础将要消失。我们就得在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图完全根
据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恶以及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推断出社会

主义的学派里避难了。”①

罗莎·卢森堡的模式是极其简单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启发性的。只要资本主义是“不纯的”，换句话说，只要“第三者”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心同时并存，资本主义就是可能的。“第三者”是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前提，因而也是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根据它的趋势，资本的运动是一个通向“纯”资本主义的运动，是通向发展的某种数学极限。根据这个理论，如果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它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以牺牲“第三者”来解决，这种解决方法不可能永远重复，因为第三者的数量相对地在减少。这里我们碰到了作为一个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极限。资本主义就变为一个经济上的不可能性。这种历史的——经济的必然性在工人革命中被冲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面前可能会出现“严密的经济法则大纲”，这些经济法则构成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而这些关系的表面掩盖着历史进程的更深刻的动力

“虽然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方式，它也是一个迅速结束它的可靠的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实际上被推向极端：走向帝国主义本身的单纯的倾向具体化了，它使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变为一个大灾难时期。”

关于罗莎·卢森堡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就谈这么多。

是什么使这一理论如此吸引人呢？

是它的“经济宿命论”（“对资本主义的客观局限性”，“严密的经济法则大纲”，等等）。另外，是它被经验般的事实（所谓）证实（由于猎取市场而造成形势的加剧，灾难时期，整个帝国主义时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85—86页。

代的“灾难性的特征”，等等)。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它的“革命”性。

然而，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崩溃的理论是完全荒谬的。它之所以错误，主要是因为它被作为一个理论，即是一系列的假定，这些假定并不满足于描绘一些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还要试图说明这些现象。

我们已经揭示了卢森堡的思想在理论上的主要弱点。很清楚，整个的“崩溃”是由于“纯资本主义”范围内实现的不可能性，即由于我们所证明的一个谬误的理论。此外，我们还证明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导致了资本主义范围和“第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不断的和平的再生产。简言之，我们已经证明罗莎用实现替代剥削，势必导致这个过程的和平性质，不管她的“结论”可能是多么的革命。

因此，罗莎的整个理论解释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同时，我们将分析上边抄录的罗莎·卢森堡的论点，以便在现有的错误上再增加一些新的错误，这些新错误是崩溃理论和与之有关的〈反批评〉的一个特点。

我们要从事实出发。帝国主义意味着大灾难，我们已进入到资本主义崩溃的时期，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假。但是，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第三者”这也是事实。有必要来区分两个概念：资本的一般规律，和狭隘意义上的资本规律，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和“几乎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已经到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它是各种经济形态大合奏的指挥。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不是产业工人和领工资的农业工人，而是农民构成当今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在我们的行星上居住的十七亿人口当中，有九亿人（半数以上）生活在亚洲，四亿三千万中国人中有四亿、三亿二千万印度人中有一亿七千万是农民。如果我们包括小手工艺者和其它“第三者”，我们得出一

个庞大的数字。亚洲、非洲和美洲有大量的“第三者”。而且，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欧洲人口是在农村，这就间接地证明了“第三者”的后备军仍然是多么的庞大。

即使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几乎是正确的，革命事业也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如果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事实上存在着的储备力量——“第三者”，那就完全谈不到崩溃。那末，我们可以说：按照古诺^①的说法，资本主义扩张仍然有如此巨大的活动场地——以“第三者”的形式出现——以致只有乌托邦主义者才能认真地谈论某种无产阶级革命。现实是：社会主义即将胜利的幻想已经破灭，而不是第二国际时代的社会主义已经崩溃。现实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因而人们还不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末日。

不幸得很，这样一种“古诺主义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她由此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她逻辑上的矛盾。

事实上，看来罗莎知道她的全部论证的笨拙程度。她承认：断言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掐死每一个“第三者”这是荒谬的。她明确地强调资本主义将要“更早地”被摧毁。照她的意见，“资本主义朝这一目标发展的客观倾向”是足够的。但是，朝这一“目标”的“客观倾向”等等始终存在着。这个过程显然还是极为先进的，“实现的不可能性”必须有根有据，用一句形象化的话说：至少是一个“经济上的预感”，客观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经济范围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第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代表大多数。

这一切在现实里是找不到的。但是整个时代已显现出矛盾的最急剧的尖锐化，最剧烈的和总的紧张局势，最严重的灾难的特

^① 海因里希·古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4年以前是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中的同事。战争爆发时采取爱国立场并迅速转向右翼。

性。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成为现实。如何来解释这些矛盾现象呢？

很简单。当然不是因为再也没有足够的“第三者”了，而是因为这些给资本带来剩余利润（但资本“绝对”“需要”剩余利润）的“第三者”，已经被金融资本大国按照垄断法则在它们中间瓜分完毕。

罗莎·卢森堡同志完全漠视了利润运动的问题，额外利润的特性问题，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问题。这个忽略的过失造成的后果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被她注意到。从而出现了许多矛盾。

没有“第三者”，资本也能够十分容易地存在。但是一旦有了“第三者”，资本必然要把他们吃掉，因为这一餐带来剩余利润。还有大量的“第三者”。为争夺他们而进行的斗争（即争夺剩余利润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急剧尖锐的阶段，因为他们已被垄断地瓜分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罗莎·卢森堡正确地回答了她一个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即资本主义最终将因为“利润率的下降”而崩溃，她答复道：

“这位可爱人士是如何产生这种设想的——资本家阶级是否将在某个时候因为利润率低感到绝望而自杀，还是它将会宣布生意太糟，完全不值得费心经营，于是它将把钥匙交给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这种安慰却不幸被马克思的一句话驱散了，他说，‘大资本将通过大规模生产对利润率下降实行补偿’。因此，在资本主义因利润率下降而崩溃之前，仍然要经过一些日子，大概要等到太阳熄灭。”^①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评》，见本书第86页脚注。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正确的。但奇怪的是，罗莎·卢森堡没有注意到她的答复不仅击中了这位“可爱人士”，而且也击中了《资本积累论》的作者本人。

我们不愿担任吹毛求疵的人的角色，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被提到的那位“可爱人士”可能提出下面的答复：

要求过程达到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可笑的。资本主义朝着这一目标发展的客观倾向是十分充足的。早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这种倾向将会使夺取新利润的可能性的斗争尖锐到这样一种程度，同样出现的资本集中和社会关系的激化又如此之甚，以致低利润率的时代将变成灾难的时代。

这样的答复同罗莎·卢森堡的答复只有细微的差异。因为，由于最后的“第三者”——他可能已推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可怕的天启时刻，而这个时刻会使剩余价值的实现终止——将开始消失，利润率同时将几乎等于零。

我们已经提到使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具有吸引力的三个因素。它们是：它的经济宿命论；它的资本主义的“客观局限性”；它的（所谓的）事实（灾难时期等等）的证实以及她的全部解释的“革命性”。现在我们必须像“破坏专家”那样承认我们对这三个因素的批评没有什么遗漏。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单子，看看这些因素中还遗留下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罗莎·卢森堡在这个能够解释崩溃的中心问题里没有指出任何局限性。实际上，罗莎·卢森堡指出的局限性无关重要。资本主义已开始瓦解，而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仍然保留了“第三者”的身份。显然，这种解释完全是虚构的。

其次，这个理论与事实一点也不符。如果发生灾难的话，正象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是不可能解释这些灾难的。大量“第三者”存在这一事实同罗莎的崩溃论是相矛盾的。

再次，人们不仅不能从罗莎的理论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革命不可能出现。

所有这些反对《资本积累论》的作者的论点，仅仅补充了前面几章中我们的主要抨击。罗莎的论证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证明在理论上都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罗莎·卢森堡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她恰恰在马克思的那一部分的分析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而这种分析是这位无与伦比的大师的才华给我们留下的他的最完整的天才成果。

在这里我们还得对付罗莎·卢森堡的另一个论点。在本章的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发挥了下述的思想：“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充足的市场，那么资本主义积累（在客观上）就成为无限制的过程。”

她由此得出这个结论：因而生产可以“不受干扰地增长”；因而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极限，因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支柱——社会主义——就崩溃了。”

这一连串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是因为罗莎·卢森堡不懂得社会矛盾的辩证的特性，社会总体和它的运动法则的辩证的特性。

资本主义是“矛盾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是这些矛盾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这些矛盾将摧毁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就到达了资本主义的极限。矛盾要尖锐到什么程度才能摧毁这个体系，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已在另一部著作^①里试图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

^① 布哈林著《改造时期的经济》。把生产当作资本主义矛盾的生产的概念已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8年彼得堡出版，英文版由伦敦马丁·劳伦斯有限公司出版）一书中详细地论述过了。

必须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中寻求答案。如果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引起了经济的破坏和生产力衰退，从而在某一点上劳动力不能再生，不能再发挥作用，那么，社会的生产机器就要分崩离析，阶级间的障碍就要增加。

即使这种对资本主义崩溃的一般性的，纲要性的，“纯理论的”，因而是有条件的解释也要求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的极限。这种极限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矛盾的紧张程度而定。

罗莎·卢森堡把事情说得过于简单了：如果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是不可能的话，生产力将持续地“不受干扰地”增长；如果在理论上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没有限制”。

我们重复说：这些相反的论点——它们极为独特地反映了罗莎·卢森堡和她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表明她的论证的脆弱之处。只要更仔细地看一看这些论点就能明了《资本积累论》的作者距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相差有多么远啊，甚至离开正确的符合方法论的提问的逻辑方法相差又有多么远啊。

的确，实现的可能性是不是意味着生产力“不受干扰”地增长呢？一点也不。在第四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对她来说，“不受干扰的”增长意味着没有矛盾的~~增长~~，但是即使在“纯资本主义制度”里，整个发展也充满了矛盾。如果不存在持续的生产过剩，也存在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如果不存在持续的实现的不可能性，也存在着周期的危机。如果不存在最终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存在着暂时推迟矛盾的方法，也就是“有条件的”解决方法。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也存在着扩大再生产。如此等等。

换句话说，“干扰”并未被排除，相反，它们对资本主义来说

是“近在咫尺的”。它们周期性地得到“解决”，但是又周期性地以更强烈的姿态再现。其日益扩大的范围和日益加剧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基本矛盾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这里，罗莎·卢森堡又弄得太简单了。她论述的是一个剩余价值生产条件和它的实现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①

这个矛盾不是被作为辩证的矛盾来处理，而是被作为表面矛盾来处理，由此推断出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不应从一种矛盾出发，而应从许多矛盾出发，要辩证地看待这些矛盾。然后我们得到同罗莎·卢森堡设想的——即使是精心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图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矛盾，工业同受地租限定的农业之间的矛盾，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作为竞争手段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扩大的规模上得到再生产。

^① 另外提一笔，修正主义的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其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尽管角度不同。他写道，“近代生产方式的特征，首先是劳动生产力的极大的增长。结果是生产——大量商品的生产——也得到同样的增长。这些财富在哪儿呢？

“或者直接深入到事物的实质，产业雇佣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但由于受到工资的限制而没有消费的剩余产品到哪儿去了呢？即使“资本巨头们”的肚皮比群众的讽刺作品所形容的要大十倍，……他们的消费同每年全国的大量产品相比也只能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那么，巨头们和他们的仆人们没有消费掉的商品到哪儿去了呢？如果它们不是通过某种途径到达无产阶级之手的话，它们必定是被其它阶级所获得。或者是资本家人数的相对的日益缩减和无产阶级财富的日益增长，或者是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这些是生产持续增长所允许的唯一的可能性。”（伯恩斯坦，《进化的社会主义》第49-50页，1961年纽约版）。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应到“中产阶级”那里去寻求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记住修正主义者特别强调小的农业企业单位生存的能力的话，这种相似之处就变得明显了。当然，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的“目标”和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它的特点仍然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问题的提法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估计都是一样的，即“第三者”是资本主义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个运动同利润的运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们不仅仅能够从抽象的设想和理论的展望的基础上来观察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资本主义崩溃已经开始。十月革命是那种崩溃的最有说服力的、最生动的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无疑同经济衰退相联系，衰退同战争相联系，战争同争夺市场，争夺原料和投资范围相联系，总之，同帝国主义的总政治联系在一起。后者只不过是竞争性斗争在世界规模上的重演，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全体并不是个体资本家和个体托拉斯，而是已经得到巩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战争的爆发包括了已经提到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主要矛盾。人们也可以把这些矛盾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假如把这些矛盾看成是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同被国家疆界分开受到“民族”局限的资产阶级的拨款方法之间的矛盾，或者看成是最广泛的社会化的生产同财产的私有经济状况或财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话。通过全面分析就不难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使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摆脱了羁绊。它是它实际上展现出来的形式。

从理论上来说，“第二轮”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而是象列宁同志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它确实是十分明显的。

除了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有这些矛盾之外，还有一个大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新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通过这对矛盾，新的冲突甚至变得更深刻，更尖锐，对于资本主义更具破坏性。

罗莎·卢森堡在理论上的最大功绩，是她提出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她仅仅提出了这个问题。她默默地或者几乎是默默地避开了与这个广泛的问题有关的许多特殊问题（交换的性质问题，结构上的多样化问题，价值规律的

限制问题，额外利润问题和以牺牲“第三者”为代价的日益增长的积累，等等)。但是毫无疑问，仅仅提出这个问题也应大受尊敬。罗莎·卢森堡同志在强调再生产问题所立的功劳也不亚于前者。今天强调再生产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正如我们已在其它场合所证明的那样。^①

但是罗莎·卢森堡漠视了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如果她对那点看得很清楚的话，她就不会为资本主义的“客观局限性”的问题所操心——她认为那种局限性可以从“第三者”的消失中找到，因为她把“第三者”看作资本主义雇佣奴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唯一的实现者。

罗莎·卢森堡在理论上的另一个惊人的功绩是，她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同改良主义者相反，改良主义者公开地挖苦、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她同正统的考茨基的方法相反，考茨基在那时就已开始结结巴巴地谈论着“英国式”的改良了的“理想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罗莎·卢森堡尖锐地提出了帝国主义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不可避免的“固有现象”。但是，她不能够从理论上看出这个问题是我们时代的特殊问题。她并未试图从追逐更大垄断利润中寻找帝国主义的基础，从金融资本朝着那个方向作必要的运动中寻找帝国主义的基础，而是试图从“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存在的绝对不可能性中去寻找帝国主义的基础。

然而，她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的问题，而且一般来说恰当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她的答案在理论上是建立在错误的论点之上的。罗莎·卢森堡的作品大大高于改良主义者（公开的修正

^①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及《过渡时期的经济》。

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两个方面)的笨拙的努力和可怜的饶舌。它是理论上的大胆尝试，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专家的功绩。我们只需提提，这个作品的历史部分，在描述资本主义的殖民征服的历史方面，直到今日还未被人们所超过。

结 论

我们的评论已告结束，同时我们将简要地提一提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上的错误和她的实际的政治上的一些错误之间的联系。正确和不正确的关系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在理论上，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崩溃的基本论点证明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其基本论点也同样适用：即要推翻帝国主义，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理论上的结论错了，所以，用来证明帝国主义必然性的理论的一系列论点都显示出许多错误的环节，因而一些策略上的意见证明是不正确的，而这些意见本应为这一理论提供实际论据，并把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

资本主义因为缺少“第三者”将必然衰退。在这方面存在着它的客观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是不可被逾越的。即使它“早在”“第三者”消失“之前”就已衰退，但资本主义衰退和它的崩溃的最终原因就在于此。那就是罗莎·卢森堡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假定。

如果确是那种情况的话，很明显，资本主义崩溃的情景则具有一种相当单调的、暗淡的、虚伪地夸张的“产业”特性。

如果确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么，“第三者”作为无产者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潜在同盟者的问题就无关紧要，那是可以理解的。崩溃的情景的单调性同反抗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力量孤立状态是一致的。

由此得出下面对这些假定的结论：

1. 在民族问题上的不正确的立场。
2. 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估计不足和不正确的立场。

3. 在农民问题上估计不足和不正确的立场。

我们从我们的理论概念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资本主义发展了内部矛盾，是这些矛盾而不是“第三者”的匮乏，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不论“第三者”有多少，即使它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也是一样。如果资本主义矛盾的再生产达到使生产力开始下降的程度，而它使劳动力的生存变成不可能，并迫使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从而破坏了大陆国家的力量，解放了殖民地奴隶的力量，并且加剧了民族对抗，那么，资本主义的矛盾将打破统治阶级集团同农民的关系，并使农民中的重要部分转而反对资本主义统治——显然在此种形势下，策略、斗争口号和对待“同盟者”问题的态度将变得不同了。这时，“把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联系起来”的必然性，殖民地造反和民族解放运动，就显得突出。

列宁主义以少有的连贯性和理论上的严密性极其精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纠正罗莎·卢森堡的错误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引用我们已故导师的理论假设和实际结论。

附 文 一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在这篇附文中，我们首先说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这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完全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运用和展示的过程。读者不要试图给予其中使用的实际数字过分重大的意义。这些数字完全是随意列举的，它们同任何实际情况没有关系。使用这些数字完全是为了说明问题。

我们采用第二个图式，因为显然马克思本人可以看到他的第一个尝试是有缺点的，所以他就搞出这个第二图式。我们摘录了这个过程的每一步并说明发生了什么情况和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感到有必要作出这种说明，因为许多人觉得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方法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应当提醒读者注意为这个图式规定的条件，即一种只分两个阶级的关闭的经济、一种不变的工艺技术状态和一种不变的剩余价值状态。

阶段

1 第一周期的开始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quad 5,000C + 1,000V \\ \text{第二部类} \quad 1,430C + 285V \end{array} = 7,715 \text{ 资本进入流通}$$

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我们就得出下列公式：

$$\begin{array}{l} \text{2 第一部类} \quad 5,000C + 1,000V + 1,000S \\ \text{第二部类} \quad 1,430C + 285V + 285S \end{array} = 9,000 \text{ 社会总产品}$$

我们进一步假定，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其剩余价值的

一半即 500，而把其余的 500 重新投资。由于 1,000V——消费掉的 500S 是收入，因此必须与第二部类的消费商品交换，这样就出现下列情况：

3 第一部类 $5,000C + 1,000V + 500S$ 同时 500S 要转化为资本

第二部类 $1,430C + 285V + 285S$

这样就进入下一阶段：

4 第一部类 $5,000C + (1,000V + 500S)$ 500S 要转化为资本

第二部类 $1,430C + 285V + 285S$

我们把 1,000V 和 500S 加上括号是表明这些价值需要第二部类商品。但是要注意，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并不足以完全满足这种需要。

5 第一部类 $5,000C + (1,500V + S)$ 500S 要转化为资本

第二部类 $(1,430C + 70S) + 285V + 215S$

为了使第一部类的 $(1,500V + S)$ 能够同第二部类进行交换，必须把第二部类的 70S 转移到该部类资本的不变部分中去。这是第二部类积累的开始。

6 第一部类 $5,000C + (1,500V + S)$ 500S 要转化为资本

第二部类 $(1,500C + S) + (285V + 14S) + 201S$

要使额外的 70S 作为不变资本运转，就需要有 14 可变资本。注意：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在两个部类中都是 5:1。这个额外的 14 是从第二部类的 S 中进一步减下来的。现在的情况是：

7 第一部类 $5,000C + (1,500V + S)$ 500S 要转化为资本

第二部类 $(1,500C + S) + 299V + 201S$

第一部类的 $1,500$ （即 $V + \frac{1}{2}S$ ）同第二部类的 $(1,500C)$

+S)交换已经解决。与简单再生产不同,第二部类的C并不等于第一部类的V+第一部类的S,而是第二部类的C少于第一部类的V+第一部类的S。到现在为止,从第一部类的观点来看,交换仅仅是一种简单再生产方式。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第一部类留下的500S资本化的过程。

8 第一部类 $5,000C + (1,500V + S)$ 500S 按照5:1的比率转化为资本 = $417C + 83V$

第二部类 $(1,500C + S) + 299V + 201S$

当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其500S作为投资时,就出现下列情况:

9 第一部类 $(5,000C + 417C) + (1,500V + S + 83V)$

第二部类 $(1,500C + S) + 299V + 201S$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部类中要同第二部类进行交换的V+S,再一次大于第二部类的C。因此,要从第二部类的S中再减下来83的数额,以使第一部类的V+S能够交换消费品。

10 第一部类 $5,417C + 1,583V + S$

第二部类 $1,583C + 299V + 118S$

在第二部类中再调动一个83C,就必须按比例地调动V的数量(5:1),这个数字将是17。这是又一次从第二部类的S中减下来的。

11 第一部类 $5,417C + 1,583V + S$

第二部类 $1,583C + 316V + 101S$

由于第二部类的S是资本家的消费和商品的自然形式是消费商品,我们假定它们在该部类交换和消费。第一部类的C也类似这种情况,因为它们将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在该部类内部进行交换。这样,现在可以认为整个过程已经发生。所

以我们面对下述情况：

$$\begin{array}{l}
 12 \quad \text{第一部类} \quad 5,417C + 1,083V = 6,500 \\
 \quad \quad \quad \text{第二部类} \quad 1,583C + 316V = 1,899 \quad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12 \\ \text{第一部类} \\ \text{第二部类} \end{array}} \right\} = 8,399 \text{ 资本}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500S \text{ 非生产性消费 (第一部类)}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101S \text{ 非生产性消费 (第二部类)} \\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quad = 9,000 \text{ 社会总产品}
 \end{array}$$

由此可见，周期开始时是 7,715 资本价值，到周期结束时已是 8,399。下面我们比较每个部类的供给和需求来结束这个表述。^①

生产资料——第一部类

供给		需求	
$ \left. \begin{array}{l} 5,000C \\ 1,000V \\ 1,000S \end{array} \right\} = 7,000 $	7,000	$ \left\{ \begin{array}{l} 5,000 \text{ 资本家 (第一部类) } C \text{ 的重新构成} \\ 1,430 \text{ 资本家 (第二部类) } C \text{ 的重新构成} \\ 417 \text{ 资本家 (第一部类) } C \text{ 的积累} \\ 70 \text{ 资本家 (第二部类) } C \text{ 的积累} \\ 83 \text{ 资本家 (第二部类) } C \text{ 的积累} \end{array} \right. $	

消费资料——第二部类

供给		需求	
$ \left. \begin{array}{l} 1,430C \\ 285V \\ 285S \end{array} \right\} = 2,000 $	2,000	$ \left\{ \begin{array}{l} 1,000 \text{ 工人 (第一部类) 工资} \\ 83 \text{ 工人 (第一部类, 等于 } V \text{ 的积累) 工资} \\ 285 \text{ 工人 (第二部类) 工资} \\ 14 \text{ 工人 (第二部类, 等于 } V \text{ 的积累) 工资} \\ 17 \text{ 工人 (第二部类, 等于 } V \text{ 的积累) 工资} \\ 500 \text{ 资本家 (第一部类) 非生产性消费} \\ 101 \text{ 资本家 (第二部类) 非生产性消费} \end{array} \right. $	

^① 这样表述供给和需求所依据的是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类似表述，参阅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 326 页。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要注意：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只消费价值的 101，但在以后的每一轮中他们消费其剩余价值的 50%。如果读者想使这一点得到满意的证明，只要把 8,399 资本价值作为起点，根据第十二阶段的表述进行分配，然后重复这里列出的过程。

附 文 二

评论斯威齐对布哈林的批判

斯威齐在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批评了布哈林的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方程式，理由是方程式中没有包括那些将会增加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个人的（即非生产性的）消费的条件。斯威齐还指责布哈林“不能想象资本家消费的增加”^①。这一点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布哈林具体地说：“……用绝对的话来说，因为资本家的消费增长，工人的消费也增长。”由此可见，斯威齐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对布哈林方程式总的批评，使人有理由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布哈林的方程式在简单再生产转为扩大再生产后的积累过程中形成其模式的第一步。他一开始就这样规定他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quad C_1 + V_1 + \alpha_1 + \overbrace{\beta_1 C + \beta_1 V}^{\beta_1} \\ \text{第二部类} \quad C_2 + V_2 + \alpha_2 + \underbrace{\beta_2 C + \beta_2 V}_{\beta_2} \end{array}$$

α = 资本家阶级非生产性消费的剩余价值

β = 资本化即积累的剩余价值

βC = 定为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

βV = 具有可变资本作用的那一部分

^① 《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164页脚注。

这样，只有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 $\alpha \leq S$ 和等号才会成立。如果剩余价值全部实现，上列图式就可以简化为 $(V_1 + B_1V + \alpha_1) = (O_2 + B_2O)$ 。

斯威齐运用了类似的方程式，只有一点不同。他这样表述其方程式：

$$\text{第一部类 } O_1 + V_1 + S_c1 + S\Delta_c1 + S_{sv}1 + S_{sc}1 = W_1$$

$$\text{第二部类 } O_2 + V_2 + S_c2 + S\Delta_c2 + S_{sv}2 + S_{sc}2 = W_2$$

斯威齐用 S_c 来表示资本家在前一时期或周期的水平上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S\Delta_c$ 是对消费的剩余价值增加的数额。 S_{sv} 是增加到不变资本中的那部分。 W_1 和 W_2 分别等于各该部类的产品。斯威齐的扩大再生产方程式是

$$O_2 + S_{sc}2 = V_1 + S_c1 + S\Delta_c1 + S_{sv}1$$

在斯威齐的图式中，各个部类的总剩余价值是 $S = S_c + S\Delta_c + S_{sv} + S_{sc}$ ；在布哈林的图式中是 $S = \alpha + B_v + B_c$ 。

斯威齐对布哈林的批评是以他自己的 S_c 和 $S\Delta_c$ 为中心。他说，“布哈林在正式表述其扩大再生产图式时错误地假定资本家的消费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他省略了 $S\Delta_c$ 这个词汇。”^①

斯威齐好象忽略了布哈林分析的要害。布哈林使用“开始阶段”这个词汇和在他的上述方程式中以此为例时，他是在对比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他这样做是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但从根本上说重要的思想：为了实现积累，资本家阶级不可能非生产性地消费全部剩余价值。事实上，既不可能有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某一时刻的第一步，也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下的简单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已经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种极端理想化的概念。布哈林受到批评是可能的，因为

① 同294页脚注。

他没有说明这一点，但这并不能为斯威齐的上述评论提供理由。布哈林很清楚，有必要考虑 S_{Δ} 这个标记的含义，即资本主义非生产性消费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他说：“在下一周期中，开始阶段的资本又重新产生，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消费部分增长——第一次——剩余价值要积累的部分将增长的更多，等等。”^①

现在我们比较斯威齐和布哈林的方程式，按照布哈林的假定，这是第一阶段。

布哈林 第一部类 $O_1 + V_1 + \alpha_1 + B_{1c} + B_{1v} = P_1$

斯威齐 第一部类 $O_1 + V_1 + S_{c1} + S_{sc1} + S_{sv1} \quad (S_{\Delta 1}?)$

布哈林 第二部类 $O_2 + V_2 + \alpha_2 + B_{2c} + B_{2v} = P_2$

斯威齐 第二部类 $O_2 + V_2 + S_{c2} + S_{sc2} + S_{sv2} \quad (S_{\Delta 2}?)$

P_1 和 P_2 等于各该部类的产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布哈林假定的这是第一轮积累的概念，那么，斯威齐的 $S_{\Delta 1}$ 和 $S_{\Delta 2}$ 只有等于零时才能包括进去。然而，我们可以说，斯威齐的方程式对扩大再生产来说还不够带有普遍性，因为它没有表明一些组成部分同时间联系在一起而呈现的各种情况。

P 、 O 、 V 、 S_c 、 S_{sc} 和 S_{sv} 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都会因时间的关系而发生一些变化，各组成部分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它们可以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发生变化。有些组成部分的变化可能是积极的，有些则可能是消极的。

我们可以用布哈林的术语象征性地表达这一点如下：

第一部类产品

$$P_1 + \Delta P_1 = (O_1 + \Delta_{c1}) + (V_1 + \Delta_{v1}) + (\alpha_1 + \Delta_{\alpha 1}) + (B_{1c} + \Delta B_{1c}) \\ + (B_{1v} + \Delta B_{1v})$$

第二部类产品

^① 着重点是布哈林加的。

$$P_2 + \Delta P_2 = (C_2 + \Delta_c 2) + (V_2 + \Delta_v 2) + (\alpha_2 + \Delta_\alpha 2) \\ + (B_{2c} + \Delta B_{2c}) + (B_{2v} + \Delta B_{2v})$$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斯威齐和布哈林二人的方程式——我们引伸了的方程式。

布哈林 $P_1 + \Delta P_1 = (C_1 + \Delta_c 1) + (V_1 + \Delta_v 1) + (\alpha_1 + \Delta_\alpha 1) \\ + (B_{1c} + \Delta B_{1c}) + (B_{1v} + \Delta B_{1v})$

斯威齐 $W_1 = C_1 + V_1 + S_c 1 + S_\alpha 1 \\ + S_{cc} 1 + S_{cv} 1$

布哈林 $P_2 + \Delta P_2 = (C_2 + \Delta_c 2) + (V_2 + \Delta_v 2) + (\alpha_2 + \Delta_\alpha 2) \\ + (B_{2c} + \Delta B_{2c}) + (B_{2v} + \Delta B_{2v})$

斯威齐 $W_2 = C_2 + V_2 + S_c 2 + S_\alpha 2 \\ + S_{cc} 2 + S_{cv} 2$

斯威齐指出，有必要表明布哈林的 α 中的积极增长，他自己的方程式中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一方面我们所相信的是布哈林思想的精神，同时我们进一步接受表明所有的组成部分可以象 α 一样变化的思想。令人困惑的是，斯威齐对布哈林的批评集中于他没有把 $S\Delta_c$ （或者象上面列出的 Δ_c ）包括在他的第一阶段方程式中，这个方程式中并不需要它。但是，斯威齐一方面包括 $S\Delta_c$ ，另一方面在总的情况下省略了类似的术语 Δ_c 、 Δ_v 、 ΔS_{cv} 和 ΔS_{cc} 。

附 文 三

卢森堡的理论运用到预言中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堡 1946 年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日益迫近的危机——比 1929 年严重得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①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已为事实证明大错特错的毁灭预言家，但轻易否定他也是错误的，因为他在作出错误预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为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他的缺点和长处表明了卢森堡理论所具有的同样的特点。

斯特恩堡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他说，“……资本主义的具体问题不是出现赤字，而是存在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消费下降的危险”。^②他争辩说，从本世纪初到 1914 年，资本主义的广泛扩张，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张，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这带来的结果是，（一）为本国工业创造了辅助市场，（二）这导致宗主国增加了千百万工人就业的机会，（三）这又导致工人在劳动市场处于有利的形势，同时导致增加这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最后一-点上，他与卢森堡的论点不同，她的论点是实际工资不会增长。然而，大体上说，他的理论同卢森堡一致，也认为“第三”市场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

斯特恩堡很正确地认为，1929 年的崩溃是到那时为止（的确到现在仍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所经受的最大、其影响也最深

① 伦敦高兰茨书店 1947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17 页。

远的经济危机。但它不仅是最大的危机，“1929年与它以前的任何〔危机〕截然不同”。^①

这个时期与从滑铁卢发展到萨拉热窝的整个世纪^②根本不同，其决定性因素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增加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在战后时期国外市场没有任何重要的扩大的情况下还得这么做。所以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其他危机都更加严重和更加普遍。^③

斯特恩堡进一步指出，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1939年大战爆发时1929年的危机还没有消除；1939—1945年的大战只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松一口气的时期；而在1946年，指向一次更新的危机的所有因素却在迅速地成熟。

斯特恩堡说，这个时期的主要非稳定因素是1917年苏联的创建。这个因素使海外市场的扩大停顿下来，而1945年以后的形势又加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斯特恩堡在好些方面是正确的——1929年是最严重的危机，它到1939年还没有消除；苏联使世界面积的六分之一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日本和美国在战争年代中作为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强大对手而出现，因此有了更多的“掠夺者”争夺殖民地世界。然而，现在不言而喻的是，他在比1929年还要严重的崩溃将要发生这一点上错了。但是，当时他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人；在1945年，没有什么人愿意预言资本主义会有这么一个空前增长和繁荣的时期。这里不去探讨出现这个增长时期的具体原因，但是显然，斯特恩堡在提出他的坚定的预言时，“第三”市场把他大大地引入了歧途。

^① 伦敦高兰茨书店1947年版，第11—12页。

^② 滑铁卢指1814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大败并被废弃的一年。萨拉热窝指1914年奥国王子斐迪南在该地被刺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整整一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大大发展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译者

^③ 伦敦高兰茨书店1947年版第42页。

然而，如果斯特恩堡的书里就是这些，那也就不值得更多地提它了。在指出他的立场方面的弱点以后，再提出他强有力的方面，不仅是公平的，而且会更有成果。斯特恩堡指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纳粹德国是唯一真正“消除”了1929年危机的国家。这是用“备战经济”来做到的。这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新型的“恢复”做法，军火生产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经济不仅达到1929年以前时期的生产水平，而且超过了三分之一。“和平时期德国军备计划的巨大数额可以从下述事实当中看出，甚至在大战爆发以前，纳粹国家就为政府（读作军备）目的而控制和指导着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德国国民收入。”^①

斯特恩堡继续进行分析，研究这一假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发生比1929年危机的规模更大的危机，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它。他很正确地看到，美国将在世界的资本主义领域内起优势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对外贸易在整个美国经济中起较小的作用。他争辩说，所以国家必须以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进行干预。他还论断这种国家干预可能以他所说的“进步”和“反动”的方式发生。美国选定发展备战经济就是选定最可能的反动的变种。“为现代战争进行军事准备必须由工业方面的准备来完成，而这意味着和平时期相当大部分的生产不得不转向军备生产。”^②

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不仅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吸收剩余资本；现代化武器的本质将会迫使本身进行更加迅速的技术革新。因为“如果生产的武器在现代技术上成为最新型的，那就必须也开始实施庞大的研究和实验计划”。^③ 军事技术的巨大发展——原子弹的发现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严峻的象征——已经把‘备战经济’

① 伦敦高兰茨书店1947年版，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187页。

③ 同上书，第192页。

的主要中心从军事领域转向工业领域，特别是转入实验室……”^①斯特恩堡继续指出，由于这种转变，将可能发展备战经济而用不着同时诉诸于国家生活全部军事化，象纳粹德国那样。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经济部分将有可能为这些目的被吸收而不会受到整个居民方面任何巨大的抵抗。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只能把斯特恩堡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和论据摘要介绍几点。然而，我们相信这些要点已足以表明，尽管原来的基本论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中还是有一些很有力的见解说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得到的发展。在保持1945年以来的漫长增长时期方面，一般地说来，军事和政府开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撇开这个现在已经确立的事实以外，斯特恩堡还对我们从那个时候起亲眼看到的科学技术革命作了一些说明。这种见解可以归之于斯特恩堡的卢森堡主义的“强有力方面”。卢森堡是第一个人看到军火生产中所固有的实现剩余价值和吸收剩余资本的可能性。然而，她只活到能够看到这个过程的最初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微小的结果。斯特恩堡则活到能够抓住这些方法提供给资本家阶级的强有力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方法可以给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带来的变化。

^① 伦敦高兰茨书店1947年版，第192页。